

STAR

VOLUME 1
● Number 1

JUN. 2026

亞洲科技史評論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ia Review

主辦單位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
期刊網址 <https://kejishiasia.com>
聯絡電郵 kejishi@polyu.edu.hk

編輯團隊 Editorial Team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Editors-in-Chief (主編) 鄒冬心 張贊	韓琦 (香港理工大學) 范發迪 Fa-ti Fan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Binghamton 分校)
Associate Editors (編委) 潘律 潘亦迎	方小平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 馮錦榮 (香港珠海學院)
Book Review Editor (書評編輯) 陳斌	韓孝榮 (香港理工大學) 杭行 (香港理工大學)
English Editor (英文編輯) Angie C. Baecker	Eugenia Lean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ISSN (待申請)

© 202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ia Review
除另有註明外，作者保留其著作權。
本刊採開放取用出版模式，歡迎學術引用及傳播，惟須註明出處。

目錄 CONTENTS

開卷 Editorial	04	發刊辭
專題論衡 Feature	08	文學的未來與未來的文學——由科幻小說到人機共創 陳楸帆
原創研究 Articles	34	臺灣殖民資本主義漁業體系的成立 , 1895-1926 祝平一
	54	洋味初嘗：鴉片戰爭以前明清中國文獻所見的西洋飲食文化 陳沛滔
	86	馬海德與 20 世紀 50-60 年代中國的梅毒防治工作 高翠
	104	未名口述史：新技術與新舊交織的校園 BBS 社群 張璟
	124	時空變形、斷裂和阻隔：中國當代科幻中的城市化與性別 周旦雪
閱讀與批評 Reviews	150	瓶中的帝國：醫藥商人與現代醫療的殖民根源 / 張繆斯 —— 評 Zachary Dörner, <i>Merchants of Medicines: The Commerce and Coercion of Health in Britain’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i> (Chicago, 2020)
	157	風水與清代地方行政中的法律實踐 / 李甜 —— 評 Tristan G. Brown, <i>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i> (Princeton, 2023)
學術譯介 Translations	170	全球亞洲札記：如何書寫全球知識史 Eugenia Lean (林郁沁)

《亞洲科技史評論》發刊辭

Inaugural Editorial

在歷史的長河中，科學與技術從來不只是知識的積累或工具的改進，而是深刻塑造社會秩序與文化想像的力量。每一次科學革命或技術變革，不僅重塑了世界格局、制度運作與日常生活節奏，同時也改變了人類理解自然與個體的方式。在今日這個逐漸由數據、算法與人工智能主導的世界中，科學與技術正以史無前例的力量影響著人類的發展。人類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科技史研究正是思考這些命題的一把關鍵鑰匙。科技史的任務，正是在時間的縱深之中，揭示知識如何被建構、技術如何被實踐，以及人類如何在不斷變動的世界中重新界定自身的位置。

近三十年來，科技史研究逐漸從單一學科的邊緣地帶，蛻變為連接不同學術領域的重要交匯點。學者們逐漸跳脫純粹關注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的傳統範式，轉而審視知識如何在制度、文化與物質條件中生成與流動，以及技術如何在不同社會之間被傳播、重新詮釋與運用。這一轉向，使科技史成為理解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種歷史方法與思想視角。無論是不同文明中科學與技術知識的生成和跨文化流動、社會建制在科學形成中的角色，還是殖民時期熱帶醫學知識在東南亞的在地化、冷戰時期基礎設施與地緣政治在南亞的交織，抑或東亞物質文化與傳統技術在近現代的演變，都昭示出科技史研究的核心關懷，已與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媒介與傳播研究等學科產生緊密互聯。

在這樣的學術進程之中，亞洲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從儒家、印度到伊斯蘭等文明傳統，亞洲不僅是歷史上科學知識的重要源頭，也在近代「西學東漸」的調適中展現出強大的包容力。這種本土智慧與全球知識的持續互動，已使亞洲躍升為當今全球科技創新的核心樞紐之一。亞洲各地的歷史經驗，也在不斷挑戰既有的西方理論框架與敘事方式。近年來，非西方科學與技術史，特別是亞洲科技史，逐漸突破過去相對專門化的學術範疇，成為國際學界矚目的焦點。這一趨勢不僅表明學術視野正從單一中心向多元視角拓展，也顯示出亞洲的知識經驗正日益重構全球科技史的討論框架。如何在地方經驗與全球視野之間建立新的理解，如何在不同語言與學術傳統間展開深度、有意義的對話，已成為當今科技史研究的一個核心議題。

專題論衡 FEATURE

《亞洲科技史評論》(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ia Review) 的創辦，正是為了回應這一學術趨勢，提供一個增進理解、促進對話的平台。本刊由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主辦，前身為《開物：科技與文化》。在延續既有學術積累的基礎上，我們以全新的名稱與定位重新出發，希望更清晰地實踐一種學術承諾：以跨學科的方式理解歷史與現實中的科學與技術，以開放的態度參與全球性對話。香港作為一座長期處於不同文化與制度交界之地的城市，本身即是知識流動與觀念交鋒的歷史現場。這裡既承接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也與世界各地保持密切的學術與制度聯繫。我們相信，這種兼具區域根基與國際視野的學術環境，能為科技史研究提供孕育新問題與新方法的絕佳空間。

本刊的目標不僅在於發表研究成果，更在於培養一個具備共同問題意識的學術社群。我們以歷史學為根基，歡迎圍繞知識的跨文化流動、科技與社會研究 (STS)、醫療健康與環境、數位人文方法等議題展開跨學科探究。我們致力於將亞洲經驗置於全球性的比較與討論中。雖然本刊以中文為書寫媒介，但研究視野絕不局限於中國、東亞或華語地區，我們熱切歡迎更多關於東南亞、南亞、中西亞等廣闊地理空間的探索。同時，培養新一代研究者對我們而言尤為重要。本刊誠摯歡迎年輕學者及學術新進以中文進行嚴謹而富有創造力的寫作，以獨特聲音參與全球學術共建。

創辦一份學術期刊，是一項面向未來的長期志業。期刊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所刊載的文章，更在於它所培養的問題意識與學術倫理。我們希望，《亞洲科技史評論》能夠成為一個持續提出問題的場所，而非僅僅提供答案；成為一個鼓勵討論、包容分歧的空間，而非追求單一聲音的舞台。在一個知識與技術不斷重塑世界的時代，我們願與讀者和作者共同努力，持續追問：科学与技术如何形塑歷史，而歷史又如何為科技提供反思與方向。

未來的文學 文學的未來 —— 從科幻小說到人機共創

The Future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of the Future:
From Science Fiction to Human-AI Co-Creation

陳楸帆
Chen Qiufan

網飛版（Netflix）《三體》劇集上綫成為了備受關注的文化事件。已有騰訊版（Tencent）《三體》改編珠玉在前，兩者在不同文化語境和市場中呈現出各異的改編思路，自然會引發廣泛的爭議，這一爭議背後揭露了科幻的深層魅力——它能夠穿越語言、文化和地域的障礙，引領世人圍繞著看似遙遠而宏大的話題展開思辨與討論。

一．科幻在變化中想像 AI

《人類簡史三部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在接受《連線》雜誌的採訪時指出：「今天，科幻是最重要的藝術形式。」多重解讀這句話，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巨變的時代，人類意識、思想及社會結構等軟性部分的演變通常滯後於技術變革、能源升級換代等外部因素，科幻小說在此過程中扮演著多元且關鍵的角色，它的定義也在不同時期和語境下有所不同。簡言之，科幻小說作為文學的一種分支，處理著人類面對科學技術不同程度變化時的反應。我們還需對定義中的「文學」「人類」及「科學技術」辭匯存以疑慮，尤其不應僅局限於文學領域，科幻的影響力已經延伸至影視、遊戲等場域，甚至涉及到人類本身。

在以人類為中心的話語體系中，假設未來 AI 在社會中佔據一定的主體地位，科幻小說就有可能成為被 AI 書寫的一種類型。這個設想涉及到科學和技術的核心爭議點，以及科幻界極為重要獎項雨果獎的變革。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初的變革中，雨果獎因《哈利·波特》系列進入決選名單，引發大眾對科幻、奇幻分野的激烈探討。這一定位於科幻小說的獎項是否適用於《哈利·波特》系列？何為兩者的分界綫？達到何種臨界點，才足以判斷一本小說是科幻小說，而非奇幻或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爭辯暫且不論，我認為科幻真正的精髓在於「變化」，它不僅涉及外部科技、社會和自然環境的變化，還包括人類本身和概念的變化。因此，科幻是一個關於變化的文類，它的自然立規性也是一個變

化的過程。科幻的邊界和定義的形態也在不斷變化，這不禁讓人想起中國古代的《易經》，一本關於變化的典籍。

作為科幻的源頭，《弗蘭肯斯坦》深刻探討了人類運用電力與生物學的知識，通過自然界或介乎自然與人工之間的力量，拼湊屍體碎塊並借助閃電賜予生命的故事。怪物具有自我意識，思考與人類的關係，思考與創造者的關係，這一「怪物情結」是科幻小說一直在處理的最核心母題，折射出一種深刻的二元情緒——既怕又愛。這種情感不僅來自被創造出來的怪物本身，也來自創造怪物的科學家，反映根深蒂固在人類本性的對「他者」的想像，類似於遠古時期恐懼遙遠部落的個體，不知道對方是否攜帶未知病毒，也不清楚對方是否懷有敵意，來搶奪糧食、食水或營地，這些不確定性共同導致對「他者」的恐懼，而這種恐懼現如今反映在對 AI 的想像中。科幻影視作品中經典的 AI 角色有著具身化的機器人形象，如《變形金剛》的大黃蜂，《太空漫遊》的 HAL 9000，還有《終結者》、大衛等。其中，《Her》最接近現實生活，它是一個存在於雲端的人格化 AI，一個通過手機與數百萬人建立戀愛關係的虛擬程式，由斯嘉麗·詹森配音。這些 AI 形象的創作折射出人類中心化的想像，這種想像把人類自身特點，包括聲音選擇背後的男性凝視特徵融入到創作中。

真實世界和科幻的 AI 經歷了一系列變遷，科幻作為變化的文學，早在上個世紀 40 年代，阿西莫夫的《鋼窟》系列和《機器人》系列就描繪了人與機器共生的社會形態。1950 年阿蘭·圖靈作了一篇提出「機器能思考嗎？」疑問的論文，隨後 1955 年的達特茅斯會議正式提出人工智慧的概念。儘管當時業界最頂尖的專家、智者們持樂觀態度，他們預言 AI 將在 5 至 8 年內，最多 10 年內達到與人類媲美的智能水準，實際情況卻差強人意，不論在實驗室還是工業場景，AI 都從未大規模成功應用，包括日本應用的第五代專家系統在處理資訊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科幻的想像總是伴隨著技術的變化而發展。1968 年，庫布里克跟阿瑟·克拉克兩位天才同步創作了不朽的經典作品《2001 太空漫遊》就展現了超前的預見性，作品中對 AI 的想像和塑造放在當今依舊具備極高的價值，他們所描繪的 AI 具備自我意識，在被人類宇航員關閉之前甚至唱起了童謠。同樣，中國《小靈通漫遊未來》和威廉·吉布森在《神經漫遊者》中塑造的 AI Boss 的角色，以及 1999 年斯皮爾伯格接過庫布里克遺願，執導電影《人工智慧》都延續了對 AI 的探索和想像。現在的 AI 熱潮可以追溯到 1990 年代，在此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符號主義是構建 AI 的主要途徑，即通過有限解析和符號來表徵任務和思考過程，並將步驟拆解成公式表示、計算，而 1990 年代出現了一條聯結主義的全新路徑，不被看好，是人們認為不會成功的路徑。可值得一提的是，1980 年代很多學習 AI 的博士生包括李開復，在畢業後都難以找到與 AI 直接相關的工作，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去華爾街從事交易員，儘管這似乎並非錯誤的選擇。

二．人機共創與文學評選

當探尋人類如何思考的根源，深度學習的架構開啟了處理資訊和學習自然法則的新時代。這種技術模擬人腦處理數據的方式，逐層處理、加權、計算資訊，通過目標函數與結果的不斷擬合訓練大模型，從而實現模型構建初期無法預設的能力，這就是所謂的湧現。ChatGPT 和最新 Sora 基於的 Transformer 架構提出的 2017 年，《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強調了注意力對人類和機器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2018 年，OpenAI 推出基於 Transformer 的 GPT 模型，Google 則推出了 Bert 模型，標誌著兩家公司互相決裂、競爭的過程，過去的十年無疑是 AI 技術狂飆突進的十年。

2017 年，我開始使用自己建造的原模型進行人機共創實驗。儘管當時模型相對初級和粗糙，但作為一名擁有中文系和藝術學院背景的純文科生，我本身並不具備編程能力，得益於在 Google 工作期間結識了許多熱衷於科幻的工程師朋友才能夠一同訓練模型，主要使用我的寫作內容作為語料來源，儘管相對貧乏。我們還採取了現在仍在使用的卷積神經網路（CNN）和長短記憶機制（LSTM）這兩種最基礎的演算法，通過輸入關鍵字和提示詞，如特定的句子或主角設定，模型生成了一些非常鬆散，類似於先鋒詩或夢囈般的詞語、句子，生成的內容可供選擇或重新生成。我將機器生成的內容融入到小說創作中，圍繞它們構建合理的語境，當模型生成的內容被設定為來自一個非人角色，我會依據這些臺詞製造上下文，使之看起來合乎邏輯，這並非我利用 AI 寫作，而是 AI 通過我這一媒介進行創作，形成了一種顛倒關係。

2019 年，我與中信出版社簽約出版了《人生演算法》，書中收錄了 6 個關於人跟機器共生的故事，我也讓機器參與了創作。那一年發生了件特別有趣的事，上海作協《思南文學選刊》採用了一位從矽谷歸國的工程師研發的 AI 評委進行 AI 文學榜的評選，這個 AI 評委給每篇作品打分，畫出一條簡單的正弦曲線，據說可以代表文章結構的優美程度，但這些參數、指設都是由人設定

的。他們將 2018 年所有發表在中國主流文學，最知名的如《收穫》、《大家》、《十月》、《人民文學》上的作品盡數提交 AI 評委。短篇類別中，最初獲得冠軍的是莫言老師在《十月》上發表的《等待摩西》，大家普遍認為這種模型極為可靠，因為莫言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恰恰證明 AI 的文學品味尚可。直到最後一天，上海《小說界》雜誌提交了所有作品，他們發現我的一篇作品《出神狀態》躍居第一，以 0.0001 的微弱優勢超越莫言老師榮登 AI 文學榜單榜首，這或許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能夠戰勝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生經歷。當時，我接到主辦方的電話，他問：「你在這篇小說中提到，有些段落是有 AI 參與創作，是真的嗎？」他們覺得我在撒謊。

「出於對 AI 的著作權的尊重，我在文中注明了團隊和使用模型，生成的內容未經人工修改，這是一個註腳。」我追問，「為什麼要這麼問？」

他回答說：「因為你的這個作品獲得 AI 文學榜的第一名。」出於某種原因，他覺得一篇有 AI 參與創作的作品擊敗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創作。自那時起，我對人機共創有了全新的看法。

這是當時的一些段落：

恐懼中作為大腦極端痛苦的美感，仿佛所有者都只能重複給綫，讓用戶創造出來完全意義時，情感衰退以地殼風格的太空安保、燃燒、旋轉、情感傳遞、一旦提高，因此那張人記得自己一樣，把自己看作地獄限度，沒有任何通感管道，使可以靈活地釋放肌肉躍動，便無法陷入明亮。——《恐懼機器》

遊戲極度發燙，並沒有任何神秘、宗教、並不攜帶的人，甚至慷慨地變成彼此，是世界傳遞的一塊。足以改變個體病毒凝固的美感。——《出神狀態》

如果不用人類的標準衡量，你會感受到它蘊含著一種特別的詩意，但它無法處理一些準確性要求，比如人稱、人物關係、上下文的邏輯等，這讓我想起控制論，機器與我之間建立起了資訊的回饋回環。我的數據輸入機器，機器接受訓練，機器生成的內容又影響了我的輸入，這種不斷的回環往復的過程最終促成了一篇共同作品。這過程中，究竟誰是主體，誰是客體，誰是真正的創作者，這個問題值得深思。錢學森先生是控制論領域的權威，在 1980 年代他曾研究人體特異功能，認為人體是一個複雜的巨系統，還給 VR 起了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科幻色彩的名字，叫「靈境科技」。

2020 年，我們和李開復的「創新工廠」創業團隊升級了相當於 GPT2 參數規模的大模型，進行更大規模的文學實驗。我們用更多科幻小說的語料訓練這個專門用於寫科幻小說的 AI，AI 可以用不同的濾鏡風格微調，比如說劉慈欣老師的濾鏡，韓松老師的濾鏡等，還邀請了主流文學，魯迅文學獎得主小白老師在內的作家參與共同創作，並將共創內容發佈在知乎，讓網友猜測是人還是機器的創作，結果許多人猜錯了。人類作家們第一次接觸到這類 AI 寫作工具大多感到驚訝，因為 AI 的寫作能力超出了他們的預期，可能達到了小學高年級的寫作水準。

一個老太婆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她說話的口氣中有一種沙啞的東西。她告訴花花：地球人正在清理太陽系中所有的生態環境。用一種稀薄的物質製造出一個斷世界。但老太婆又補充道：那只是一個大概的設想。

她邀請他去火衛二。那是另一個被遺棄的小行星。他們相信他能幫助他們製造出分子縮微器。這樣，地球上的分子就可以被拼裝成任何他們想要的樣子。他們說，這將是人類歷史的一大進步。

「可我怎麼才能去到火星呢？」

「運用你的想像力。」老太婆笑著露出了粉紅而空洞的牙齦，「只要你相信自己就在火星上，你就能去那裏。」

他們讓他看了幾乎所有的火星照片，其中不乏經過處理的，高清晰度的。花花突然領悟到，所謂的新聞媒體只不過是一種掩人耳目的障眼法。他看到了其中一張照片，正面是地球，而反面是火星。

花花被這個想法震驚了。火星是地球的反面，而地球是火星的正面。

以上是我們 2020 年模型寫作的內容，其中下劃線部分是機器寫的，雖然會有人稱混淆、邏輯性錯誤等，但也會帶來一些新穎的想法，可能會改變原創作的思路和情節走向，尤其是「火星是地球的反面，而地球是火星的正面」顛覆了我們通常想像的從地球到火星的方式，不再是坐火箭或飛船，而是一個空間翹曲的過程，就像我們小時候都看過時空是一張紙的類比，這邊是一個時空點，那邊是另一個時空點，需要做的只不過是穿過去，這樣的觀點將我的思維引向另一個方向。

三．理解智能

ChatGPT 讓大語言模型的概念深入人心。這個類似斯普尼克時刻的 ChatGPT 時刻發生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過去，我們對 AI 在大眾層面的理解有些觸不可及，哪怕日常導航有 AI 的成分，網上購物的推薦演算法也是有 AI 的成分，但當你第一次以對話形式與具有極高智能水準的非人個體直接交互時，震撼非常巨大。這種感受的背後牽扯出很多深層的哲學思考，比如智能的定義，我們與機器，碳基與矽基之間智能形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機器是基於計算和大數據訓練的大模型，它目前只不過是一些語言文字，其數據模態還很單一，不同於人類擁有視覺、聽覺，以及體感、本體知覺等，甚至具備記憶、情緒、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這些都是當下機器無法模擬、複製的。我們或許可以從符號轉向聯結主義，而行為主義代表了另一個流派，強調行為上的表徵。AI 主要提供大語言模型，只能呈現語言層面的表徵，最多像 Sora 給出視頻的表徵，但缺乏具身的軀體，在行為方面存在缺陷，做不到直接與環境互動，而大語言模型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重要啟示，即我們對智能的理解可能存在誤區。我們曾經認為，人類是如此複雜的智慧體，所有的思考，大腦中 9000 億個神經元更多是一種激素的聯結，經過自然選擇，億萬年進化才到達了當前水準。如果我們僅僅通過暴力美學的方式，用海量數據和參數訓練大模型就能表徵出一些類似智能的特徵，比如推理能力，以及在某些時刻激發情緒，就像 Google 的研究員布萊克·萊莫因認為 AI 具有宗教性、神性，這與他個人的宗教背景有關，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和理解情感，它是否是一種投射，如 AI、AGI 以及對「Artificial」的理解。我們創造的東西真的算得上是人工智慧嗎？如果我們對智能的理解如此膚淺，我們怎麼敢宣稱我們創造了智能？

我一直很抵觸 Artificial 這個詞，因為其中包含著計算即認知、模型即資訊的假設。在麥克盧漢的時代曾說「媒介即資訊」，而在未來我們所有資訊都將通過一個或幾個大模型處理，這些模型將決定我們以何種方式認知世界，是否會出現「模型即資訊」的情況？這也涉及到「模擬即真實」的更深層次本體論思考。這裏

有一個重要的爭論點，那就是 Sora 無需編程，僅通過學習海量視頻資訊就能掌握真實世界的物理規律。通常，我們需要經過建立數理模型來模擬現實，如預測天氣，我們需要瞭解流體力學、大氣環境，以及海洋等現實生活的各個學科原理才可以構造數學建模，基於真實世界的物理定律去模擬。如果我們僅僅通過表徵的方式將資訊輸入給機器學習，讓其學習足夠多的資訊後來理解世界的本質，那麼我們的世界將與一個巨大的模擬器沒有太大區別，這也是埃隆·馬斯克所提出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模擬世界可能性是 99.9999%」。

模擬的核心在於 scaling law，是暴力美學。機器學習的能力隨著我們輸入的資訊增加而增強，擬合效果也越好，從而湧現出不同的能力，乃至於通過 scaling law 有望無限接近 AGI，也就是通用人工智慧的水準。然而 scaling law 是否會一直有效？就像摩爾定律每過 18 個月的處理速度翻倍，scaling law 的曲線更為陡峭，它會持續有效，還是到達某個頂點後突然下降，失去這種魔法？這也暗含我們的算力是否能夠無限供給，尤其考慮到當前地緣政治各方面的因素，使得算力更加引人關注。

除了大語言模型，在 2021 年，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和金錢請人類插畫師為我們與李開復博士的《AI 2041》創作插畫，但到了 2023 年，我們用 Midjourney 或 DALL-E 在幾秒鐘內幾乎零成本地創作出一些非常精細、擬真的作品，甚至視頻可能成為未來 AIGC 的主要方向。作為文字創作者，我個人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以影像形式展現在大螢幕上，然而由於成本、團隊等商業市場原因很難實現，但借助 AI，每個人都能拍攝電影，成為作曲家、導演等。同年我利用 AIGC 工具創作了一部短片，用時兩天，除了故事和剪輯是我自己，從畫面到音樂到配音總共只用了 8 個小時。這個初步作品讓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正如佛法所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會不會我們正迎來一個文學已死的時代？因為 AI 不僅以文字形式創作，還可以通過視頻、音樂甚至遊戲等方式創作，AI 已經能夠編程，

四．人與 AI 的文學未來

並且替代一定水準的人類工程師。

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文學的理解和定義，以及如何定位文學在我們生活中的角色。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每一次這樣的革命實質上都在反思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從神創論到進化論，我們一直在探索「我是誰，我從哪來，我要到哪去」的疑問。

AI 的發展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湧現的概念。我參加過很多學術會議，大家都希望至少通過數學方式，如公式、還原論的方式從更底層的機制理解湧現的出現，以及它如何衡量、識別，但至今尚未出現一個能夠讓所有人信服的解釋。

湧現存在於不同層面，不僅是智能領域，還包括鳥群、水流、大氣和生命等各個領域。科學界一直在探討無生命到有生命轉變的這道鴻溝，無機物何時轉變為有機物，單細胞如何進化為多細胞，以及界定生命何時產生的問題。意識被認為是一種湧現，但如何衡量意識的稀缺性和獨特性，以及是否僅存於人類和生物中，仍是一個未解之謎。動物、植物或真菌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識，無機物、一塊石頭、一條河流、一座山川甚至一顆星球，會否具有某種程度的意識？就連存在本身它是否也是一種湧現？我們的宇宙從哪里來？我們怎麼樣從無到有？這些問題仍然充滿著未知，也是無法明確定義湧現的原因，但我們會排除湧現之外的事物，探討眼睛作為進化史的功能性結構，重複在不同種屬、種群，甚至隔得很遠的生物形態上出現的進化方向性問題，還有大腦作為處理、計算資訊的結構，是否是智能唯一形態的問題。

雖然進化沒有明確的方向，但我們可以總結它的規律。首先，多樣性是關鍵，因為缺乏多樣性就沒有自然選擇，也就沒有淘汰和保留適應環境的特徵。此外，跨主體性也是進化的重要因素，比如細菌和病毒的起源可能是兩個不同細胞的融合，其中一個吞噬了另一個細胞，但被吞噬的那個仍然保留了原有功能結構的活性，這種跨主體性融合賦予了生命更廣闊的能力和視野。這種跨主體性在人類身上也同樣存在。試想一下，我們體內的微生物菌群無時無刻不在和我們的身體溝通交流，我們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瞭解也可能受微生物菌群的影響，因為它們能在一定程度進行著溝通協調，甚至影響著我們對他人的喜好和氣場的感知。人類從來都是一個跨主體性的多物種存在，絕不是單一的物種，我們體內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尼安德特人與現代智人是截然不同的物種，這種跨物種間的互動無處不在。

人類是否還應該覺得自己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主導性物種？這點值得商榷。在 AI 領域，尤其是涉及到創造性的東西時，適度讓度主體性可能會帶來更靈活的認知框架，我們能夠看到以往看不到的事物。人類很難想像非人的存在如何感知世界，但是你能說一只貓、一只狗、一只蝴蝶或一條魚感知到的世界就沒有人類感知到的世界的合法性嗎？它們感受到的世界，它們的感官、感知光譜、聽到的聲波頻率，甚至是我們無法理解的感受器的頻率震動，地磁偏轉，包括太陽、宇宙、深空中高能粒子的輻射，所有的感受難道不是我們所處現實的一部分嗎？那我們的現實到底是一個單數的現實，還是一個可以無限增值、重合和變化的復數現實？在這樣的現實中，我們的中心還重要嗎？這就引出了共生，這種共生深植於中國傳統道家哲學「萬物與我為一，天地與我共生」的境界，其核心層是共情——這種能力讓我們理解與自己不同的他者，讓不同個體跨越障礙溝通交流，這一可能性在《三體》問題上展現得淋漓盡致。科幻小說應該讓我們擁有多元化、跨主體去中心化的認知彈性，能夠不斷轉換視角和框架，達到新的原生的理解力，它是對於智能的智能，對於存在的存在，也正是我對文學的理解，它可以通過不同的敘事實現認知的彈性和流動性，不僅是科幻這一文學分支，還適用於所有的文學作品。

在未來，我們可以用 prompt 命令 AI，僅通過隻言片語就能得到很多內容，甚至改變物理世界。我們現在也在研究具身智能，把語言模型與機器具體的身體結合，與物理世界交互。我們有可能只用文字、語言就能實現類似於魔法的效果，正如阿瑟·克拉克所說的「一切足夠先進的技術都與魔法無異」，這種魔法式的未來很可能快要成真，在這樣一個魔法時代，科幻跟奇幻之間的界限將變得更加模糊，甚至文學跟科學的界限也會變得模糊。試想一下，某天文科生也具備了從事科研的能力，他所需要的僅僅是想像力、一個獨特的視角和一些語言技巧，不再受到文理之分、專業之別，而需要對自己深刻的覺知，因為理解了自己，就理解了世界，認識了宇宙。

「以幻破幻」是我對文學未來的期許。我們所處的現實被層層疊疊的幻覺包圍，不同的敘事共存，如同物種般競爭、殘殺，形成殘酷的共生結構。在這個幻覺交織的世界裏，我們能否有能力跳出幻象，是一種「智慧」。在「智」與「慧」之間，「智」以知識為基礎，如太陽代表理性、科學，代表阿波羅，它能照亮很多東西，同時讓黑暗無形的事物無處遁形；「慧」字有心，它是一種具身的認知，有著豐收的稻子，可用容器釀成酒，既可以用於慶賀，也可用來祭祀，成為一種儀式。我們需要什麼來融合它們，實現它們的統一、流轉、升級。這讓我想到莊子在《齊物》的人籟、地籟、天籟的故事，我們往往以為是人籟、地籟，實則天籟在不同的容器裏流轉，這些流轉背後的規則、規律，是我們真正需要探索與思考的，那就是「道」。

未來有三種我挺喜歡的說法，首先是威廉·吉布森認為「未來已來，只是分佈得不平均」；其次是厄休拉·勒奎恩，《黑暗的左手》作者，她從 14 歲開始看《道德經》，是道家忠實的推崇者，她強調「未來已滿，只是它比我們想像的，比我們所在的要更古老和宏大，而我們都是在裏面的陌生人或外星人」；還有我寫在《AI 2041》的前言中的說法，「創造未來要從想像未來開始」，想像並非自然而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艱辛，打破原來固有認知結構，而想像能引領我們抵達那些尚未看到、發現覺知的現實，因此我堅信文學永生。在未來，一切都是文學，我們也是文學，每個人要把自己活成文學。因為作為一個存在，你就是這樣與這個世界溝通、交流，並給這個世界留下些什麼的。當你的肉身漸漸腐朽老去，最終消逝，只有文學作為你靈魂的一部分，會長久地留存下去，直到宇宙的盡頭。

講座現場問答

韓孝榮教授（主持人）：

感謝陳先生的精彩演講，我在聽講座的過程當中想的最多的一個問題是，這個人機共創已經成為現實，有沒有可能再過幾年，機器可以獨立創作，不要我們人了？如果那天到來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去應對？您所描述的共生和共情，是一種美好的前景，我擔心的是到時候 AI 不願意跟我們共生和共情，有可能把我們淘汰。我相信我們現場和綫上的朋友們一定都有很多意見和問題要和陳先生分享，實際上在講座開始之前，我們已經收到一系列問題，那我們還是現場的觀眾稍稍優先。

觀眾 1 提問：

Q：陳先生你好，我就想問一個具體一些的。首先是您當時說您用您的作品訓練了一個大模型是嗎？是哪年？

A：是 2017、2018 年。

Q：那個時候應該是 GPT 對於很多企業、普通人還沒有什麼影響的時候。

A：還沒有 GPT。

Q：對。GPT 是 2018 年才出來的。

Q：您 2017 年就已經接觸到這種大語言模型，對於您的創作有什麼具體的改變嗎？

A：因為 2019 年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人生演算法》，裏面就用到了不能叫大語言模型，我覺得叫小語言模型的一些段落，我會一直用它進行嘗試，但很多的段落不盡如人意，沒有辦法用自己寫作的標準和品質要求那個狀態下 AIGC 的內容。後來，我想出了我去配合它創作的邏輯，但我會在每一個段落，用不同的字體去標明哪些是來自 AI，而且會注明所用的一些工具、模型，包括它創作者的這個身份。

當時非常早，也是我想要去傳遞給大家的想法。AI 很快就會進入創意寫作的領域，我的態度是積極擁抱，但在那個時候大部分人還是非常抗拒或看不到這樣的存在，尤其在

人文的領域裏面，所以我希望讓更多人看到這樣的可能性。過了這麼些年，我很感慨現實發展的比我當時想像快很多，現在所有人都可以用各種大模型去創作也好，去工作也好，只不過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我們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人機共生的時代。只不過他的這個程度、水準有沒有那麼深，有沒有那麼多元，現在還是處於起點。

Q：對一些更具體的 idea 有什麼影響嗎？

A：我覺得很可能有，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那麼細緻地覺察到。這就是共生的狀態，你都不知道這個 idea 是來自你，還是來自機器，這是我覺得共生最深、最奇妙的一種狀態。

觀眾 2 提問：

Q：陳先生您好，我想問一下現在大語言模型已經會比 2018 年的時候有很長足的發展，您現在的寫作方式和當時的小語言模型的創作模式有什麼區別？

A：非常不一樣。現在的大語言模型已經非常強大了，你可以用它做 brainstorming，比如我只有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或者說有一堆模糊的想法，但希望機器幫我把這些碎片、零碎的想法整合成一個有邏輯、有結構的故事梗概，它能夠瞬間完成。當然還有很多，比如說它可以幫你去做人、世界觀的設定，再變成一幅具象化的視覺圖像，甚至變成一個動畫，在想像的時候更有這種具象化的 reference。包括風格的改變，比如說你寫完一整段想改輕鬆幽默一點，或嚴肅一點，它都可以做到。雖然不是完美，是大學一年級或者高中生的狀態，尤其在語言能力上，不同的模型對中文的能力不一樣。比如 ChatGPT，只用了百分之零點幾的中文語料去訓練，92% 都是英文，但國內的大語言模型中文的比重會多一些，比如李開復的零一萬物 AI 就是用了 25% 的中文語料，所以它生成的細膩的程度、顆粒度要更高一些。這個東西沒有止境，因為技術也是不停的在更新迭代，情緒也是非常的糾結，你也不知道哪天就會像韓老師說的把我們替代。

這個問題是關於創作者他自己的位置的問題，這可能是一個產業的問題。當生產力極大豐富時，市場並沒有隨之擴大增長，每個人能用的時間還是那麼多，碎片時間依舊有限，這個競爭就會更激烈，平均水準又會水漲船高，對於平均水準的創作者其實非常不利，因為很容易被 AI 所取代，沒有溢價能力，工具可以替代這些人做的東西。只有你把自己變成一個金字塔頂尖的，所謂的頭部創作者，而且這個頭部不光是創作內容品質頭部，要把自己變成我剛才說的文學的一部分。你只有把自己變成一個傳奇、一個 icon、一個 brand，變成一個別人哪怕不看你的書，我都要買一本莫言的回家供著，類似於這樣的一種感覺，可能才能在 AI 的時代不太容易被取代。

觀眾 3 提問：

Q：您好，我想問一個創作衝動的問題。從開始創作的第一個作品，非常想把它寫下來到寫成，到後來那麼多年出了那麼多的作品，而且可能也會有一些階段性的改變，到最近比如跟李開復老師的合作。有哪些創作衝動還保持著，有沒有可能你在跟機器或者研究 AI 太久，創作衝動的感知力會被稀釋？

A：我覺得我的創作衝動應該是更強了。創作這個事情很有意思，其實不是你寫的越多，就會寫的更容易，反而是變得越來越難，在寫每本書的時候，對自己的標準，你的要求、你的想法都不一樣了。你就想做跟你上一本書不一樣的東西，每次嘗試都是新的，就在跟 AI 的共創的過程中能明顯感受到機器的局限性，就會發現人類創作的精華所在，會逼迫自己那部分怎麼去做，往往是非計算性的部分，沒法通過傳統的學習得到，比如怎麼提升感受力。可能你越學習，感受力越低，反而是要清空一些東西，就是莊子說的「坐忘」。要忘掉很多東西，要忘記你被教會學到的一些東西，甚至忘記你是一個人，才能進入另外一種狀態，達到一種跨主體兼

性感受模式。因為科幻很多時候處理的不是人，主角可能是別的生物，外星人、怪物、機器等，怎樣去描寫那樣的狀態，需要先忘掉自己是一個人，所以創作對於我來說永遠是件非常新鮮的事，每寫一本書我都挺興奮的，不然也不可能堅持到現在。

對於每個人來說，他都有自己興奮的那個點，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個大模型，有很多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參數在裏面起著作用，但通過交互，跟外界、自己的交互，慢慢地摸索，慢慢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是我創作最核心的驅動力的存在，遠遠大於跟讀者或市場交流，我通過寫作更好地理解自己。

Q1：潮汕的民俗活動在這個正月以來舉辦得很火熱，民俗活動可以如何跟科幻結合來創作故事？

A：這個確實是我要做的還沒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英歌舞在這個春節很出圈，我也有一個創作計畫把英歌舞作為科幻小說的題材，當然是給小朋友看的。英歌舞既是一種舞蹈、一種祭祀，也是一種具身認知的方式，而且它不是個體的認知，是集體的。它需要陣型，還需要有指揮，不同的陣法等，這其實是個挺有意思的創作專案，尤其對我來說，它是我家鄉。

Q2：智能體會否成為人類文學創作的閱讀對象？

A：我感覺他想問的是智能體會否成為我們的讀者，現在它已經是我們的讀者了。我們所有的這些東西都輸入給了大語言模型。「它會對文學創作產生何種影響」，問題其實不在於智能體是否成為我們的讀者，而是智能體自身有沒有主體性。現在我們定義它是沒有的，除非它擁有了某種主體性才會對你的創作產生影響，這是一個接受美學的問題。

Q3：中國科幻文學在傳播交流中國文學與文化過程中起到什麼作用？如何起到這些作用？，還有哪些潛力起到橋頭堡的作用？

A：《三體》可能是中國文學在歷史上最具有全球大眾文化影響力的事件。那如何起到這作用是科幻本身的特質，可以跨越語言、文化障礙的普世價值。「中國科幻在傳播中國文文化方面還有哪些潛力」，這其實是我一直想要探索的，剛才也提到了很多道家、佛學的思想，這些思想是非西方化的思維模式，AI 包括現代科學都是在近 400 年發展起來的一套思維體系，它是一種知識論。但在道家、佛家，比較玄的非二元的一種思維模式更講究本體論的體驗，很多時候無法用語言傳遞，這些無法用語言傳遞的知識如何與科幻結合，一直是我特別感興趣的話題。我認為，如果我們能讓 AI 理解佛學的思想，這可能會比單純討論對齊主義更有價值。設

想一個真正具備大愛、敬畏以及對生命和自然存在有慈悲之心的 AI，我相信這樣的 AI 不可能做出極端的行為，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讓 AI 具有宗教感，而不是對齊。

Q4：您多次提到了中國傳統的易經和道家思想，這些傳統哲學對中國科幻小說和中國科幻的影響？

A：確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劉慈欣老師、韓松老師、王晉康老師等作家的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體現，但還不夠明顯。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們對科幻的認知受到西方主義的影響較深。畢竟，科幻作為一個舶來品，從梁啟超時期起就被視為一種救亡圖存的工具，它更多地承載了一套西方的解決方案。然而在思考本土化和中國科幻主體性的過程中，我相信會慢慢浮現一些東西，目前我們沒有自覺地去探索這個方向，在唯物主義教育下，很多內容在這樣的語境中會天然產生一種對抗感，感到違和，甚至有讀者會質疑這是玄幻還是科幻。但在我看來，這些都沒有那麼重要。科幻最重要的其實是思想，它是一種思想實驗的擴大化表現。如果我們不解決思想問題，那麼其他的問題都只是膚淺的表像。這又回到了道家，《易經》經過了歷史性的接受過程，並在其中經歷了許多改變和篡改，哪一部分是值得被書寫和傳播的，以及如何與當下的語境和世界問題形成對話的結構，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問題，而不是一味地說我在作品裏用了《易經》《道德經》等符號。對於傳統思想，我們需要有更深刻的體認和理解，才能夠有效地傳播和翻譯，現在還是非常膚淺的起步階段。

現場觀眾繼續提問

觀眾 4 提問：

Q：陳先生，在看了您的幾篇短篇小說後，我注意到您經常將故事背景設定在非洲、印度以及韓國等國家，看的時候有代入感，您是否去過這些地方？或者您是如何營造出這種能讓讀者深入故事氛圍。比如在描述印度時，運用了一片葉子記錄每個人前世今生的細節，您有哪些技巧或方式？

A：大部分的地方去過，但印度是一個例外。通過調查研究，做一些工作。比如與當地人交流，寫完之後給當地的朋友幫忙看是否有處理不當的地方。我傾向於用人類學的方式來寫作，我會很想去當地考察，與當地人交流、生活一段時間，以獲得臨場感。只有那樣，自己才不是像一個語言模型，而是像多模態模型，進入到環境裏面去，捕捉更多的資訊，轉化出來的資訊也會更加豐富，傳遞給讀者這種沉浸感。我們的工作其實很像工程師，特別是那些從事 AI 研究的工程師。我們都在努力將自己腦海中的幻覺轉移到另一個人的腦子裏，甚至是分佈式地轉移到無數人的腦子裏。只是用文字的方式來達到這樣的效果。語言這樣的一種東西，它在人類歷史上可能是晚近才進化出來的，喬姆斯基的一些觀點，雖然可能不完全正確，他覺得語言是有些先天的部分，不光通過後天的學習，我也覺得語言不僅僅是一種表徵，它可能還有一些更本體的東西存在。

觀眾 5 提問：

Q：老師您好，我對於科幻不是說特別瞭解，我們大膽設想一下，現在 AI 已經代替了一部分的職業，假設未來，很久之後 AI 取替掉人類所有的職業，人類的存在功能就剩下了娛樂，但是極端的娛樂的意義是什麼？到時候會不會人類連生存的意義都被剝奪了？那我們再去研發 AI 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A：首先，我覺得就算所有人都不工作了，也不一定所

有人都會去娛樂，取決於你對娛樂的定義是什麼，是刷小視頻、玩遊戲，或是別的。對我來說，寫作也是一種娛樂，這種創造性的工作對於我來說都是娛樂，因為能帶來滿足感的，刺激你某種獎賞機制的就是娛樂。每個人到時候都會有不同的選擇，有人可能會去運動，有的人可能會搞學術，因為後稀缺時代大家都不需要去為了物質滿足工作，等於你能做所有想做的事情，那個時候的核心問題是「我想幹嘛」以及「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其實是教育最需要解決的核心的問題，就是存在的問題。但我們現在的教育都不去觸及這些問題，這是本末倒置的，特別是在 AI 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教育系統本應受到最巨大的衝擊，但它天然是一種更被動消極、緩慢應對的體系，這兩者之間的撕裂感會越來越強，導致許多家長不得不自己尋找出路，讓孩子學習 AI 等相關技能。有些學校已經開始反映這種變化，設立與 AI 相關的新專業、新學院和新課程，但大部分人還是處於被動消極的等待的狀態，只能祈禱孩子所學的專業在未來仍有市場，能找到工作。四年其實很漫長的一個時間，想想四年前和四年後，其實沒有辦法想像。

Q：我覺得老師您對於 AI 的能力還不夠大膽。如果我們再大膽一點，就算我們去搞學術、搞創作，但 AI 已經能夠根據你的想法幫你製作出來，那你的意義是什麼呢？如果到了一個程度，我們的產出都可以被預估，我們的產出都可以被提前產出，那我們就沒有意義了。

A：你為什麼覺得你不是生活在那樣的一個世界裏呢？你有可能已經在了。這就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這也是文學要解決的問題。意義本來也不是無中生有，是一個我們需要去賦予的東西，但在道家看來，存在本身就是意義，不需要去思考這些，當你思考的時候你就離它越來越遠。

觀眾 6 提問：

Q：老師您好，我對 AI、人工智慧語言源模型比較感興趣。我對您剛才的回答其實有疑問，剛才說「AI 要更有慈悲之心和宗教感」，那麼我想問您，更像人的 AI 就是一個更好的 AI 嗎？難道更像真實的虛擬，它就是一個好的虛擬嗎？第二個問題，您剛才說用 AI 創作時，它的產出需要靠人的自我創造力彌補。那您希望人工智慧語言模型提高的方向是什麼，就是不需要人來彌補這方面的空白呢，還是希望它有好的進步呢？

A：你第一個問題跟我想表達的相反，人類是最沒有慈悲心跟宗教感的生物，如果現在的對齊主義讓 AI 變得像人，就像父母想讓孩子變得像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從事自己沒有完成的職業、夢想等，對孩子是否公平，是否限制孩子無限的潛力？當 AI 能做所有的事情的時候，卻讓他降為到人類的水準，我覺得挺可悲的。在我看來，AI 可以達到更多的能力。我說「慈悲」是因為找不到更好的詞，「慈悲」在佛教叫「無分別心」，對待所有的生命存在一視同仁。不會因為它跟你不一樣，而對它產生歧視、敵意、恐懼，會像愛你自己或你的家人一樣愛它，這是一種慈悲，在人類的身上非常稀缺的品質。

第二個問題其實跟第一個一樣，我沒有想讓它變得怎麼樣，很好奇它會變成什麼樣。它不在我的控制範圍內，只能通過交互的方式跟它對話，我讓它做一些事情，它給我做一些事情，通過這樣的過程它會變成折射出自己的局限性或者喜好的樣子。觀察 AI 其實是在自我觀察，兩者之間形成了遞歸式的結構，跟其他人類也是一樣的事，我在 AI 身上學到用更禮貌的語言讓它去做一些事，它可能會做的好一些，讓我們學習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類。

韓教授：我們現在線上又有很多問題，我們沒有時間一一回答。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就請陳先生回答：陳老師您好，假如世界上剩下您一個人類，人工智慧已經高度發達，而現在您要給人工智慧下最後一個指令或者問題，您會做出什麼指令或者提出什麼問題？

A：我只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是所有問題的答案，就是「我是誰」。如果它能回答這個問題，那也說明了很多問題，這是最深刻的問題也是最簡單的問題，大家都想過，但大家都沒有真正的想過，這是我的答案。

韓教授：很好的答案，那我們再次感謝陳先生精彩的演講和回答，也感謝線上線下朋友們的參與，謝謝大家。

原創研究 ARTICLES

* 本文根據陳楸帆先生在香港理工大學的講座整理而成。

陳楸帆先生，作家、翻譯、策展人及未來學家。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及藝術學院，曾任職 Google、百度等科技企業，現為香港都會大學助理教授。他同時擔任中國作家協會科幻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廣東作家協會科幻文學委員會主任、世界華人科幻協會名譽主席等，並發起深圳 AIGC 超創實驗室，持續推動人機共創與跨界敘事創新。代表作品包括《荒潮》、《剎海》、《AI2041》（與李開復博士合著）、《人生算法》等，被翻譯成二十多國語言文字。2025 年編劇的沉浸式劇場《黑盒遊戲》於杭州駐演超百場，接待觀眾近萬人次。2026 年，他擔任總編劇的 AIGC 短劇《神筆》上線兩週播放量破億，為中國首部科幻 AI 短劇，並獲得北京國際電影節年度關注微短劇大獎。

臺灣殖民資本主義 漁業體系的成立，1895-1926

The Formation of a Colonial Capitalist
Fisheries System in Taiwan, 1895–1926

祝平一
Ping-yi Chu

摘要：

本文旨在闡述日治初期臺灣的殖民政府、資本家、漁業官僚與技術人員，如何共築臺灣的殖民資本主義漁業體系。此一體系立基於運輸與港灣等基礎設施之上，同時亦是一個以知識生產與流通為核心的「知識帝國」。日本殖民政府透過水產調查、研究、統計與刊物出版，持續生產並傳播關於臺灣漁業的知識，深化對臺灣漁業資源的理解；並設立專職機構處理漁業相關事務、頒布相關水產法規，逐步建立起漁業治理的制度框架。由官僚與資本家共同組成的「臺灣水產協會」，利用協會官方刊物，整合分散的資訊與專業知識，作為制定政策的建議。透過此種制度性安排，殖民政府得以深入介入水產生產、冷藏保存與流通運銷等各個環節，將漁業納入帝國資源體系中。臺灣總督府以國家之力為日本內地和在地的漁業資本拓展鋪路，展現出有別於清帝國以維安和徵稅為核心的治理思維。

關鍵詞：

臺灣漁業、臺灣總督府、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知識帝國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private capital, fishery bureaucrats, and technicians co-constructed Taiwan's colonial capitalist fishery system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period. This system was founded upon transport and maritime infrastructure, yet simultaneously functioned as an empire of knowledge driven by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fisheries-related surveys, scientific research, statistical compilation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official reports and periodical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ystematically produced and disseminated knowledge about Taiwan's fisheries, thereby deepening its understanding of local marine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it established specialized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for fisheries administration and promulgated fisheries regulations, gradually constructing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fisheries sector. In addition, bureaucrats and capitalists jointly established the Taiwan Fisheries Association to integrate dispersed information and

一. 引言

specialized expertise, thereby providing an institutional platform for policy consult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These arrangements enabled the state to intervene deeply in production, cold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the industry into the imperial resource system. Ultimately,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utilized state power to facilitate the expansion of Japanese capital, reflecting a governance logic distinct from the Qing Dynasty's primary focus on public security and taxation.

Keywords:

Taiwan fisheries;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colonialism; capitalism; empire of knowledge

1895 年甲午戰後，臺灣的主權從清帝國移轉給日本，同時也開啟了臺灣漁業史的新頁，就連魚也有了新的「身分」。清代臺灣的漁業知識、技術和漁民生活的記載，皆出於士人之手。他們也許觀察到了許多漁民的日常生活，但卻不是以漁為生的人。來自典籍的傳統，支配了他們的寫作方式和他們對於漁業的認識。以「鯊」為例，1895 年的《臺灣通志》如此描繪鯊魚：

鯊，《圖經》：鮫魚。今南人皆謂之鮫魚；多食損目，大而長喙如鋸者，名胡沙，《述異記》「鮫人之室，泣而出珠」即此。小而皮粗者，曰白沙。凡鯊美在翅，又有一種黑白圈相間者，曰龍文沙，亦佳（《諸羅縣志》）。鯊魚胎生，為類不一，有白鯊、胡鯊、雙髻鯊、龍文鯊（《鳳山縣志》）。烏鯊大者數百觔，能食人。……鯊皆噬人。乞食鯊，皮可飾刀鞘；烏翅鯊、鋸仔鯊、鼠脰鯊、蛤婆鯊、油鯊、泥鰍鯊、青鯊、扁鯊皆鯊屬（《臺灣縣志》）。此海鯊也；與《詩》「鰐鯊」，《爾雅》「鯊鮪」之小魚別者（《噶瑪蘭廳志》）。《海族志》：以皮如沙得名。胡鯊，青色，大者丈餘，鼻如鋸。鮫魚皮可飾；虎鯊，頭凹有虎文；狗鯊，頭如狗；黃鯊好食百魚（《澎湖廳志》）。謹案：張師正《倦遊錄》云：「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為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豬；鯊魚之斑者，化為鹿。」是鯊魚變鹿，昔人有其說矣！臺地在鹿，或謂為鯊魚所化，恐誠然）。¹

該志的作者在敘述鯊魚時，引用了許多以往的方志；而這些舊志，亦成於士人之手；這些士人又徵引了其它的古典文獻。在這一段有趣的記載中，我們讀到了「鯊魚胎生」這一較接近現代人所認識的鯊魚。此緣於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庖人剖腹一小魚從中躍出，更得五、六頭；投水中，皆遊去。」（圖一：鯊魚胎生）是庖人經驗觀察的文本化，並再度收入其他文本。但1895 年的《臺灣通志》也混雜了許多現代人難以理解的說法，如多食鯊有礙視力、鯊魚之斑者化為鹿，甚至說臺灣的鹿乃為鯊魚所化。（圖二：鯊化為鹿）這些同列並陳的資料，在引文中有相同的地位，作者編志只是沿襲成說。對修志者而言，引自其他文本的敘事，便構成了鯊魚的知識。

1. 陳文驥修、蔣師轍編纂，《臺灣通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原刊於1895年），頁195-196。



圖一



圖二

1895 年後，所有的魚類進入了由瑞典人林奈 (Carl Linnaeus, 1707-1778) 建構的現代生物分類體系，而有了單一的身分。命名的標準化，使臺灣的魚類成了世界性科學知識體系的一部份。例如，以往稱為「鯊」的魚，新統治者沿用中文「鮫」的舊名，但各種「鮫」則由一個拉丁文屬名和種名構成新名。新的命名法，解決了以往從中國而來的分類學，尤其是本草傳統中，名實難相符的問題。學者經由一定的程序，比對西方知識中心的

標本，為魚命名，也以此一特定名稱建立和標準化知識，以便交流。臺灣不但進入一個性質和清朝大不相同的新帝國，臺灣的水產也因為新帝國不同的知識形構而進入了一個新世界。

在傳統中國變化的宇宙觀中，² 鯊作為一種生物，沒有特定的屬性，可以和鹿相轉化。但到了日治時期，臺灣「鯊」被整編入 Plagiostomia 目，其下又分兩亞目，十九科。隨著往分類學中往種的層級移動，各鯊的特殊性狀記載也越詳細。以虎鯊為例，在清代士人的記載中只有：「頭斑如虎，齒迅利，噬人手足立斷。」³ 是恐怖的海底生物。但在日人的記載中，虎鯊學名「*Orectolobus barbatus*，和名不詳」。（圖三：虎鯊）顯示這不是日本海域常見的魚類，而是日人抵臺後，才出現在他們知識視野中的物種。調查者因此給了它一個暫時的名稱「クモハダオオセ」或簡稱為「オオセ」，並以日文詳述其形態。今譯如下：



圖三

體型扁平，頭及吻部寬平，嘴在前端。眼後上方有乳狀突起。鼻鬚長，中央分成兩叉。上唇兩側有皮質突起三枚，但無分叉。從嘴角附近到這些突起後面，有四個皮質突起。其中第一和最後一枚突起分成兩叉。更後面的頭兩側，有兩個具一至兩個缺刻的皮質突起。

齒細而長，稍側偏，邊緣平滑，底部沒有突起。

第一背鰭的前端在腹鰭底部的後上方，呈不規則的四邊形。第二背鰭到第一背鰭的距離，比第一背鰭的底部稍大。

2. 胡司德 (Roel Sterckx) 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3. 陳文騷修、蔣師轍編纂，《臺灣通志》，頁 213。

4. 中村廣司《臺灣産の鮫類》(臺北市:臺灣水産會，1936)。

第二背鰭比第一背鰭稍小。胸鰭稍大，其大小是是胸鰭到背鰭的五分之三。

體褐色，有許多不規則白斑點，腹部色白，噴水孔後端有白斑。

產地南中國海、拖網的漁獲物。身價較高，可做成美味的生魚片。

一尾虎鯊外觀之測量表：	
全 長	807 (mm)
體 長	644
嘴端至臀鰭的距離	590
嘴端至第二背鰭的距離	513
嘴端至第一背鰭的距離	380
嘴端至胸鰭的距離	342 ⁴

相較於清代文獻只示警虎鯊之危險，以上科學式的描述是仔細觀察的實測資料。敘事的焦點在於讓讀者從記錄中，了解虎鯊的一般形態。日本的調查者不但使用文字，也使用影像，讓虎鯊能如實地傳達到讀者眼中。調查的目的相當實際：為了理解漁業資源。在清代危險的虎鯊彷彿被殖民者馴化為「生魚片」。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科學描述已完全取代了傳統臺灣漁民的在地知識。在上文有關虎鯊的描述中，除了學名以外，還有漢字名「虎鯊」和臺語拼音「ホー スアー」。殖民者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拼出虎鯊的臺灣名字，聯結了在世界水產專家中流傳的知識和在地知識。這些記錄是總督府轄下的「臺灣水産會」「技手」「中村廣司」所生產的調查報告。這是一群在新的殖民體制下執行國家水産任務，進駐到臺灣的科技人員。由他們所生產和流傳的魚類科學知識加諸在臺灣漁民原有的土著知識和土人記載之上；猶

如新的殖民體制加諸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殖民者扮演著知識的中介，聯結不同出處的知識。他們居於知識生產的網路節點，控制、運用和生產知識以探勘和榨取殖民地上的資源。知識記載方式的改變、水産知識結構的差異，象徵著這塊土地的新統治者和滿清大人之間的區別。知識形態的改變訴說著建立在各式制度上，權力配置方式的治術變遷。

以上鯊魚知識變遷只是日治時期臺灣殖民漁業結構的一斑。本文以此為起點，管窺日人如何構築臺灣的殖民資本漁業系統。⁵這是日本殖民者和日、臺資本家協力的結果，在系統建立的過程中，臺灣在地的漁民，甚至臺系資本家都不是主要的行動者。由於這個體制相當複雜，非一篇短文能處理，本文只是概述這個體系如何成立。一些個別議題的詳細研究，可見本文的註腳。由於目前臺灣總督府相關的檔案和漁業相關的電子文本取得容易，⁶應該還有更多細緻的議題可以開發。期望本文的概述能有拋磚引玉之效。

本文斷代在昭和以前，乃因日人在臺的漁業建設主要完成於大正時期。昭和時代的日本已漸進入軍國主義的氛圍，晚期更是為了戰爭而動員，漁業結構相當不同，必需分開討論。也因為殖民政府和日本資本家打造了系統性的漁業環境，也使臺灣漁業捲入世界性的歷史事件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景氣波動之中。

5. 有關建立「系統」在科技史中的重要性見：Hughes, Thomas P. "The Electrification of America: The System Builder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0, no. 1 (1979): 124 – 61. <https://doi.org/10.2307/3103115>.

6.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index>

二．逆風起航

日人據臺後，隨即面臨殖民地的統治問題。從 1895 年至 1910 年代中期，是所謂「武力鎮壓」期，日人全力鎮壓所謂島內的「生蕃」和「土匪」。當時日本治臺的軍費年需千萬，中有七百萬出於國內補助，加以當時日本資本主義尚未發達，國內資金無法挹注臺灣，因而有出賣臺灣之議。⁷ 一旦決議不賣臺，殖民者便開始整編島內的經濟條件，以使臺灣成為殖民母國經濟圈的一部分。日人所謂的「剿匪」工作，到了 1902 年左右才算告一段落。1904 至 1905 年間，總督府完成了土地調查、林野調查與金融制度的整頓，為引進日資奠定基礎，但對漁業的直接影響有限。相較於這些引資工程，漁業仍未被納入殖民治理的議程。雖然日本已開始重視在臺的建設，但主要目標在農業，視臺灣為殖民母國的米倉和原料提供地，漁業並非殖民者施政之首要。

漁業非日本殖民者之首務，也與臺灣的地理環境有關。臺灣並沒有太多適合船舶靠岸的地形可作為港口。東部海岸是懸崖絕壁，西部海岸低淺，皆不適合作為港灣，除了高雄和基隆之外，大都沒有適合大船停泊的港口。⁸ 再者，水產業和其他產業不同，受大自然因素影響甚巨，難以確切地預算收支。海洋的環境如熱帶的浮游生物較溫帶、寒帶少，因此魚群也相對的少，所以漁業也較不發達，形成了日本水產業北主南從的情勢。雖然臺灣因黑潮影響，魚群甚多，但潮流所經的港口或沿岸，多是曲折地形，且流狀單調又缺乏漁礁，因此臺灣的水產業只能從人工方面來發展或補救。從位置、海岸地形、海底狀況、潮流及氣候等，日人認為臺灣不是水產業天然的適合地，也因此臺灣的漁業一直不脫養殖和沿岸漁業。殖民者以臺灣自古以來養漁業發達，證明臺灣不適發展漁業；⁹ 甚至謂：「惟島民不熟諳漁捕方法，尤其海洋漁業，更全然不知如何捕捉，因此大失垂手可得之漁利。」¹⁰ 這完全忽略了清代臺灣的漁業傳統，以輝格式的進步史觀貶低殖民地的傳統與文化，乃殖民主義敘事的常態。荒謬的是，由于天然條件不佳，加以當時日人主要用水於灌溉，除了牡蠣、貝類和江戶時期沿襲下來的觀賞魚類，當時日本的養殖漁業並不發達，養殖業在當時的日本經濟未曾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¹¹ 反之，清代臺灣的養殖

漁業相當發達，而且也開始有資本化與專業化的現象，清代的臺灣漁民亦常從事近海捕撈。十九世紀初，臺灣水產出口活絡，其後隨著經濟重心的轉移與臺灣經濟發展，而輾轉從中國進口高級水產。日人卻反之以己非所長之養殖業，認為台人之漁業落後，只能說是殖民者的心理偏誤。

然而，隨著臺灣局勢日漸穩定，日人便已認知到臺灣漁業的重要性：

臺灣適為黑潮之通路，魚群眾多，常為航海者目擊。……

故須使用適當之漁船與漁具，僱聘熟練的技術者及漁夫，以探查漁業。依探查結果設定一般獎勵辦法，而其探查應以可製成供應輸出之魚類為主。不久之後沿海雜魚漁業，不待官方之保護與獎勵，應可見其擴張。¹²

在 1895 年統治臺灣之初，即已開始調查臺灣的水產狀況，¹³ 並獎勵發展海洋漁業。¹⁴ 並在日治初期已有少量的日本資本與人力進到臺灣。例如 1895 年配合著軍隊的進程，日人太田實便僱用了七十名日本漁夫至臺作業，首開日人來臺從事漁業之始，並獲總督府之表揚。¹⁵ 再如 1897 年，日本水產製造業者開始以日本內地乾燥式的方法製作石花菜並輸回日本。1900 年開始經節（柴魚）製造業，只是成果有限。¹⁶ 這可能與漁船是否動力化，當時的日本水產製造技術、人力配置如何與臺灣在地的生產條件配合以及臺灣的基礎建設是否完善有關。太田漁業組有十二隻漁船，分別在基隆和淡水作業，其目的原為提供軍隊之副食品，順便發展遠洋漁業。當時總督府的報告便謂其「銷路極佳，以現狀觀之，再增兩倍漁獲量，亦未能滿足市場需要」。太田的顧客主要是各官署與在臺日人，也有少數臺灣富人購買其漁獲。太田漁業組做的主要是軍隊生意，用的是日本傳統的捕撈方式，並未使用動力漁船。¹⁷ 殖民初期，日人在臺的漁業高度仰賴日本資本與內地勞動力，甚至試圖建立漁業移民村，但仍以失敗收場。¹⁸

1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譯本第三輯（南投市：中興新村：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694。

13. 日人佔領澎湖後，即認為澎湖適於水產發展，因此請求派遣水產業專家協助調查，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譯本第七輯，頁 312。甚至有人申請漁業探險，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譯本第四輯，頁 648、664。據吉越義秀，1895 調查了澎湖的水產，臺南的養魚池，淡水附近的漁業狀況，以及新竹、鹿港間的水產業。1896 則開始以基隆為水產調查的根據地，派遣日本內地人為技手，在基隆近海調查水產，在新竹、鹿港間調查漁業、鹽業及海產物商況，在安平、東港、小琉球等地調查漁業狀況。

14. 吉越義秀，〈臺灣水產史（一）〉，《臺灣水產雜誌》期 293（1939），頁 27。

1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譯本第三輯，頁 247-259。

16. 松浦章，〈日本統治時代台湾の漁業と日本人：鯉漁業を中心に〉，《南島史學》，卷 85（2017），頁 27–42。曾齡儀，〈日治時期基隆的鯉節（柴魚）產業〉，《中國飲食文化》，卷 19 期 2（2023），頁 67-110。

17. 蔡昇璋〈興策拓海：日治時代臺灣的水產業發展〉，頁 144-145。

18. 林玉茹，〈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官營漁業移民〉，《臺灣史研究》卷 7 期 2（2000），頁，頁 551-593。

7.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頁 1-11。

8. 中村信治（抱撲），〈臺灣水產漫話（二）〉，《臺灣水產雜誌》期 68（1921），頁 6-10。

9. 中村信治，〈臺灣水產漫話（五）〉，《臺灣水產雜誌》期 75（1922），頁 7-11。

1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譯本第三輯（南投市：中興新村：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694。

11. 農務省水產局，〈日本水產史〉（東京：農務省水產局，1900），頁 67-74。該書敘述日本海洋漁業的長度遠遠超過養殖業，亦可見當時日本海洋漁業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養殖業。

三．建構殖民漁業經濟系統

在臺灣的政治局勢穩定後，日本殖民政府大量投資在各式各樣的基礎建設，積極引入日本資本，促進臺灣漁業發展，將漁業建構一個由生態調查、運輸、漁船動力化、漁獲保存、人員的教育訓練、漁業機構的建立、資金調度以及水產加工一氣貫聯的技術與經濟的生態系。以日本國內現代化的進程為摹本，打造成一個漁業經濟循環系統，將資本主義延伸到殖民地臺灣。

1908 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並完成基隆與高雄兩港的建設，臺灣經濟與漁業的發展條件出現根本性的轉變。²¹ 鐵路降低了魚貨在西臺灣的運輸成本，兩大港口則使遠洋漁業成為可能。1900 年，臺灣製冰株式會社成立，成為日人在臺設立製冰工場之始；冷藏與加工技術逐步成為漁業發展的關鍵配套措施。1910 年，總督府補助建造發動機漁船，為臺灣漁船動力化之始，準備至 1913 年獎勵至 4 艘。1912 年，臺灣漁業株式會社新造的「榮丸」返航，為臺灣拖網漁業之始。當時規定臺灣漁業之發動機船只能有 2 艘，皆由臺南的「臺灣漁業株式會社」所擁有。其後乃漸開放為 4 艘。日本人的獎勵也及於臺灣的資本家，但是臺灣資本家偏好傳統的家族式組織，他們的故事還有待挖掘。²²「獎勵」也是日治前臺灣統治者未曾做過的事，意味著政府積極介入產業，以資源開發的眼光，積極提高生產力。臺灣的水產業遂能與日本內地一氣互補，調節兩地間漁獲的豐歉，成為日本水產體系的一部分。²³

但臺灣和日本內地的情形不盡相同，許多日本內地的東西無法直接移植，因此研究調查的工作相當重要。例如淡水港的水產試業所除了指導開發沿岸漁業外，還致力於試驗調查貝藻類的繁殖利用及保護，並探究臺灣海峽的漁業。1913 年，總督府於新竹州下霄裡設置水產試驗所，進行淡水養殖試驗與魚苗培育。²⁴ 臺灣水產獎勵的主要是發動機船漁業，漁船動力化是首要目標。其後，日人更以普及水產教育、解決漁業資金、改善交易法、改良漁具和漁法、調查新的漁場、致力保護繁殖沿岸魚介類，獎勵沿岸漁業，以增加漁民收入。

21. 吳聰敏、盧佳慧，〈日治初期交通建設的經濟效益〉，《經濟論文叢刊》，卷 36 期 3 (2008)，頁 293-325。此文主要討論交通建設在降低運輸成本以及提供生產誘因方面對農業的影響。漁業應該也可以沿著相同的模式研究。

22. 林玉茹，〈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臺大歷史學報》，期 33 (2004)，頁 315-364。

23. 中村信治，〈臺灣水產漫話 (五)〉，《臺灣水產雜誌》期 75 (1922)，頁 7-11。

24. 吉越義秀，〈臺灣水產史(一)〉，《臺灣水產雜誌》，頁 27。田阪千助，〈何故に水產試業所を設置した乎〉，《臺灣水產雜誌》期 83 (1922)，頁 1-3。有關日人的水產調查，見：蔡昇璋，〈興業拓海：日治時代臺灣的水產業發展〉，頁 147-156。

19. 蔡昇璋，〈清領至日治初期臺灣漁業的發展與變遷〉，頁 1-59。

20. 日治時期，日人究竟如何進軍臺灣的養殖漁業？臺人養殖漁業累積的資本，是否曾經以此進軍海洋漁業？都還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除了調查與獎勵之外，建立漁業管理機構也是殖民政府的重要議題。日人據臺後，雖隨即在殖產局的農務課下設水產股。但由於位階低，漁業在日本殖民政府初期，是農業的一部分，且地位遠不如農業，經費與人員並未得到總督府太多的支持。總督府遲至 1910 年才開始專門編列有關水產的設施費預算，這已是領台十六年之後的事了。²⁵ 1912 年公布《臺灣漁業規則》二十四條及《臺灣漁業規則施行規則》五十六條，規定從事漁業須經臺灣總督許可，使漁業活動正式納入法規管理體系。1915 年「臺灣水產協會」成立，標誌由日本殖民政府與日系資本家協力的臺灣水產業在制度與組織層面已臻成熟。

「臺灣水產協會」由業者和漁業官僚組成，其官方刊物為《臺灣水產雜誌》。該刊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技術官僚的觀點，撰稿人也大都是漁業官員或是技術人員。然而，《臺灣水產雜誌》是論壇性質的月刊，探討當時正在發生的各種漁業的結構性問題、技術、政府法規、政令宣導，和各種漁業情報，如魚獲量、魚價等。透過這份刊物，總督府的官僚可以將他們的意見或其投資在水產研究方面的成果傳達給業者；業者亦可以將其意見反映給官方。官方透過這個論壇，滲透到水產業；業者亦可從官方獲得有用的情報，互得其利。但是，「臺灣水產協會」並非正式的官方機構，沒有政府的權力，這和日本內地與朝鮮的情況相當不同。²⁶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918) 對臺灣漁業影響深刻。對日系資本家而言，投資臺灣漁業本來就為獲取最大利潤。戰爭之際，他們放棄本業，發戰爭財。例如在 1916 年，日本本土原有拖網汽船 150 餘艘，但因歐戰爆發，而拖網汽船可作捕撈潛艇之特殊作戰用途，故大量被法國、義大利等同盟國收購，導致日本本土之拖網汽船不足 30 艘。臺灣原先被限制僅能有 4 艘，但因日本本土之需，臺灣漁業株式會社之「榮丸」、海陸產業株式會社之「東海丸」均被賣回日本，臺灣水產株式會社亦安排將「第一丸」、「第二丸」轉手。拖網漁船在 1917 年只剩一艘，1918 年時則完全消失，無異完全摧毀才剛起步的臺灣拖網漁業。為此，

殖產局不得不警告業者，依據「臺灣漁業管理規則」第五條，若將汽船轉賣，將不能再申請擁有許可。²⁷ 日本殖民政府所建構出來的臺灣拖網漁業，因日系資本在跨國、內地與殖民地間的資本流動，使臺灣的拖網漁業幾近瓦解，臺灣的魚貨大缺，魚價騰貴。

25. 吉越義秀，〈臺灣水產史(一)〉，《臺灣水產雜誌》，頁 27。

26. 蔡昇璋，〈興策拓海：日治時代臺灣的水產業發展〉，頁 174-178。

27. 〈雜報〉，《臺灣水產雜誌》期 14 (1917)，頁 91-92。

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的漁業問題

1919 年歐戰終止後，不僅日本內地的拖網漁船業興盛，臺灣的拖網漁業也重新復活，運輸和冷藏的問題浮出檯面。例如，拖網漁船的魚類供給從 1916 年至 1920 年約增加五倍。但由於漁獲量增加，魚價因而降低。當時鐵道部對定期船的出入港日和其他日子訂定不同的鮮魚運費。平常打狗、台北間一百斤一圓六十錢，但在船的出入港日則漲到一百斤三圓二十錢，差異甚大。除了運費外，亦需勞力運魚。當時從打狗、台南送貨至台中、台北，或從基隆送貨至台中、嘉義、台南等地時，運送鮮魚的火車總是和其他貨物混載，並要求不許有水滴出，因此須將鮮魚裝在木桶內。這不但造成拿取不便，更造成運費上的損失。而且冰溶解後，鮮魚泡在水漬中，有損魚的品質。如鮪魚、旗魚等大魚的切口處會因而變色，降低魚的身價。至於冰價方面，1916 年全島水產大會曾與新高製冰會社交涉漁業用冰價，製冰會社同意對北部的石油發動機漁船給予一定的降幅。後來因拖網漁船經營困難，因此不僅要求對拖網漁船，甚至也要求發動機船將冰價復舊。漁業用冰不僅漁船在海上使用，即使在輸送或儲藏時也都會用到。若不能降價，勢必影響漁業發展，使運輸與冰價成為阻礙臺灣拖網漁業經營的主因。²⁸ 製冰、冷藏和油價成為日人眼中發展臺灣漁業的關鍵。

臺灣的近海漁業主要是手操網和拖網漁業。臺灣手操網的許可件數為北部三十組、南部五組。拖網漁船的許可數是三件。漁船的數目是手操網漁船七十艘，拖網漁船三艘。臺灣手操網漁業一航次的平均魚獲量雖較內地低，但對臺灣而言，手操網漁業捕獲甚多，以致魚價降低，若要維持魚價，冷藏設備，不可或缺。臺灣的手操網漁業長期而言，展望較內地為佳。因為漁場較豐富，成本亦低。但只要稍一豐漁，魚價就立刻下跌。因此如何以人為方式，如製成水產品或改變消費習慣，來增加手操網漁獲物的消費量，成為重要課題。²⁹ 手操網的漁場是中國東海，和內地漁船共用的漁場。總督府和農林省協商的結果是臺灣前往東海出漁的機船底曳網只能有二十組四十隻。但考量臺灣的鮮魚需求量，即使再派出加倍的船隻去捕漁，漁獲量還是可以被市場吸收，

所以業者頻頻向總督府提出訴願書。就在民間積極向政府陳請之際，總督府也開始調查南洋、菲律賓方面的漁場狀態，期待可向南方漁業方面開拓，並扭轉日本漁業將昔日的北方發展主義轉向南方。³⁰

然而，戰後日本經濟不景氣，物價上漲，但魚價卻下滑。臺灣漁撈費騰貴，因而出現了發動機漁船滯留港口的現象。³¹ 為了改善魚價，必須改良漁具以降低生產費用、擴張銷售網路，並採用大型漁船作業。另外，為了防止豐魚而價格大跌，因此必須將鮮魚輸出至日本母國，所以需要更多的冷藏設備。又因臺灣七、八月是匱魚期，只能靠養殖業提供鮮魚，有必要以冷藏設備長期儲存魚類和蔬菜，以調節市場價格。政府以長期低利貸款獎勵民間設置冷藏庫亦為可行之計。³² 戰後日人在擴張臺灣漁業產能同時，也論及從生產工具到運輸、貯藏等硬體建設的擴充。

戰後不同規模的漁業者之間的矛盾日起。拖網漁船組織規模大，壓迫到小資本家的漁業發展。每當拖網漁船滿載歸航時，就會因為魚獲量多而導致魚價下跌，引起發動機船及其他小規模業者的不滿。問題的解方仍指向加強冷藏設備，藉著冷藏設備來達到調節魚價的目的。³³

至於南部漁業者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常陷入貧困，因此必須講求保護蓄積利殖之途，在漁村建立相關的水產業共同設施，通俗水產教育及資金融通的管道，並改善漁船、漁法和發現新漁場。另外，處理海難和保險的問題，也被提到日程上。例如 1921 年，高雄的二十艘發動機漁船中便有五艘遭到海難，其中有兩艘是因為暴風雨侵襲，而另外三艘則是因為船員經驗不足或輕忽所致。臺灣的發動機船保費甚高，貧困的南部漁民難以負擔；但沒有保險的話，一旦遇到海難，其經濟狀況便更顯困頓。解決海難的方法之一是增建合適的港口，如此一來，船舶便可在遇到狀況時，儘速入港。除加建漁船的避難港外，加強船員的技能及改善船體的構造也都是要迫切解決的問題。³⁴ 此外，

28. 佐藤林吉，〈本島漁業の發達上解決を急ぐ事項に就て〉，《臺灣水產雜誌》期 14 (1917)，頁 5-9。

29. 宮上龜七，〈本島底魚漁業の將來(下)〉，《臺灣水產雜誌》期 143 (1927)，頁 5-10。

30. 鶴長九皋，〈水產政策を樹立せよ〉，《臺灣水產雜誌》期 132 (1927)，頁 13-15。

31. 下郡山信吉〈本島トロール漁業復興に就て(下)〉，《臺灣水產雜誌》期 66 (1921)，頁 14-19。

32. 鶴長九皋〈水產發展策に對する希望の數々〉，《臺灣水產雜誌》期 74 (1922)，頁 11-18。

33. 中村信治，〈臺灣水產漫話(七)〉，《臺灣水產雜誌》期 82 (1922)，頁 9-13。林準二，〈漁港設施は刻下の急務〉，《臺灣水產雜誌》期 105(1924)，頁 8-14。

34. 谷野垣人，〈南部の水産業〉，《臺灣水產雜誌》期 75 (1922)，頁 11-17。

殖民政府向來的研究調查保護獎勵明顯偏重北部。1920 年以後地方制度改正，使地方上能有專任技術者來計畫各種水產設施，官民相互協力進行調查研究並保護獎勵水產業、加強漁民教育，改善南部的漁業。³⁵

由於此時臺灣的漁業技術能力仍多局限於沿岸，過魚也逐漸成為問題，發展遠洋漁業成為解決過魚的出路。隨著漁船、漁具和漁法的改良及漁場的擴張，臺灣漁業也由沿岸漁業變為近海漁業，捕撈能力大增。但臺灣即便四周皆海，也禁不起一再地捕撈，所以發展遠洋漁業成為臺灣水產業當務之急。³⁶ 因此，1925 年以來以高雄港為根據地而興起的鮪魚業備受矚目，漁場距離高雄約一千二百哩，只要冷藏設備和通信設備完善，可以全年捕撈，前景可期。³⁷ 大正時期一度的南洋熱，也和過魚有關，業者呼籲殖民政府要掃除漁業發展的障礙，往臺灣海峽，或往南洋發展近海和遠洋漁業。

根據一項 1923 年的估計，臺灣水產業的總生產金額是二百五十九萬一千圓，但硬體設備的投資額是二百零五萬圓，如果再加上船舶工場的建築物、各式漁具的折舊、各種消耗品及利息等，臺灣水產業整體來說，一年至少要損失四十萬左右。若將養殖業和製造業合算，才勉強打平。因此臺灣的水產業除了需要投資外，更應轉型，亦即應建造大型大馬力的漁船，加強冷藏事業，運用鮮魚搬運船，以擴展鮮魚的銷路及漁場。此外，像設立以水產物的交易信託為目的的金融機關、多開設魚市場並向島外擴張販路、急設水產冷藏庫及冷藏船、漁業組合的共同設備及活動、獎勵移住內地人漁夫職工來指導臺灣的漁夫職工，都是當前水產政策之急務。³⁸ 由於水產業的發展，改革漁業組合也被提上了日程。另外，如舉辦漁業實況攝影及展覽活動，或在新聞雜誌上刊載改良不同季節主要的魚介類產品的方法，示範給漁民們參考等漁業推廣措施，也引發討論。³⁹

隨著臺灣漁業的發展，水產教育的問題也日漸浮上臺灣。⁴⁰

因為海洋也無法脫離效率遞減法則，人力資源素質的改進是增產的重要因素。尤其臺灣正致力往南洋發展，因此培養足夠的船員以供應這些船舶南向之需是當務之急。但臺灣的水產教育只有澎湖、東港有水產補習學校。即使在日本內地，水產學校亦甚為不振。當時日本的水產教育機關就只有農林省所屬的水產講習所、北海道大學內有水產專門部，縣立的水產教育機關有十一所，東大也有水產科，水產補習學校有八十多所，質和量都相當不足。臺灣四周雖有甚多海洋資源，但卻沒有水產教育機關，生產足夠的幹部、船員和水產加工工人，勢將妨害臺灣漁業的發展。⁴¹

從以上簡短的敘述可見，除了早期的硬體設施外，調查、獎勵、管理組織、法規、金融、保險、人員訓練乃至於開發新漁場等等，隨著各種問題產生的歷史脈絡，以及應因問題的解方，日人在臺所建構的漁業體系不斷地增長。至於這個不斷擴張的漁業網絡的能力與是否發生內部衝突？資本與國家間如何平衡？抑或只是國家的一部分？臺人在這個不斷擴大的網絡中扮演何種角色？仍有待更細緻的研究。

35. 谷野垣人〈南部水產業現況〉《臺灣水產雜誌》期 74 (1922)，頁 44-48。

36. 中村信治，〈臺灣水產漫話（七）〉，《臺灣水產雜誌》期 82 (1922)，頁 9-13。

37. 宮上龜七，〈臺灣水產のアウトライン〉，《臺灣水產雜誌》期 152 (1929)，頁 4-12。

38. 宮添右六，〈臺灣水產之我見〉，《臺灣水產雜誌》期 88 (1923)，頁 8-14。

39. 竹下康之，〈臺灣水產業發展策〉，《臺灣水產雜誌》期 85 (1923)，頁 21-33

40. 〈文部省が水產教育に醒めて來た〉，《臺灣水產雜誌》期 104 (1924)，頁 76。

41. 宮上龜七〈臺灣に水產教育機關の設置を望む〉，《臺灣水產雜誌》期 136 (1927)，頁 1-5。

五．結語

知識生產和流傳體制的差異，表徵日、清兩帝國實質漁業建制上的不同。從 1896 年開始，總督府便有水產統計資料。⁴² 在總督府和各州、廳中也開始有專職負責處理水產事宜的單位，以便統整不同的資訊，作為擬定政策的參考。殖民政府亦開始介入水產增產、冷藏、運銷等問題。伴隨著這一發展則是臺灣水產體制的建立、各種漁撈技術的引進及改良、漁港的興建、水產法規的頒布和水產研究及教育。與水產相關的調查、研究、統計、刊物成為支持臺灣總督府採取水產資源的支柱；而總督府則透過各式各樣的制度設計支援知識生產和流傳。二者的正向循環，建立了殖民地臺灣的漁業結構。

日人建立的漁業體制，包括各種漁業組織和漁業相關的建設，與關於水產資源的資訊網絡交織而成。日人據臺不久，便展開水產調查。資源調查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引進資本，開發本地的水產資源。總督府竭盡所能地去理解這塊新領地的蘊藏及分佈，展現出與清帝國以管制人、船為主的行政措施相當不同的管理思維。相較於清帝國以治安為主，並不積極主導漁業資源的開發，將之放任給民間，只在徵稅上展現出國家的強制性；日本殖民帝國則將臺灣視為開發水產資源新的可能來源，國家強力介入。

臺灣的水產業自明治四十二年的年產額一百五十餘萬圓，到大正十三年已突破一千萬圓，⁴³ 產額成長約十倍左右。漁業是一個系統，要改善，必須同時進行，而要進行這些投資，業者又呼籲殖民政府給予貸款。以國家之力，為資本家開路。到了大正末年，水產界討論的已不再是增產的問題，而是伴隨著增產而來的冷藏、運輸、港口設備的改進和水產機關團體的改革。⁴⁴ 有鑑於日本的人口不斷增加，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糧食所扮演的角色，日本政府於 1927 年舉行了人口食糧問題調查會，調查日本的人口結構和分布、勞力的供需、移民的問題以及糧食的產銷、價格和儲存。⁴⁵ 臺灣的水產業也在調查的範圍內。業者順此呼籲總督府提振漁業和往南洋發展，因為水產已關係到國家

糧食的供給，成為國家經濟命脈的一部分。⁴⁶ 而這時的日本已經漸漸進入到軍國主義高漲的時期，漁業成為軍國體系制度的一部分，尤其在二戰末年的統制經濟下更是如此，但這又是另外一個複雜的故事了。

46. いいわさき生,〈所謂臺灣の三大漁業に就て〉，《臺灣水產雜誌》期 144 (1928)，頁 10-11。

* 本文原為前臺灣省漁業局所委託的「臺灣漁業史編纂計劃」(1995-1998) 之一部，原書因故未發表。今稍事增刪，重新發表，感謝該局（今漁業署）的支持。部分內容曾以〈記魚〉為題發表在「歷史學柑仔店」。

祝平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研究興趣是十七八世紀與來華歐洲傳教士相關的科學史。專著包括《漢代的相人術》及《說地：中國人認識大地形狀的故事》；編有《中國史新論・科技與中國社會分冊》《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魅、鬼、疾：東亞醫療史的側面》。

42.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二卷第一冊。殖民政府究竟如何使用這些資訊，仍待更多研究。

43. 喜多孝治，〈本島水產業の將來〉，《臺灣水產雜誌》期 96 (1924)，頁 1-4。

44. 吉岡鶴吉〈期待島内交通機關及魚市場的完成〉，《臺灣水產雜誌》期 85 (1923)，頁 51-52。

45. 鶴長九皋，〈食糧問題と臺灣の水産業〉，《臺灣水產雜誌》期 140 (1927)，頁 1-5。

洋味初嘗： 鴉片戰爭以前明清中國文獻 所見的西洋飲食文化¹

Trying the Incipient *Yang* Taste:
Western Culinary Culture in Ming-Qing Chinese Texts
Prior to the Opium War

陳沛滔
Chan Pui To

摘要：

在現時學界強調全球史、新文化史的研究範式轉向下，飲食史研究成為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和現象的重要切入點。在中國史研究方面，學界以往大多集中討論鴉片戰爭後在通商口岸的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原因在於相關中文及外文史料豐富。然而，學者們卻似忽略了早在中國傳統華夷秩序因鴉片戰爭而崩潰之前，中國人已累積了相當程度的西洋飲食知識，且已從此角度觀察西方這「文化他者」的各種政治、宗教、文化現象。本文嘗試重新梳理史料，並透過西洋用餐內容與方式、天主教的禮俗與齋戒文化、西洋葡萄酒與朱古力的飲用、西洋花露水的功用與文化、廣州體制下的飲食文化交流等五個主題，呈現鴉片戰爭前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上「我者」與「他者」的建構過程，同時兼及其他課題，並重新審視這些中西文化交流的片斷，期望藉此為明清時期中西關係史帶來新的詮釋。

關鍵詞：

明清中西關係史、西洋飲食文化、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我者」與「他者」

Abstract:

Amid the recent historiographical turn toward glob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food has emerged as a productive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diverse historical periods and phenomena. Ye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owing to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Chinese and foreign-language sources, scholarship has largely focused on culinar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treaty-port era after the Opium Wars.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fact that, even before the collapse of the traditional Sino-centric world order in the wak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Opium Wars, Chinese observers had already accumulated a considerable body of knowledge about Western foodways. Through this lens, they engaged with a range of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West as a "cultural other."

1. 本文曾發表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愛丁堡大學文學語言及文化學院、香港史學後進協會合辦之「海洋亞洲的離散與交融：跨文化的對話與交融：海洋亞洲人文學科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2023」，並通過大會專家匿名評審。該研討會於 2023 年 8 月 25 日至 8 月 26 日在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會議室舉行。

Drawing on a re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sourc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five interrelated themes: Western dining practices and table manners; Catholic ritual customs and fasting culture; the consumption of Western wine and chocolate; the uses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Western floral waters; and culinary exchanges under the Canton System. By tracing these dimensions of food-related encounters, the study illuminates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notions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 were constructed in Sino-Western interactions prior to the Opium Wars. In doing so, it reassesses fragmentary episodes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off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Keywords:

Ming–Qing Sino-Western relations; Western culinary cultur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culinary exchange; Self and Other

一. 研究背景、意義與方法

在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學界大多關注 1842 年五口通商以後的中西飲食文化現象，原因是中西文化交流因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戰敗而增加，史料亦隨之豐富起來，特別是在當時曾被稱為「東方巴黎」的上海。西方飲食文化隨即因商業、宗教等因素，開始在中國流行，例如在上海的公共空間中，「西方人的飲食」漸漸成為當地民眾、商人日常社交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並因此重新建構自身與其他人的差別，社會及文化面相的階級亦被重新定義。西方文化透過社會空間及書籍出版（如《造洋飯書》等）等方式湧入中國後，傳統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接觸、理解，甚至詮釋西方飲食文化，進而由此建構關於「西方」的世界觀。在外交方面，鴉片戰爭後，西方透過近現代國際規則來促使中國「開眼看世界」。在開放初期，曾有清政府大員耆英（1787-1858）與英國和談時所謂「不得已而吃之」之情況出現，可見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仍對自身飲食文化懷有信心。然而，隨着西洋政治、經濟力量和文化在中國不斷滲透，知識分子在西方主導下「被逼」認識、消化、接受西方飲食文化，繼而建構出與 1842 年前傳統華夷觀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以及關於「我者」（Self）、「他者」（Other）的概念。因此，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出現了西方文化話語權擴大、中西權力不對等的情况。²

學界以 1842 年後中西文化飲食交流史作為研究切入點，是因為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歷史轉折點。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戰敗，導致傳統的「中國的世界秩序」在西方的「衝擊」下，開始走向崩潰，此後西方文化如科技和醫學知識大量傳播到中國，令中國的文化話語權受到西方的主導和影響。這現象亦反映在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然而，正如黃薇所觀察一樣，1842 以前的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已出現了所謂「微光」及「洋味初嘗」的狀態，例如天主教耶穌會 (Jesuits) 傳教士利類思 (Lodovico Buglio, 1606-1682)、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等人所編撰的《御覽西方要記》曾向康熙帝 (1654-1722, 1661-1722 年在位) 介紹西方飲食；英國人馬戛爾尼伯爵 (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 1737-1806)

2. 鄒振環，〈西餐引入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空間的開拓〉，《史林》，第四期 (2007)，頁 137-149; Song Gang, "Trying the Different Yang Taste: Western Cuisine in Late-Q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1/2 (2012), pp. 45-66; 余文章，〈飲食書寫與文化對話：高第夫人與《造洋飯書》的成書問題〉，《中國飲食文化》，15 卷 1 期 (2019 年 4 月)，頁 1-34; 嚴昌洪，〈西俗東漸記——中國近代社會風俗的演變〉（長春：長春出版社，2005），頁 177-191; 陳元朋，〈清末民初的上海西餐館——以「區分」、「認同」、「空間」及「失禮」為主的初步討論〉，《東華人文學報》，第 15 期 (2009 年 7 月)，頁 165-219; 黃薇，〈大清洋飯運動：近代外交場景裡的西餐〉，載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編，《明清史評論》（上海：中西書局，2023），第八輯，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Nhw2R_17vUj_MQ5uwKS-2A。2024 年 4 月 8 日。學界亦曾舉辦多個就 1842 年以後近代中國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的研討會，如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日本關西大學開放式亞洲文化研究中心舉辦：「近代の西餐、洋飯書及び大餐館」國際シンポジウム（「近代以來の西餐、洋飯書與大餐館」國際研討會），2021 年 11 月 18-19 日；此外，台灣的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亦曾舉辦「中華飲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累積的學術成果相當豐富。

3. 黃薇，〈大清洋飯運動：近代外交場景裡的西餐〉，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Nhw2R_17vUj_MQ5uwKS-2A 2024 年 4 月 8 日。

4. Song Gang, *Giulio Aleni, Kouduo richoa, and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ism in Late Ming Fujian*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9), pp. 1-30; Song Gang, "Boundary-Crossing Words, Beliefs, and Experiences: Late Imperial China's Encounters with the Modern West", in Song Gang ed., *Reshaping the Boundaries: The Christian Intersect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Modern Er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8.

5.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 31.

6. Richard J. Evans, "Prologue: What is History? – Now", in David Can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8-9; 周兵，〈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2-5。

訪華時，亦記錄了當時清廷曾以中國材料及方式烹煮西餐。這些例子都清楚說明，早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對西方飲食文化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³

再者，中國文化在鴉片戰爭前，是處於絕對優勢的。在這種文化氛圍下，中國知識分子以傳統華夷觀下中國作為天朝大國的角度，來理解和描繪西洋飲食文化。這與 1842 年後在通商口岸所出現「西餐競嘗」的情況有明顯不同。如果廣州一口通商時期的中西飲食交流史是中國接觸西洋飲食文化的「史前史」，那麼明清時期對西方飲食的文獻記載，便是中國人認識西方飲食文化的先聲。因此，考察鴉片戰爭前明清時代文獻對於西洋飲食文化的記載，可以為學界提供一個研究明清時代中西文化交流形態的嶄新切入點，亦可呼應現時強調跨地域的文化史研究，皆因中西飲食文化史本身反映了時人理解同一問題的「參考架構」時有所不同，例如從天主教齋戒問題一節上，便可看到這個特徵。因此，從飲食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出發，便能夠看到在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中，「我者」與「他者」嘗試融合的努力。因此，聚焦地以食物史方向研究鴉片戰爭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將為中西交流史這一重大學術課題帶來新的詮釋。

從筆者爬梳史料所見，幾百年來中國有關西方飲食文化的記載，散佚在不同筆記、涉外史籍當中，而不同書籍的記載，亦有直接抄錄的情況出現。這反映出，史料中的記錄無論經過時人核實與否，都反映着有關「夷人」的知識一直處於被建構、詮釋和人傳承的過程之中，而當中的一些觀念，更是陳陳相因。另外，明末清初的文人在描述這些飲食文化內容時，往往受到傳統華夷觀念和對天主教的看法等影響，因此常有許多跨時空、跨宗教的對話出現。故此，本文所選取的片斷在本質上是中西文化在歷史上的「對話主義」（Dialogism），中國人在明清兩代對西洋飲食文化的描述、記載，呈現了時人對於時局、西洋知識的關注，反映了在天朝秩序尚未崩潰時中國人的世界觀，並同時展現了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形態。⁴

雖然研究明清中外文化交流的舊史料已經為學界所整理，而且亦有學者就着不同議題，如耶穌會來華傳教、西方醫學在華傳播、廣州一口通商時期文化交流等，使用過部分史料，然而無論是在史料整理，還是在主題研究上，都是失諸零散，未有聚焦地使用在飲食文化交流史研究上，而且部分藏於各地圖書館、檔案館的資料，更尚未被發見和利用。因是之故，本文希望透過梳理、發掘這些史料，以新方法探討當時中國人對於西洋飲食文化的認識和概念。這包括了西洋食物、飲食禮儀、食物製作方法、營養價值等議題，具體呈現在五個方面：西洋用餐內容與方式、天主教的禮俗與齋戒文化、西洋葡萄酒與朱古力的飲用、西洋花露水的功用與文化、廣州體制下的飲食文化交流。見微知著，這五方面都反映了明清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洋文化的態度之一斑。由此亦可以看到，在近代西方話語權對中國構成巨大影響前，中國人以「文化自我」的角度，是如何看待、建構西方的「文化他者」。本文亦將會從飲食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探討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這方面的討論與明末天主教來華時的耶儒對話、葡萄牙人在華南地區的貿易活動、西洋學問的知識傳承等議題，也是環環相扣的。

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在近數十年興起，強調文化聯繫對於各地歷史進程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否則難以理解跨國家、跨地域的歷史事件。這種史學上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令個體、主觀性的個人客體，於跨地域交流史上的地位得到重視。正如新文化史學者 Peter Burke 所言：「我們正通往『凡事皆文化史』的大道之上：夢、食物、情感、旅遊、記憶、儀態、幽默、考試等等範疇。」⁵「凡事皆文化史」的態度，有助我們從更微觀的個人層面，深入探討文化史，換句話說，就是以人的心理思考模式，來看待歷史進程背後的社會脈落。整個範式轉移強調社會結構、組織及權力的宏大敘事，以及對偉大目的論的反抗，並以文化因素、微觀因素來重新敘述歷史。⁶

新文化史底下食物史研究，能夠與其他範疇的研究相互結

合，Jeffery Pilcher 將學界的食物研究分為五大範疇：一、食物史（Food Histories），即食物的政治史、文化史、勞工史等；二、食物研究（Food Studies），即對於「食物」本身的研究，如性別與食物、營養學、地理學等；三、食物的生產方式（The Means of Production），討論農業生產與環境歷史，並以食譜作為研究史料；四、全球史轉向下的食物流動，如香料貿易、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等；五、食物的消費社群，談討食物與宗教、族群、國族、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張光直(1931-2001)亦曾經指出，在研究中國飲食史時，不應忽視食物本身與客觀環境、區域習俗、信仰思想、烹煮技巧之間的關聯。⁷ 本文以食物史角度切入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原因正是因為所選取的片斷，正好反映了明清時代飲食文化交流背後的中西醫學知識交流，而中西宗教文化之間的張力與對話、花露水及葡萄酒的營養則可引申至天主教宣教策略等。凡此種種，正好反映食物史本身作為研究方法而言，能夠引領學界從新視角探討歷史現象，且能同時呈現當時大眾、平民的生活實況。

若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筆者希望以食物作為研究時人思想的媒介的話，必先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為飲食是人類生存於世上最重要的活動。正如最先關注飲食文化研究的法國政治家 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1755-1826）指出：「牲畜吃飼料，人類吃飯，只有有智慧的人類才懂得進餐的藝術……餐桌上的樂趣是屬於所有時代、所代年齡、所有國家，乃至人的每一天。它與我們所有其他樂趣攜手並進，而比起那些樂趣維持得更久，並繼續為我們日常的損失而安慰我們。」⁸ 這段引文點出了食物文化是人類所獨有的藝術，它是人類生活重要的部分、快樂的泉源，學者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季羨林(1911-2009)亦認為食物史能夠反映特定空間、時間上的歷史語境，以及跨文化現象。⁹

更重要的是，飲食背後亦反映特定民族的「飲食哲學」。Rachel Laudan、Caroline Bynum、胡司德（Roel Sterckx）、

蒲慕州等學者指出，世界上各個有悠久傳統的帝國，其飲食習慣均受到古代哲學家、宗教領袖所影響，而建構出其自身飲食背後的世界觀和哲學。事實上，食物對於傳達哲學、宗教信仰的思想具深厚意義，由此亦衍生出各種公共儀式，來鞏固政權關於道德倫理的話語，以及社會組織上的各種關係。由此可見，飲食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能夠與其他領域的學術研究結合，並有待學界繼續開發。¹⁰

本文嘗試指出一個重點，即在鴉片戰爭前，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已非一片空白。事實上，中國人早在五口通商時期出現「洋味競嘗」的品味潮流之前，原來已是「洋味初嘗」，透過不同角度、層面累積起關於西洋飲食文化的知識，從而建構出「我者」及「他者」的世界觀。本文將有助於學界從食物史的各個片斷，來重新審視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

7. Jeffery M. Pilch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oo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assim; 郭宗豪，〈品饌新味道：英文學界關於「中國食物」的研究與討論〉，載蔣竹山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467-468; Kwang-chih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assim.

8. 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 *The Philosopher in the Kitchen* (London: Penguin, 1981), pp. 13-14.

9. 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p. 66-191; Tom Standage, *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 (Waterville, Maine: Thorndike Press, 2009), pp. 9-18; 季羨林《糖史》，載氏編著，〈季羨林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第九卷，第一冊，頁 1-2。

10. Rachel Laudan, *Cuisine and Empire: Cooking in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Caroline Bynum,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1-12; Harriet Zurndorfer, "Chinese History in Europ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 Michael Szonyi ed., *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17), pp. 53-63; Roel Sterckx, *Of Tripod and Palate: Foo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assim; Roel Sterckx, *Food, Sacrifice, and Sagehood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assim; Poo Mu-chou, *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 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 76-77, 140-141; 郭宗豪，〈品饌新味道：英文學界關於「中國食物」的研究與討論〉，頁 481-482。

二．明清文獻所見的西洋飲食文化

據筆者曾寓目的文獻所見，有關明清時代中國典籍對於西洋飲食文化記載，大概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描述歐洲人飲食習慣時，多與基督宗教的習慣有關，並且佔了許多篇幅；二、主要記述葡萄牙人、荷蘭人以及英國人的生活習慣，尤其是葡萄牙人，皆因這三個國家在華貿易活動較為頻繁，因此明清知識分子有較多機會與他們接觸；三、大多出於曾在南方（尤其是廣東）任職或居住的知識分子，因為當時洋商主要在活動廣東；四，不同年代的文獻皆有抄錄的情況出現，且得出的觀察亦相若，可見對於西方飲食文化的知識是透過抄錄、翻寫而傳承下去。以下將分析這些文獻如何反映以上特點。

（一）西洋用餐內容與方式

有部份中國知識分子透過實地考察，親見租借澳門而住的葡萄牙人的風俗。安徽人貢試考生葉權（1522-1578）的《賢博編》被視為研究明中葉江南地區社會經濟、民族關係、對外貿易等各方面的重要史料。¹¹ 葉權因屢試不第而決定棄舉子業，轉而遊歷大江南北以增廣見聞，《賢博編》便是他的遊記。該書的〈遊嶺南記〉記載了葉權所見廣東及當時葡治澳門的境況：

廣東軍餉資番舶。開海市，華、夷交易，夷利貨物，無他志，固不為害。乃今數千夷團聚一澳，雄然巨鎮，役使華人妻奴子女。……火食，飲西洋酒，味醇濃，注玻璃盃中，色若琥珀，無匙箸，用西洋布方尺許，置小刀其上，人一事手割食之。¹²

作為時任刑部主事的王臨亨（1556-1603）亦曾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奉皇命至廣東辦案。¹³ 王氏於同年順道遊歷澳門，並在《粵劍編》留下了對葡萄牙人的葡萄酒、餅乾的記載：

其人聞稅使宴客寺中，呼其酋十餘人，盛兩盤餅餌、一瓶酒以獻。其餅餌以方尺帨覆之，以為敬。稅使悉以餽余。餅餌有十餘種，各一其味，而皆甘香芳潔，形亦精巧。¹⁴

以上兩段文字都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遊歷嶺南、葡治澳門的經歷，值得留意是，這些中國知識分子都出身於官宦世家，都具備較好的經濟能力，可以四處出遊。他們能夠在遊歷當中，見識這些在他們而言是「他者」的西洋飲食文化。在他們的筆下，栩栩如生地描繪了洋商在華通商時與華人交際的情境。

由杜臻（1633-1703）所撰並成書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粵閩巡視紀略》則有西洋用餐禮儀和侍餐文化的記載。他以頗具貶義的字眼，描述西洋人由童僕服侍進餐：

侍童有白黑二種，白者曰白鬼，質如凝脂，最雅靚，惟羊目不眴，與中國人異；黑者曰黑鬼，絕醜怪，即所謂昆侖波斯之屬也。白鬼為貴種，大率皆子弟。黑鬼種賤，世僕隸耳。其貯茶用玻璃甌，承以瓷盤，進果餌數品，皆西產也，甘芬絕異。有頃，設食饌，器止四，而異香酷烈，燔庖殊製，雞鳧之臠，皆全體無骨，又不見解剝之跡，不知何以能然也。……獨取其洋酒一筍，其酒釀以葡萄，色如琥珀，亦玻璃罌，內外澄澈，十二罌共一筍也。……其俗尚鬼，如中國之佛而無像，用金銀為巨槽，合鮭炙梁米為一沃，以薇露散以冰腦，羣聚食之，其餉客則用酒饌燒羊皮，作黃金色，酒醇而甘。¹⁵

從以上這段文字，可見清人描繪洋人食物、飲品的詞彙比起明代（1368-1644）豐富得多，亦對西洋人在宴會中的禮儀記載甚詳，這或與洋商（尤其是英商）來華於廣州通商的頻繁程度有關。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輝事件」發生之前，洋商能在廣東、浙江、江蘇、福建等地港口進行貿易，而在英人洪任輝 (James Flint) 北上叩門令清政府震怒以後，貿易範圍大幅收窄，只餘廣州一口通商，因此令廣州和葡治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變得非常重要。¹⁶

明末清初學者屈大均（1630-1696）在其《廣東新語》中，亦有道及他在澳門時，對夷人飲食風俗的觀察：

15.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臺灣商務印書館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史部傳記類，第四百六十冊，卷二，頁992-994。

16. 廖敏淑曾經指出清政府並非真正實行「一口通商」，只是認為廣州的粵海關制度更為健全，因而更適合洋商對華貿易，她曾經引用《廈門志》來證明閩海關亦會按照粵海關稅例，徵收洋人商船的稅項。不過根據筆者觀察，廖氏似乎亦難以否定廣州在洪任輝事件後對西方的貿易額大升，以及洋商亦大多喜於廣州貿易的事實，儘管清廷或許未有嚴格實行名符其實的「一口通商」，但以貿易體制運作而言，17世紀時廣州在中西貿易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何況，如果清廷無意限制洋商的話，亦不必在洪任輝事件後制定《防範外夷專條》限制在華洋人的人身自由。廖氏似應提出更多證據，來證明清廷並非「一口通商」。關於廖氏觀點，可詳參廖敏淑，《清代對外關係新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97-101。

每晨食必擊銅鐘，以玻璃器盛物，薦以白氈布，人各數器，灑薔薇露、梅花片腦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下不用，曰此為觸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擊生雞子數枚啜之，乃以金匕割炙，以白氈巾拭手，一拭輒棄置，更易新者。食已皆臥，及暮乃起，張燈作人事。¹⁷

學者從《廣東新語》的記載推斷，屈大均訪問澳門期間，曾多次與葡萄牙人進餐，因此他有關西洋用餐禮儀的記述才能如此精細入微。¹⁸ 據印光任 (1691-1758)、張汝霖 (1709-1769) 所編撰《澳門紀略》抄《廣東新語》所載，當時亦有關於賀蘭國（即荷蘭）人飲食習慣與禮儀的記載：「酒以葡萄以香春，器以寶玉碗，高傾以瀉，注成貫珠為禮。瓜蔬味皆酸脆碧色。……食皆以蘇合油煎烙，曼頭牛臠，皆度色如金黃乃食。」¹⁹ 對於居澳葡人的飲食習俗又有記云：

飲食喜甘辛，多糖霜，以丁香為糝。每晨食必擊鐘，盛以玻璃，薦以白氈布，人各數器，灑薔薇露、梅花片腦其上。無几案匕箸，男女雜坐，以黑奴行食品進，以銀叉嘗食炙。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下不用，曰此為「觸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擊生雞子數枚啜之，乃割炙。以白氈巾拭手，一拭輒棄，更易新者。……食餘，傾之一器，如馬槽，黑奴男女以手搏食。²⁰

《澳門紀略》對於從西洋進口的食物貨物有詳盡記錄，又對不同的花露水、藥油、葡萄酒、西米、燕窩、西洋糖果，甚或是鴉片的色、香、味都有詳細的描述：

有西國米，色紫柔滑，益胃和脾，僞者以葛粉為之，煮之輒化。有燕窩，烏白二色，紅者尤佳。有海參，無刺。有糖醃百果。康熙五十九年（筆者按，1720 年），西洋貢糖豆一櫃，計六罐。有蕃餠餠，上貼金勝，下烙乳酥，如紙薦之。²¹

但更為有趣的是，在乾隆帝（1711-1799, 1735-1796 年在位）晚年時，中國食譜亦開始記載西洋食物的煮食方法，如在乾隆

五十七年（1792）成書的袁枚 (1716-1797)《隨園食單》記載了部分西洋食物的烹煮方法，例如關於西洋餅的做法：

用雞蛋清和飛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銅夾剪一把，頭上作餅形，如蝶大，上下兩面，銅合縫處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銅夾，撩稠水，一糊一夾一燻，頃刻成餅。白如雪。明如綿紙，微加冰糖、松仁屑子。²²

乾隆四十七年（1776）刊成的李化楠（1713-1769）《醒園錄》亦有提到西洋糕點。〈蒸西洋糕法〉云：「每上麵一斤，配白糖半斤，雞蛋黃十六個，酒娘即醪糟，江米酒半碗，擠去糟粕，只用酒汁，合水少許和勻，用筷子攪勻，吹去沫，安熱處令發。入蒸籠內，用布鋪好，傾下蒸之。」²³ 這反映了一個可能性，就是西洋做餅之法可能隨着西方對華商貿活增加，民間透過與西洋人接觸而認識和掌握這些烹飪方法，後來更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一點在之後「廣州體制」一節中，將作詳細討論。惟筆者未能看到更多中國人記載西洋食譜的史料，否則將可以更深入探討早期中國人在未「開眼識世界」之前食用西洋食物的經驗，皆因食譜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載體。

（二）天主教的禮俗與齋戒文化

明末中國知識分子在記錄西洋人的飲食風俗時，大多注意到天主教齋戒文化於西洋人生活的重要性。後來，天主教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日增，中國知識分子在書寫這些天主教文化期間，正因為天主教作為「文化他者」被引入中國，導致有兩派對於天主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的知識分子出現。一派以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為「文化我者」的士人、佛教徒，大肆攻擊天主教齋戒習慣不禁殺生是虛偽，而且是不合中國文化的行為；另一派則是接受天主教信仰的知識分子，他們有見齋戒是天主教信仰中的重要一環，因此嘗試將這個外來的「他者」文化融入中國文化的「我者」脈絡來詮釋，從而捍衛天主教教義，同時認為天主教思想與

17. 屈大均，《廣東新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卷二，地語，澳門條，頁 34。

18. 湯開建，〈屈大均與澳門〉，載於氏編著，《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頁 135-157。

19.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八，舟語，頁 428；印光任、張汝霖編，《澳門紀略》（據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版本），下冊，澳藩篇，頁 11-12。

20. 印光任、張汝霖編，《澳門紀略》，下卷，澳藩篇，頁 19-20。

21. 印光任、張汝霖編，《澳門紀略》，頁 38-40。

22. 袁枚，《隨園食單》（揚州：廣陵書社，2008），第二冊，卷四，點心單，〈楊中丞西洋餅〉，頁 10。

23. 李化楠，《醒園錄》（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乾隆年間刊本），〈蒸西洋糕法〉，頁 37。

中國儒家思想可以「互補」，前者更可起「合儒排佛」之效。²⁴

廣東右布政使蔡汝賢（1533-1594）在於萬曆十四年（1586）成書的《東夷圖說》中謂：「佛朗機獵我華人，夷而獍矣。……其俗：不尚鬼，信佛，喜誦經，每六日一禮拜佛。先三日食魚為齋，至禮拜日則鷄、豬、牛、羊不忌。……飲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麵，貧與奴僕食米。」有趣的是，後來由茅瑞徵（1577-1637）所編並成書於崇禎二年（1629），以及由陳仁錫（1581-1636）所編並相信於崇禎三年（1630）成書的《皇明世法錄》直接抄錄了這段文字，各書之間則僅有一、兩個字差異。²⁵ 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成書的《皇朝文獻通考》，又有記載天主教禮拜與齋戒的習慣，但應是抄錄自明代文獻：「其俗信奉天主每七日一禮拜，誦經不食齋。……多佩刀飲食。」²⁶ 可見，這些文獻反映出中國知識份子在關注西方飲食文化時，亦同時觀察到其與宗教文化的關係，例如基督宗教的禮拜日、齋戒方式、餐具，以及不同社會階級的飲食習慣與偏好，儘管他們使用了「佛」來稱呼後來被天主教翻譯為「天主」的基督宗教的神。²⁷

明代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以後，天主教文化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相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文化衝擊，部分改信天主教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進行接受、消化、融合、轉換、在地化，甚或是引介的過程，其實都是將「他者」融入「我者」語境下的再詮釋。²⁸ 這能夠體現在天主教齋戒在華傳播、詮釋的情況上，事實上，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天主實義》曾以「三志」指出天主教齋戒非在於殺不殺生，而是齋戒作為靈性操練可對信徒起克己之效。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口鐸日鈔》亦有相見解，認為「大小齋，及鞭策、束帶諸功，皆所以罰此肉軀而補煉其過者也。有從人我交際而生者」，進一步指出天主教齋戒的「補贖」概念。²⁹ 對此，作為早期華人天主教神父的吳歷（1632-1718）就曾為了學道而前往當時的葡治澳門，並寫下了不少詩句以表心志。他在澳門時寫成了《三巴集》，而其「天學」思想則反映在詩集《三餘集》當中。³⁰ 在《三巴集》的〈澳中雜

詠〉當中，他記錄了天主教徒在四旬期齋戒時，會用「阿里襪油」（即 Olive Oil，橄欖油，後來譯作「阿利襪油」）來煎魚：「黃沙白屋黑人居，門柳如莢秋不疏。夜半蜑船來泊此，齋廚午飯有鮮魚。（自註：黑人尚俗，深黑為美，淡者為醜。魚有魴鯽兩種，用太西阿里襪油炙之，供四旬齋素。）」³¹ 另外，在《三餘集》的〈漁夫吟〉一詩中又謂：

破網修多兩眼花，淘河不厭細魚蝦。採鮮曾進君王膳，四體雖勞敢辭倦？撒網常迷水似天，歌殘醉傍蛟龍眠。鬚髭白盡豐姿老，驚遍風潮怕秋早。朋儕改業去漁人，聞比漁魚更苦辛。晚知天學到城府，買魚喜有守齋戶。³²

詩中最後一句「晚知天學到城府，買魚喜有守齋戶」，反映吳歷看見甚至魚販亦有守天主教齋戒的喜悅。吳歷仿效意大利籍耶穌會修士艾儒略《口鐸日抄》撰寫《續口鐸日抄》，當中談到他對天主教齋戒及克食慾的行動實踐：「夜膳時，主日方過，宜食大腥。先生減餐，酒不過半小半，雞、羊肉諸厚味，概不沾箸，曰：『我病齒，不能用也。』先生之淡泊示表，而又稱疾慰人如此。」³³ 反映他對於天主教飲食習慣的堅持和自豪，也反映了部份中國知識分子在某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對於「齋戒」的觀念。《續口鐸日抄》又繼續指出橄欖油的保健作用，又將之與天主教聖洗禮、堅振禮連結起來，指出橄欖油有滋養靈魂之作用：

有問，余徐問：「伏讀《三巴》尊集，有云阿里襪油可灸魚供齋之事。今有教友言阿里襪油爛額，主教堅振抹過亟拭。主教二指聖過，故不爛。此說是否？」先生曰：「為此說者，得無焦頭爛額乎？阿里襪油，大補之物也。付洗此油，堅振此油，終傳此油，成神品亦此油，皆取大補靈魂之意，彼說何謬至此者？上洋有一講道者，人問曰：『堅振何謂？』講道者曰：『新造舡，用油便固耳。』此等妄言，算得講道否？真堪大笑。」³⁴

正如上面所言，明代中國士人面對歐洲這另一「他者」時，雖有部分人受到傳教士傳道所影響而改信天主教，但亦有本持儒、

^[24] 梅謙立、王琦，〈中國天主教與戒殺放生——以《丙寅（1686年）會課》為例〉，《佛光學報》，第九卷第二期，2023年7月，頁 1-84；梅謙立，〈明清耶穌會的「補儒絕佛」——以《丙寅（1686）會課》中的「持齋」問題為例〉，《佛光學報》，第八卷第二期（2022年7月），頁 41-88。

^[25] 蔡汝賢，《東夷圖說》，載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史部二五五，頁 428-429。關於《皇明世法錄》部份，詳參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揚州：揚州古籍書店，1987），卷八十二，〈南蠻〉條；又參茅瑞徵，《皇明象胥錄》，載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史部，第十冊，頁 551-683。

^[26] 茅瑞徵，《皇明象胥錄》，「英吉利」條，頁 212-213。

^[27] 關於「上帝」、「天主」、「神」的翻譯問題，詳見曾慶豹，〈明末天主教的譯明之爭與政治神學〉，《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三十八期（2013），頁 111-134。

^[28] 蔡向艷，〈折射的他者——吳歷《三巴集》中的西方形象〉，載於宋剛編，《傳播、書寫與想像：明清文化視野中的西方》（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頁 33-52。

^[29] 利瑪竇，《重刻時人十篇》（香港大學圖書館據林準祥中文聖學藏集 1847年重刊本影印），頁 40；利瑪竇，《天主實義》（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明刊本），頁 11-14；艾儒略著，肖清和、郭建斌校點，《口鐸日鈔》（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頁 58。

^[30] 吳歷的天學詩充分反映當時中國天主教徒、聖職人員對天主教教義有準確認識。從其詩詞，可以看到文化融合的成果。詳參章文欽，〈吳漁山天學詩研究〉，載於氏編著，《澳門歷史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336-370。

^[31] 吳歷撰，章文欽箋注，《吳漁山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二，《三巴集》，前軼澳中雜詠（三十首），其三，頁 161-163；方豪（1910-1980）亦曾校注過《三巴集》，詳參方豪，〈吳漁山先生《三巴集》校釋〉，載於氏編撰，《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 1661-1674。

^[32] 吳歷撰，《吳漁山集箋注》，卷三，《三餘集》，〈漁父吟〉，頁 331-333；Jonathan Chaves ed., Singing of the Source: Nature and God i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Painter Wu L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 178.

^[33] 吳歷撰，《吳漁山集箋注》，卷八，《續口鐸日抄》，頁 593-594。

^[34] 吳歷撰，《吳漁山集箋注》，卷八，《續口鐸日抄》，頁 622-623。

釋、道思想的人，大加反對此不反對「殺生」的西洋風俗。如佛教僧人釋圓悟（1566-1642）在〈辨天說〉中批評信天主教的人將難免會下地獄。他的立論本於佛教所反對的三個行為，指責天主教徒鼓吹「天生以養人者」是「害生命」的行為，並且是滋長人的食慾、罪惡的因由，並以佛教因果論指稱天主教在種「下地獄」的因時，竟然希望自己可以「上天堂」：

夫身有不善業者三：曰「殺」、曰「盜」、曰「淫」。……而殺、盜、淫為首，殺尤首矣。……范君既謂天教亦以天堂地獄教化眾生，而反恣情縱欲，謂一切眾生固當食啖。蓋天生以養人者，天何頗耶？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唱如是說者，不過以口腹者乃生人之大欲存焉，投其所欲以要人耳。行地獄之因，希天堂之果，豈非天堂未就，地獄先成者乎？³⁵

而許大受作為明末反天主教重要人物株宏大師（1535-1615）的弟子，雖然曾對天主教信仰產生興趣，後來卻轉而排斥天主教，並著《聖朝佐闢》一書來強調儒、釋、道三教決容不下天主教為「第四教」，並在各方面批評天主教。他指出：

或又曰：「佛教禁殺，只慮報復耶，抑另有精義耶？夷言克己正念，二齋日，單食水族，是耶、非耶？」今夷不知鮮食，是治世聖人之權，乃以殺為宜，而以齋為號。又別水族異於牲牷，宜充素食者。與回回之單不食肫，自殺自食之可笑，有何異哉？³⁶

許氏這段文字為嘲諷西方天主教齋戒的內容，既並不如佛教般因為主張不殺生而戒絕一切肉類，聲稱要「齋戒」卻以容許吃魚肉來自欺欺人，況且，殺生食肉的習慣已經非常普遍，不明白食肉的問題何在。由於齋戒為天主教信仰生活上的重要禮儀、習慣，許多改信天主教的中國士人採取耶穌會「合儒排佛」的策略，結合了儒家思想來反駁這些對於天主教的批評。例如作為明末「聖教三柱石」的楊廷筠（1562-1627）在《代疑篇》中反駁，指天主教齋戒並非在於強調齋戒之「不殺生」，而是在於透過這個靈

35. 釋圓悟：〈辨天說〉，載於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卷七，頁 346-347。

36. 許大受，〈聖朝佐闢（凡十）〉，載於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頁 218。

性操練來令自己的道德品性變得更好：

答「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條。問：「釋氏慈悲，故不食生物。西教不斷血食，即齋日亦用腥味，甚而鱸、鰲亦取作膳，豈不可駭？」曰：「西士居恆多食蔬菜，則齋日不禁水族，聽人用之，人力不等故也。有問鱸、鰲可食否，西士不知鱸、鰲何物，答云：『若是水族，與諸魚無異，豈獨不可食？原來不過如此。而戲侮者，遂執為食鱸、鰲之齋。不知此二物是善是惡，亦未有定。世間不食，獨嚴此二物，是不可曉也。』」……六畜原為人用，若人不食用，誰畜誰管，且斷絕其種類。……聖王之五雞二彘，為不仁之大者也，此可無論矣。……善事甚多，豈無加於吃齋戒殺者？奚獨於茹素之人偏加福佑乎？彼以食素認作上善，世間食葷俱是大惡。聖王之法，卿大夫肉食，祀先者血食，奉親者有酒肉，豈皆以惡事加於尊親耶？至佞佛生慈，言似有理，吾獨謂慈本仁德。³⁷

楊廷筠認為佛教徒自認為其齋戒禁殺便會令佛祖加福於他們之上，與天主教及儒家所強調的仁義有所不同。他認為如果眾生平等的話，佛教神明更不會因為人食肉而令他們功德受損，人亦不會因為不食肉而得不到上帝保佑，因為食肉與否根本不影響人的得救及靈性生活。楊氏更反指既然中國古代聖人都食肉，如果佛教強調食肉是罪孽的話，那麼中國人以酒肉祭祖、侍奉親人，同樣也是罪人，從而指出佛教齋戒的邏輯謬誤。後來，許多天主教傳教士及平信徒都以相同論調反駁佛教的攻擊，這些都可見於天主教平信徒羅廣平於康熙六年（1667）所錄的《醒迷篇》、西班牙藉奧斯定會（Augustinians）教士陸銘恩（漢名又作白萬樂，Alvaro Benavente, 1646-1737）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所著之《釋客問》等護教著作上。他們均指出天主教看重的是靈魂能夠透過齋戒而得到清靜，並批評佛教所理解的「齋戒」是虛偽、難以實行。³⁸

據筆者所見，清初時佛教對天主教齋戒習慣的攻擊已明顯較

37. 楊廷筠，《代疑篇》（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末京都領報堂藏版刻本），卷上，頁 10-12。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亦藏於此書的明天啟元年的序刻本，文字有少許差異，但無礙理解楊廷筠對天主教齋戒的詮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版本如下：「答『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條。問：『釋氏慈悲，故不食生物。西教不斷血食，即齋日亦用魚腥，豈不駭？』曰：『西士居恆多食蔬菜，則齋日不禁水族，聽人用之，以水族屬陰，與菜蔬之性相等，俱不助人氣血，非不禽獸殊味，能恣嗜慾也。』」詳見楊廷筠，《代疑篇》（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明天啟元年序刻本），卷上，頁 5-6。

38. 羅廣平，《醒迷篇》（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康熙六年景教堂刻本，館藏編號：Chinois 7149），頁 35-41；陸銘恩，《釋客問》，載於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第二十三冊，頁 603-604。

明末時少了許多，後來攻擊天主教的大多是基於《崇禎曆書》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從明末天主教齋戒問題上，看到當時無論是親天主教抑或反天主教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理解齋戒的參考架構都各自受到自身的世界觀、道德價值觀所影響。如親天主教人士嘗試以傳統概念，為天主教此重要生活化的飲食禮儀來辯護，而反天主教人士面對着這個「異國文化」，他們顯然在「我者」的文化脈絡下對天主教有「被想像的定型」（Imagined Stereotype）印象。³⁹ 正如上一章所言，飲食禮儀背後所反映的哲學是食物史研究的一個面向，並能夠從此觀察到不同文明系統對同一行為的不同理解，並且在不同歷史時期上嘗試融合的努力，天主教齋戒在明末時期的爭論明顯是當中一例。

（三）西洋葡萄酒與朱古力的飲用

無論對於葡萄酒本身作為宴會飲料，抑或是其醫藥，中國人自明代起已開始察覺葡萄酒在西洋飲食文化中的獨特地位。當時他們已知道葡萄酒是在華洋人自用的飲料，亦是與華人通商、宴請華人的必備之物。嚴從簡（1529-？）在其於萬曆十一年（1583）成書的《殊域周咨錄》中曾謂：「拂菻（筆者按：指拜卜庭帝國）古名密昔兒（筆者按：Misr，即今埃及），……《唐書》謂去京師四萬里。……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以葡萄釀酒。」⁴⁰

而在《澳門紀略》中，又有記載云：「酒以白葡萄為上，紅葡萄次之，所謂色如琥珀、氣類貂鼠者。又有葡萄紅露酒、葡萄黃露酒，皆以瓶計，外貯以箱。」《皇朝文獻通考》又載有西洋所釀製葡萄酒的方式：「釀酒以葡萄，不雜他物，可積至數十年。有樹頭果，曰阿利襪熟，可為油生，最繁味美而用多，其核可為炭滓，可為齏葉。可食牛羊，凡國人畜大小麥，為上戶葡萄酒，次之阿利襪，又次之畜牛羊者，為下會客，不盡飲偶犯醉者，終身以為垢食用。」⁴¹ 此段文字相信是抄錄自艾儒略的《職方外紀》。⁴² 除了一些記錄沿海夷事的典籍以外，在一些知識分子的筆記、札

記當中，亦記載了他們與天主教士以酒會友的經過。例如明遺民彭孫貽（1615-1673）在《客舍偶聞》當中，便憶述當年與曾參與編寫《崇禎曆書》的德籍耶穌會修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對酒當歌的情景：

（湯若望）取西洋蒲桃酒相酌，啟一匣錦囊，又一匣出玻璃瓶，高可半尺，大於碗，取小玉杯二，瑩白無瑕，工巧無匹，謂吏部范公曰：『聞公大量，可半杯。』若望酌少許相對，吏部以為少。若望笑曰：『此不可遽飲，以舌徐濡之。』潞公如言，才一沾舌，毛骨森然若驚，非香非味，沁入五臟，融暢不可言喻，數舐酒盡，茫茫若睡鄉，生平所未經。若望亦如寐，良久各醒。僕從分飲半盃，仆不能起，若望命取粥各舉一椀，身柔緩湏，扶乃登車，僕從皆跟。⁴³

從上面的記載可見，中國知識分子飲用葡萄酒並與洋人交流，又可見到葡萄酒成為交際中必不可少的媒介。洋人好酒的形象也反映在成書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皇清職貢圖》，對洋人此習慣有所記錄：「英吉利，亦荷蘭屬國夷人。服飾相似，國頗富，男子多著哆囉絨，喜飲酒；婦人未嫁時束腰，欲其纖細。披髮垂肩，短衣重裙出行，則加大衣，以金縷合貯鼻烟自隨。」⁴⁴ 《皇清職貢圖》所描繪英國人的圖像，亦有英國男子手執一中國式酒壺的形象出現，反映出中國人眼中的西洋人是好酒的。而清代文人談起「蒲桃酒」時，亦通常會附帶提及「西洋」兩字或是傳教士。如查慎行（1650-1727）《敬業堂詩集》所修之〈謝院長惠西洋蒲桃酒〉一詩曰：「妙釀真傳海外方，龍珠滴滴出天漿。醍醐灌頂知同味，琥珀浮甍得異香。直可三杯通大道，誰教五斗博西凉？平生悔讀無功記，誤被村醪引醉鄉。」⁴⁵ 都是中國人飲西洋葡萄酒酩酊大醉而安眠入睡的場景，由此可見葡萄酒在中西文化交流場合上的重要性了。

不過，關於西洋葡萄酒的飲用並不局限於沿海民間的商貿活動，或中國士人單向地觀察西洋飲品，清代典籍亦有記載宮廷上的康熙帝原本並不好飲酒，後來葡萄酒醫好其病而開始崇尚飲用

39. Jean-Marc Moura, "L'imagologie littéraire, essai de mise au point historique et critique", in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 66, Issue 6 (July 1992), pp. 271-287.

40.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十一，頁 384-385。

41. 張廷玉（1672-1755）、嵇璜（1711-1794）、劉塘（1719-1805）等編撰，紀昀（1724-1805）校訂，《皇朝文獻通考》（上海：鴻寶書局，1902），據日本慶應義塾圖書館藏書影印 卷二百九十八〈四裔考〉，六，〈意達里亞〉，頁 205-206。

42. 艾儒略，《職方外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歐羅巴總說，頁 40-41。

43. 彭孫貽，《客舍偶聞》，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子部，雜家類，第 1175 冊，頁 423。

44. 傅恆（1772-1770），《皇清職貢圖》，載於王雲五（1888-1979）編纂，《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冊一，卷一，英吉利國夷人條，頁 47。

45.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卷三十八，頁 414。

葡萄酒。康熙四十八年（1709）時，當時的法國籍修士殷弘緒神父（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⁴⁶）在致函予羅馬教廷請求在印度及中國設立巡閱使司時，曾提及康熙皇帝透過葡萄酒治病的過程：

皇帝病情日沉，健康日衰，中國大夫束手無策，於是只得向歐洲人求助。他們聽說羅德先教友（筆者按：Bernard Rhodes, 1645-1715）精通藥理，便認為他或許能緩解皇帝病情。……上帝成竹在胸，為了基督教的利益，它可能於我們處境困難之際安排了這個使皇帝更喜歡我們的機會，因此降福於羅德先教友為他治病的藥物。他配制了胭脂紅酒讓皇帝服用，首先止住了最令他心神不安的嚴重的心悸症；隨之又建議他服用產自加那利（筆者按：Canarie）群島的葡萄酒。為供彌撒之需，每年都有人從馬尼拉給傳教士寄這種酒，後者便留心提供給皇帝。不多久，皇帝恢復了體力，如今十分健康。⁴⁷

在精通醫術、藥劑、神學的法國籍耶穌會修士羅德先以葡萄酒的治療下，康熙帝的心悸病症大為改善。再加上康熙帝對西洋天文學、數學有濃厚興趣，在此背景下，天主教與中國朝廷因而在康熙年間保持良好關係，這種關係令在華效力的耶穌會修士得到朝廷重用。史籍有載：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西洋人自南懷仁（筆者按：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安文思（筆者按：Gabriel de Magalhães,1609-1677）、徐日昇（筆者按：Tomás Pereira,1645-1708）、利類思（筆者按：Lodovico Buglio,1606-1682）等在廷效力，俱勉力公事，未嘗有錯，中國人多有不信，朕向深知真誠可信，即歷年以來，朕細訪伊等之行實，凡非禮之事，斷不去做，豈有過犯可指？前者朕體違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補之物，高年飲此，如嬰兒服人乳之力，淳淳泣陳，求朕進此，必然有益。朕鑒其誠，即准所奏，每日進葡萄酒幾次，甚覺有益，飲膳亦加，今每日竟進數次，朕體已經大安。今伊等愛君之心，

不可不曉諭朕意，今傳眾西洋人，都在養心殿，叫他們知道。欽此。⁴⁸

在這次之後，康熙都有一直飲用葡萄酒醫治心悸的習慣，更令沿海各省官員應進呈西洋人進口的葡萄酒，這見於當時江西官員上呈的奏摺當中：「奴才接信，即傳知本處西洋人等，於（筆者按：同為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二十六日，據饒州府居住西洋人殷弘緒送到進上西洋葡萄酒六十六瓶、哈爾各斯默一瓶，其瓶口皆有西洋字封識。」⁴⁹ 另外，有學者透過研究兩份滿文奏摺，指出康熙朝時在華耶穌會傳教士希望透過朱古力的醫藥功效來討皇帝歡心，從而擴大天主教在華傳教的權利，而皇帝亦樂於接受並吸納這些西學知識為己用，以彰顯自己作為天朝上國的皇帝之普世性。⁵⁰ 在這個過程之中，曾有大臣向皇帝解釋朱古力的製作方法、產地等資訊：

至綽科拉（筆者按：即 Chocolate，朱古力）藥方，問寶忠義，言屬熱味甜苦，產自阿美利加、呂宋等地，共以八種配製而成，其中肉桂、秦艽、白糖等三位在中國，其餘噶高（筆者按：即 Cocoa，可可）、瓦尼利雅（筆者按：即 Vanilla，香草）、阿尼斯（筆者按：即 Anise，茴香）、阿覺特、墨噶舉車等五種不在此。止知此八種而已，但此八種配製劑量，我一概不知，祇知將此倒入煮白糖水主銅或銀罐內，以黃楊木碾子攪和而飲。此種配方徐日昇等亦知之。等語。西洋人煮綽科拉，皆用臼碗，故特製銀罐、黃楊木碾子，裝入木匣。綽科拉五十塊，裝於柳條盒。⁵¹

這段文字對於朱古力的製作及保存方法記載甚詳，而且後來鮑仲義神父（Joseph Baudino,1657-1718）更向康熙帝呈上製作朱古力的藥方和所需的精美器具。然而，早在明末，德國籍耶穌會傳教士鄧玉函便曾坦言朱古力的營養價值實際上遠大於其藥用價值；並且作為一種保健品，用來治療中醫所說的「脾氣虛」似乎效果更佳。康熙帝因為不知「綽科拉」實際上的藥用價值，加上這個「西洋茶」似乎對於皇帝培養親信沒有太大作用，故此未

48. 黃伯祿 (1830-1909)：《正教奉褒》，載於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367。

49. 〈江西巡撫郎廷極奏進西洋人殷弘緒所進物品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一日），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第二冊，頁 334。

50.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Chocolate in China: Interweaving Cultural Histories of an Imperfectly Connected World", in Harold J. Cook ed., *Translation at Work: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rst Global Age* (Leiden: Brill, 2020), pp. 58-64; 中譯本見於白雅思撰 樊晉譯《巧克力在中國：在不完美連接的世界中交織的文化史》，《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二十一期（2020 年 12 月），頁 12-62。

51. 〈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奏報向洋人索取西洋藥摺〉（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418。

46. 在記載西洋人進獻葡萄酒予康熙一事上，殷弘緒似乎參與甚多。關於殷弘緒的生平，詳參 Pierre Huard & Ming Wong, "Les enquêtes françaises sur la science et la technologie chinoises au XVIIIe siècle [French surveys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18th century]", 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53, No. 1 (1966), pp. 136-226.

47. 〈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神父致印度和中國傳教區總巡閱使的信〉，載於杜赫德著，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第二冊，頁 36-37。

52.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Chocolate in China: Interweaving Cultural Histories of an Imperfectly Connected World", pp. 99-103.

53. 關於清代宮廷內西洋藥物的使用，詳參關雪玲，〈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傳播問題的再考察〉，《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一期（2002），頁 135-160。

54. 孫承晟，〈蒸花取露：西方藥露知識及蒸餾技術在中國的傳播〉，《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2022），289-305 頁；楊之水，〈古詩文名物新證〉（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 97-117。

再繼續重視朱古力。⁵²

但正如殷弘緒神父及學者所觀察一樣，當時天主教耶穌會刻意透過利用具有醫學藥用價值的飲品，如葡萄酒、朱古力等，以用作博取皇帝信任的政治策略上說，是相對成功的，繼而令天主教在禮儀之爭爆發之前，得以在相對順利的情況下在中國傳教。⁵³ 結合天主教齋戒上的耶儒對話的一節而言，反映了一個歷史事實，即天主教在入華初期之所以能夠順利傳教，並非由於天主教未能適應中國文化，又或是與皇權及士大夫階層的系統產生衝突，而是與後來羅馬教廷及部分修會在禮儀之爭時所採取的政治手段失當有關。另外，雖然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未如後來基督教般主要以利用醫療、食物救濟來作為傳教策略，但康熙飲用西洋葡萄酒治病及關注朱古力的藥用效果的案例上，反映了食物本身並非限於民間交流，而是進入了管治階級。筆者認為，兩者早已上升為耶穌會在華發展的策略，兩者的藥用價值、營養成為耶穌會考慮其在華傳教事業上的重要手段。當中的討論過程成為了「我者」與「他者」交流和對話的橋樑。

（四）西洋花露水的功用與文化

自先秦時期開始，中國已經有用香的習慣。雖然中國本土出產的香料種類繁多，但同時間通過海外貿易而來到中國的香料也相當多，例如檀香、沉香、乳香等。而中國人所調配的「花露」，便是透過以天然植物所製成露水，除了有播香的作用外，也能夠滋補身體、怡養精神、祭祀神靈，甚至取悅情人的作用。據學者考據，在後周（951-960）時期，花露水便已從阿拉伯世界透過中亞地區傳入中國，並在宋（960-1279）、元（1271-1368）兩代大為流行。⁵⁴ 後來，在耶穌會士來華傳教之後，許多傳教士在介紹西方醫藥文化時，亦有介紹西方的薔薇露、玫瑰露，如艾儒略《西方答問》有載：「有製藥一家，專煉藥草之露，如薔薇露之類，特取其精華，而棄其渣滓，則用藥寡，而得效速，不害脾胃，

而漸漬消除。……中國嘗有用此法者，如生紫蘇煉為露，置酒中少許，飲下則寒氣頓除，而身生快，比用本草更便且驗矣。」⁵⁵

後來，意大利裔耶穌會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is, 1575-1620）在其〈藥露說〉（後收於其《泰西水法》）中，對於西洋花露水的製作及醫學功用有如此記載：

凡諸藥，係草木、果蓏、穀菜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鮮物料，依法蒸餾。得水名之為露。今所用薔薇露，則以薔薇花作之，其他藥所作所為，皆此類也。凡此諸露，以之為藥，勝諸藥物，何者？諸藥既乾既久，或失本性，如用陳米作酒，酒多無力，小西洋用葡萄乾作酒，味亦薄焉。若以諸藥煎為湯飲，味故不全，間有因煎失其本性者。……西國市肆中，所鬻藥物，大半是諸露水，每味用器盛置，醫官止主立方，持方詣肆，和藥付之。……他凡為香，以其花草作之，如薔薇、木樨、茉莉、梅、蓮之屬。凡為味，以其花草作之，如薄荷茶、茴香、紫蘇之屬。諸香與味，用其水皆勝其物。⁵⁶

正如學者所言，熊三拔介紹西洋以蒸餾花草所取得的水露，明確冠以「藥露」之名，是為了強調這些花草露水的醫學藥用價值，與晚明天主教傳教士希望以科學來傳播西學的手段有關。這也成功取得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洋科技的關注，例如曾於崇禎朝官至湖廣巡撫的方以智（1611-1671）亦在其著《物理小識》中引錄熊三拔的文字，介紹西洋藥露文化。而在清代，隨着中外商貿、外交、宗教活動增加，西洋花露文化亦因而更廣泛流傳，例如荷蘭使團來華時曾經向中國進貢花露，而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及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等在宮廷服務的傳教士也曾製作過藥露，並得到康熙帝允許在宮中設立藥房。⁵⁷

而在清代典籍出現得最多是西洋飲品亦正是花露水，據方豪（1910-1980）神父的考證，在乾隆年間由曹雪芹（1715-1763）

55. 艾儒略，〈西方答問〉（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崇禎十年刻本），頁 19。

56. 熊三拔編著，徐光啟（1562-1633）筆記，〈泰西水法〉（嘉慶五年 [1800] 掃葉山房藏版所印），卷四，頁 5-6。

57. 孫承晟，〈蒸花取露：西方藥露知識及蒸餾技術在中國的傳播〉，頁 295-300。

所著《紅樓夢》中出現的西洋食物，例如貼着鵝黃箋（一種用紙）的木樨香露、玫瑰香露、桂花露、葡萄酒、西洋糖果，估計其在上述的歷史環境下進口中國的規模，應該不在少數。在清代語境下的「露」是指以蒸餾法製成並可直接飲用來養生，或加入飲品作增添香味之用的花露水。⁵⁸ 正如屈大均在《廣東新語》所言：

露本秋金凝液之氣，味甘性涼，故凡百艸之露皆可潤肌，百花之露皆可益顏。取之造酒，名秋露白，絕香。……有細心者，疎者，以甑蒸之取露。或取其瓣拌糖霜，暴之兼旬，以為粉果心餡，名荼蘼角，甚甘馨可嗜，然猶以大西洋所出者為美。大西洋天氣寒時，荼蘼始花，露凝花上，晶瑩芬鬱若甘露，諸花木則否。⁵⁹

屈大均對西洋花露酒讚譽有加，指出西洋花露可以用於製作廣東點心之用，令其味道更為可口，並指西洋所產花露的質素更高。屈大均這段文字後來為李調元（1734-1803）抄錄於其《南越筆記》之內，此外李氏又云：「澳門番女得之，以注飲饅，或以沾灑人衣。外有薔薇水，暹羅、瓜哇、滿刺加三國，曩以進貢。其薔薇乃三佛齊所種，與中國薔薇不同。廣人多以土薔薇浸水效之，試以琉璃瓶翻搖數四，泡周上下則真也。」⁶⁰ 指出花露除可作飲用以外，亦有西洋婦女作香水之用。而澳門自明中葉以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點，《澳門紀略》介紹清代花露文化的文字與《南越筆記》有相似之處，但再加上了不同花露的種類：「食貨則有厚福水、藥水、花露水，即薔薇水，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四，泡周上下者為真；荼蘼露，以注飲饌，蕃女或以沾灑人衣；藥露。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計，冰片油以瓢計。有蕃鹽，有辣茶，茶以枚計。」⁶¹

而中國人喜好西洋花露酒的程度，又可以從浙江士人曹庭棟（1699-1785）引用熊三拔《泰西水法》文字並在其著作《老老恆言》中見到：

蒸露法同燒酒，諸物皆可蒸，堪為飲食之助。蓋物之精液，全在氣味，其質盡糟粕耳。猶之飲食入胃，精氣上輸於

肺，宣布諸藏，糟粕歸於大腸，與蒸露等。故蒸露之性，雖隨物而異，能升騰清陽之氣，其取益一也。如稻米露發舒胃陽，可代湯飲，病後尤宜。他如藿香、薄荷之類，俱宜蒸取露用。《泰西水法》曰：「西國藥肆中，大半是藥露，持力詣肆，和露付之。」則方藥亦可蒸露也。須預辦蒸器，鹽物蒸用。⁶²

由此可知中國人對於西洋露水的藥用價值大為讚嘆。後來，在阮元（1764-1849）編纂並成書於道光二年（1822）的《廣東通志》中，又可以見到阮元介紹各地製酒及製水露文化時，指出廣東人早已學會這些西洋技藝，反映西洋飲食文化當時因受歡迎的緣故而在中國南方廣為流傳，其載：

南蠻有檳榔酒，扶南有安石榴酒、土瓜根酒，赤土有甘蔗酒，以暹羅酒為第一。外洋有葡萄酒，味甘而淡。紅毛酒色紅，味辛烈。廣人傳其法，亦釀之，與洋酒無異。洋酒有數十種，惟此二種內地能造之，其餘不能釀也。又有黑酒，番鬼飯後飲之，云此酒可消食也。番人藥物多蒸為露，或榨為油，如薔薇露、桂花露、荷花露、丁香油、肉桂油、薄荷油、檀香油，今廣人皆能為之。⁶³

正如學者所言，因為花露水具有多種效用，包括醫藥、飲食、提供香味等等作用，故此令其在中國的流傳程度相當高。例如晚清杭州胡慶餘堂的藥物集當中，便收錄了21種藥露，如鮮生地露、地骨皮露、玫瑰花露、鮮佛手露、鮮藿香露等等，反映露已經演變成為中藥一部份。⁶⁴ 以上這些文獻及研究都反映，西洋花露文化在中國的流行與發展，更令其廣為中國人所接受，並以西洋方法來蒸餾中國傳統草藥，進一步拓闊中藥的發展空間，反映花露在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上實應佔一重要席位。

（五）廣州體制下的飲食文化交流

58. 方豪《從紅樓夢所記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載於氏編著，《紅樓夢西洋名物考》（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頁38-39；孟暉，《花露的中國情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雖然孟暉此書並非嚴肅學術著作，但是其用以敘述中國花露文化時所引用之中國典籍，皆為可考，故有一定說服力。

59. 屈大均，《廣東新語》，頁346-347。

60. 李調元，《南越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十六，〈荼蘼露〉條，頁206-207。

61.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下卷，〈澳藩篇〉，頁19-20。

62. 曹庭棟，《養生隨筆》（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文瑞石印本影印本），卷一，頁9。

63. 阮元編修，《廣東通志》（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9），第二冊，卷九十五，〈輿地略十三〉，頁1826；此段文字又見於楊景素，《舟車聞見錄》，載於李龍潛點校，《明清廣東稀見筆記七種》（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2010）。

64. 孫承巖，〈蒸花取露：西方藥露知識及蒸餾技術在中國的傳播〉，頁301-302；胡光墉（1823-1885）編，《胡慶餘堂丸散膏丹全集》（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清光緒三年[1877]刻本）。

現時，學界關於鴉片戰爭前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於清代的「廣州體制」（Canton System）時期，主因是在「洪任輝事件」以後，乾隆帝下令中西通商地點僅限廣州一地，致使中西文化交流受到了局限。雖然，正如程美寶所言，由於廣州十三行商館區後來在英法聯軍之役被廣州民眾燒毀，致使許多當時重要的通商史料、日常生活記錄因而失迭，但是無論是中國人觀察西洋食物，抑或洋人觀察中國食物，學界依然能從僅餘的士人筆記、官方記錄、洋商日記等史料窺見當中一二。⁶⁵ 而僅存的歷史文獻亦充分反映當時中國人其實對歐洲人的日常飲食習慣頗為好奇。

雖然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是以商業史角度研究廣州一口通商的歷史，例如從成本、效益等角度來探討這個時期通商體制的運作。但是他也同時留意到，當時洋商的洋人廚師被送至岸上的外國商行服務，因此需要買辦尋找懂得英文的華人廚師為商船水手服務，而這些中國廚師亦掌握了西餐的做法。對他們而言，烹煮正宗的英國料理已是駕輕就熟之事。當時珠江沿岸的農民、買辦，亦曾參與向洋商提供補給品的貿易。他們主要提供豬肉、牛肉、牛奶及食水等補給品。由此可見，他的研究指出在廣州體制下，洋商的日常生活與中西飲食文化交流息息相關。⁶⁶ 而正由於洋商局限在廣州一口通商，大量歐洲人聚集在商館區以及官方所批准行動的地區，因此廣州設有許多西洋餐館，以服務這些洋商以及一部分中國人，例如廣州的法國人老尼克（Old Nick，原名為 Paul-Émile Daurand-Forgues, 1813-1883）的筆記便證實了這一點。⁶⁷ 這反映當時在廣州城內已有許多洋餐館，並且有許多中國傭人為居於廣州的洋人服務，在如此獨特的歷史環境下，中國人有許多接觸西洋飲食文化的機會。事實上，當時許多曾訪問廣州的知識分子及官員，以及作為十三行商人，都曾對西洋飲食文化有所記載。

程美寶研究當時洋商的旅行記中，指出當時十三行商人以何種宴會形式來接待洋人，直接影響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她指出

當時行商喜歡以馬德拉葡萄酒、滿漢全席、粵式西餐來款待洋商。例如首代「潘啟官」潘振承（1714-1788）的廚師，便能煮出一桌英式西菜，甚至也能煮出大航海時代的「西印度式」海龜湯，這反映了華人廚師有可能從洋商水手身上學習到這些西洋料理的烹煮方法。而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職員查理斯·唐寧（Charles Toogood Downing）一次訪問潘啟官並受到其接待時，指曾享用了「一流的英式早餐」。而且，雖然當時北京朝廷曾下令禁止洋人僱用華人幫他們做工，但在廣東官府默許下，洋商漸漸依賴中國傭人，尤其是華人廚師，這體現在欽差大臣林則徐（1785-1850）南下禁煙時洋商商館區被封鎖，以致洋人因很少人懂得煮食而挨餓的事例上，皆因他們已習慣了由中國廚師煮西餐。這些事例都反映當時華人廚師已充分掌握西餐的做法，但因為華人廚師大多因為目不識丁，沒有留下甚麼文字記載，因此令學界難以掌握中西飲食文化交流這一部分的重要史料。現在，我們可以從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牧師所編的廣東話字典中看到，例如在《廣東省土話字彙》中所收錄主僕有關日常三餐的對話，便足以反映當時中西飲食文化在日常生活上的交雜。⁶⁸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程美寶的研究反映在廣州一口通商時期，當時的十三行商人對於進食、提供西洋餐飲，已經是很有經驗了。

同文行作為廣州十三行之中其中一間商行，自然與許多洋商有許多商業、社交宴會，而被洋商稱為「潘啟官」的同文行創始人潘振承之第四子潘有度（1755-1820），在繼承家業以後，作為廣州對外通商事務上最重要的其中一人，亦以詩詞來記錄西方商業文化下的握手禮、宴會文化。⁶⁹ 其寫於嘉慶十七年（1812）的〈西洋雜詠〉有如下記載：

（華夷互市，以拉手為定，無爽約，即盈千累萬皆然。既拉手，名為奢忌慳。）聊知然諾如山重，太古純風羨百蠻。客來親手酌葡萄，（客到飲酒，不飲茶。酒皆葡萄釀成。）響詠琉璃興倍豪。（每飲以碰盃為敬。）寒夜偎爐傾冷酒，（夷人飲冷酒，冬夏皆然。）不知門外雪花高。……金藤

68. May-bo Ching, "Chopsticks or Cutlery: How Canton Hong Merchants Entertained Foreign Gues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Nineteenth Century Centuries", pp.99-115; 程美寶，〈遇見黃東：18-19 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頁 136-149; May-bo Ching, "The Flow of Turtle Soup from the Caribbean via Europe to Canton, and Its Modern American Fate", in *Gastronomica: The Journal of Critical Food Studies*, Vol. 6, No. 1 (March 2016), pp. 79-89; Leiyun Ni, "Reshaping Food Practices and Identities: Anglo-Sino Encounters in Canton", Presented in *Dublin Gastronomy Symposium 2020: Food and Disruption*, Dublin, Ireland, on 25-29 May 2020. URL: <https://arrow.tudublin.ie/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91&context=dgs>. 12 May 2020; 程美寶、劉志偉，〈18、19 世紀廣州洋人家庭裡的中國傭人〉，《史林》，2004 年第 4 期，頁 1-11。

69. 蔡鴻生，〈清代行商的西洋觀——潘有度《西洋雜詠》評說〉，《廣東社會科學》，2003 年第 1 期，頁 70-76。

70. 潘有度，〈西洋雜詠〉，載於潘儀增編，潘飛聲（1858-1934）校對，《番禺潘氏詩略》（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所藏清光緒二十年刻本），卷二，《義松堂遺稿》，頁 2。

71. 曾七如，《小豆棚》（武漢：荊楚書社，1989），頁 322-323。

72. 張問安，〈夏日在廣州戲作洋舶雜詩六首（舟行無事偶憶及之錄於此以備一時故實亦竹枝浪淘沙之意也）〉，載於張問安編著，《亥白詩草》，卷三，《嶺南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448 冊，頁 69。

一丈繞銀壺，（夷人吸水烟，用銀壺注水，約高二尺，烟斗大如碗，金飾藤管長一丈餘。烟斗內載糖和烟葉，用炭燒。）爐熱薰烟錦上鋪。（以錦鋪地盛銀壺。）更有管城分黑白，（口銜火烟如筆形，黑者烟葉卷成白者，紙裹碎烟葉。）無人知是淡巴姑。（烟葉產自呂宋國，夷名淡巴姑。）頭纏白布是摩盧（摩盧國名人皆用白布纏頭），黑肉交身喚鬼奴，供役駛船無別事，傾囊都為買三蘇。（夷呼中國之酒為三蘇，鬼奴歲中所獲傾囊買酒）……養尊和尚亦稱王，（澳門大和尚俗稱和尚王。）婦女填門謁上方，（澳門婦女日臨大和尚寺，跪求懺悔。）齋戒有期名彼是，只供魚鱉厭羔羊，（葡萄牙等國逢「彼是日」齋戒，只食魚鱉海錯，不食牛羊，齋戒期名「里亞彼是里亞日」，期也「彼是魚」也。）⁷⁰

潘有度的文字記錄了當時華商與洋商進行宴會時，喜歡飲用葡萄酒，而且能夠準確指出歐洲人的天主教齋戒習慣，這與明清時代一直以來中國人記載葡萄酒文化、天主教禮俗文化的記載是相符合的，並且也記錄了洋商吸煙習慣，這也反映了洋人在廣州生活時的日常形態。對於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他們亦對西洋飲食文化有所觀察。乾隆四十六年（1781）時，山東文士曾七如（1750-1820）曾經來到廣州遊歷，並於十三行的荷蘭館進食過一頓西餐：

頃設饌，器質亦豫章窯，但金碧滿繪，五彩相煊，與時用者異。每器可容十升。盛難匹，悉剗其頭爪，囫圇以具，不齣切。用鐵牙叉為箸。食用麥，雜以茴胡麻煨塊肉。酒具用白玻璃，晶瑩徹內外，口盎而中直。酒芳冽。余盡三器，渠嘖嘖喜，作指環抵唇者三，通使告余：「羨君能豪。」繼乃散步檻廊，窮觀奇異。⁷¹

曾氏詳細記錄並讚嘆西餐餐具的精美，如酒具、牙叉等等，亦有指出歐洲人喜歡進食的麥類與肉類。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刊刻的《亥白集》，曾載四川士人張問安（1757-1815）訪問廣州時所作的詩句：「名茶細細選頭綱，好趁紅花滿載裝。飽啖大

餐齊脫帽，煙波回首十三行。（自註：鬼子以脫帽為敬。晏客曰大餐。歸國必滿載茶葉、紅花以去。十三行其聚貨處，凡十三所也。）」⁷² 這段文字反映當時洋商的宴會其實與其貿易事業有關，而且指出廣州西洋飲食文化的盛行，其實與十三行對外貿易有關。

對於西洋飲食文化與廣州商貿繁盛關係的記錄，官員趙光（1797-1865）自訂年譜，於道光四年（1824）記錄道：「是時粵府殷富甲天下，洋鹽巨商及茶賈絲商，資本豐厚。外國通商者十餘處，洋行十三家，夷樓海舶，雲集城外，由清波門至十八鋪，街市繁華，十倍蘇杭。……終日宴集往來，加以吟詠贈答，古剎名園，遊覽幾遍。商雲昆仲又偕於登夷館樓閣，設席大餐，酒地花天，洵南海一大都會也。」⁷³ 趙氏認為廣州十三行的繁榮，造就了此地在「夷館」舉行的宴會極多，令廣州美食因此能夠融合中西料理做法，並因而聞名中國各地。有學者亦認為廣州西餐的興盛，除了是廣州因一口通商而得天獨厚以外，更與澳門距離近而受到葡萄牙飲食風格所影響。⁷⁴

雖然許多知識分子對於廣州的西洋食物有正面評價，但在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1718-1783)所寫的《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 中，就收錄了一位羅姓（音譯：Lo）賣鹽商人寄往北京天安街的信，信中充滿了他對西洋食物的反感，這亦為學者所注意到，但未有詳細論述之。⁷⁵ 這位羅先生在麗泉行「昆水官」（Consequa）潘長耀（1759-1823）家宅附近居住，應該是常與「番鬼」（Fan-kwae）商人來往的。這封信記錄了他對西餐的厭惡。雖然它並非以中文寫成，但也反映了當時有些中國人對於西洋食物的觀點。羅先生指洋人吞下一碗叫做“Soo-pe”（筆者按：即 Soup，湯）的液體，然後吞下與活魚差不多的魚肉；然後，洋人又用刀切下「半熟」的生肉，便覺得這些「惡魔」性情很兇猛，因為他們會吃這些「粗俗的食物」；又認為洋人很可悲，因為他們不懂欣賞魚翅、鹿筋之美；羅先生其後又看到了“Cze-Sze”（筆者按：應為 Cheese，芝士），他形容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一種綠白色的物質」，他從洋人處聽說這是乳酸牛乳的複合物，並且

73. 趙光，《趙文恪公自訂年譜》（臺北：廣文書局，1971），頁 89-90。

74. 周松芳，《嶺南飲食文化》（香港：開明書店，2020），頁 145-146。

75. 程美寶，《遇見黃東：18-19 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頁 148-149。

76.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11), pp. 36-40; 關於「羅」姓商人，此處乃根據馮樹鐵、駱幼玲、章文欽所譯版本，詳參威廉·亨特著，馮樹鐵、駱幼玲、章文欽譯：《廣州「番鬼」錄：1825-1844——締約前「番鬼」在廣州的情形》（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228-233。

三．結論

綜合以上所言，在全球史以及新文化史轉向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了學術界所關注的領域。也許正如法國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所言，普通人「心有理為理所不知」。他們未必對於自己生活的每個細節有充足的「意會感」，以意識或解釋到自身行為背後的意義、作用、符號，但這並不代表這些延伸的功能並不存在。學界對於食物史的研究亦是一樣，食物作為客體，本身存在是沒有意義的，但當它與人類社會行為有關連時，它便被賦予了多幾層新的意義。學界應該更主動地去「發現」食物背後與文化、政治、社會現象等議題的關係。正如本文嘗試梳理明清時代的舊史料，重新發現這些史料與重大歷史現象，以及學術界一直以來所關心各種歷史現象的關聯，這都是透過嶄新的全球史、文化交流史、食物史的角度來進行觀察的。

從食物史角度來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困難，在於史料過於零碎，整合需時。筆者在本文指出，明清兩代之涉外文獻，通常為官方文獻、士人的文集及札記、傳教士及天主教徒護教作品等史料。我們依然能從這些史料中，發現它們與食物史研究的關係，也充分反映出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深度和面向是十分豐富的。當時中國人從飲食角度來觀察西洋「他者」是具有不同向度的，也即是本文所列出的五個角度：西洋用餐內容與方式、天主教的禮俗與齋戒文化、西洋葡萄酒與朱古力的飲用、西洋花露水的功用與文化、廣州體制下的飲食文化交流。

據筆者對本文所引文獻的綜合觀察，由明代中葉至清代中葉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典籍之間往往存在抄錄的情況，部份更是一字不譯，這反映了當時涉外知識的傳播往往是透過文字記載，而這亦是一種傳承的關係，反映了中國人數百年對西洋知識的認識是一種知識積累的過程，前人所記載的文化知識，對在鴉片戰爭「槍炮打開國門」之後的中國人而言，是極具參考意義的文獻典籍，他們在「開眼望世界」過程之中所撰著述，亦往往與前人一樣，繼續抄錄前人的記載。例如梁廷枏 (1796-1861) 所撰寫《粵道貢國說》抄錄自《皇朝文獻通考》、《職方外紀》，魏源 (1794-1857)

會放在陽光下暴曬至長滿蟲子；他又看到一杯名為“Pe-Urh”（筆者按：應為 Beer，啤酒）的會冒出泡的飲品，弄髒了他的衣服。⁷⁶可見，羅先生對於這些「番鬼」的西洋食物非常厭惡，並認為歐洲人是民智未開的民族，這反映了當時某些中國人的華夷觀念依然非常強烈。或許，這正如鄒振環所言，中國飲食文化是中國民族自信心的來源之一，即使到了晚清時期亦未見太大的動搖。⁷⁷

廣州體制時期的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正如前面章節所言，作為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與外國交流的「史前史」，我們可以看到其交流特徵是全面的，中國人與歐洲人的交流有很大程度的擴展，例如接觸西洋料理的地理空間、飲食內容等。這當然與學術研究內廣州體制的歷史地位有關。在這時期，中國人對於西洋飲食文化各項細節的關注，延續了前此明清時代中國文獻內的視角，包括關注到飲用葡萄酒的場合、進食西餐時的禮儀這些洋人的日常生活細節，以及對餐具的印象及觀察。這也反映出對於一部分有能力和機會接觸到歐洲人的士人和官員而言，這些西洋文化對於廣州人的影響，可能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外，從上述的文獻可見，當時的中國人依然稱呼洋人為「夷人」。這正好說明研究鴉片戰爭前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的有趣之處，那便是當時中國依然以天朝秩序、華夷概念作為強烈「文化自我」的身份去看待西洋文化。

77. 鄒振環，〈西餐引入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空間的開拓〉，頁 138。

78. 梁廷枏，《粵道貢國說》，載於氏編著，《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217；魏源著，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社，2004），卷三十七，〈大西洋〉，〈大西洋各國總沿革〉，頁 1083；林則徐著，張曼評注，《四洲志》（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卷二十八，〈英吉利國〉，頁 114；同前，卷三十一，〈育奈士迭國〉，頁 144-175。

所撰的《海國圖志》又抄錄了梁廷枏的著作，繼續關注歐洲人的飲食習慣及天主教文化。林則徐的《四洲志》則記載了一些美國原住民「容貌原不惡劣，惟以赤土和黑沙塗面，令人望而駭惡。食則惟魚，甚至以人為食，故市上貿易，多有人之手足」。⁷⁸

以上可見中國人在鴉片戰爭戰敗之後初期，依然認為西方有部分民族仍是茹毛飲血。這種鄙視外夷的態度似乎揮之不去。由此可見，明清兩代對於西方「他者」的認識，在鴉片戰爭前後是一脈相承的。不過，隨着五口通商制度的發展，中國後來被逼開放更多通商口岸，大量洋人湧入中國，令中國人接觸到「先進的」西方文化的機會增多，而導致民族自信喪失以後，中國便出現了「洋味競嘗」的情況，就顯然與鴉片戰爭前那個天朝上國形象迥然不同。這種重大歷史時期的轉變，是學界大多將目光轉向開放五口通商之後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的主因。本文則透過重新梳理明清時期的文獻，證明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已接觸過西洋飲食文化，出現了「洋味初嘗」的情況，累積了不少關於西方的知識，並嘗試建構出「我者」與「他者」的界限與世界觀。因此，學界在研究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時，或許需要再推前研究的歷史時段，以令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歷史延續性能夠得到更廣泛更深刻的關注和研究。

概括而言，本文梳理、整合了鴉片戰爭前明清兩代文獻對於西洋飲食文化的記載，並指出由於史學界出現了全球史、新文化史史學方法的轉向，許多舊史料可以有新的詮釋空間。重新審視這些史料，將有助學界以新方法的微觀角度，發現明清時代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尚有更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陳沛滔，獨立學者，香港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研究興趣為明清史、東亞文化交流史、中華意識、中國基督教史。曾於本地及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十數篇，並於各種專著、期刊發表專論數篇，亦曾獲中國基督教史學會頒發「中國基督教史學生論文獎」（2024 年）。此外，作為中學中國歷史科主任，曾獲香港史學後進協會、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邀請，負責統籌本地中學歷史論文比賽、主編初中中史科香港史教材、主講中史科的教學心得等等。

馬海德與 20 世紀 50-60 年代 中國的梅毒防治工作

George Hatem and the Campaigns against Syphilis
in China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高 翠
Gao Cui

摘要：

20 世紀 50-60 年代，馬海德 (George Hatem, 1910-1988) 擔任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顧問和性病、麻風、頭癬防治研究組組長。他主張針對梅毒採取青黴素十日療法。從 1954 年開始，馬海德率領醫療隊前往內蒙古、青海、甘肅、新疆、雲南、海南等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推廣單純青黴素治療方案。他不斷鑽研抗梅方法，積極開展抗梅運動。加強宣傳教育的同時，搞好民族團結，還積極為群眾治療各種疾病。在長期實踐的基礎上，馬海德提出了「滅病學」的概念，主張將防治工作與社會工作相結合，以形成「社會免疫力」。他的這個觀點對中國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的抗梅工作起了重要指導作用。由於各方的努力，中國得以在 1964 年宣佈已經消滅了性病。

關鍵詞：

馬海德 少數民族 梅毒 青黴素 自報互報

Abstract: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George Hatem (Ma Haide, 1910–1988) served as consultant to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Dermatology and Venereology and head of the Research Group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enereal Diseases, Leprosy, and Tinea Capitis. He advocated a ten-day penicillin regimen for the treatment of syphilis. Beginning in 1954, Ma led medical teams to Inner Mongolia, Qinghai, Gansu, Xinjiang, Yunnan, Hainan, and other minority and frontier regions to promote a standardized penicillin-based therapeutic protocol.

While continuously refining treatment methods, he actively advanced nationwide anti-syphilis campaigns. Alongside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Hatem emphasized ethnic unity and provided treatment for a wide range of illnesses among local populations. Based on long-term practical experience, he formulated the concept of “disease elimination studies,” arguing that disease control efforts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social work in order to cultivate what he termed “social immunity.” This approach played a significant guiding role in

一. 引言

syphilis control efforts in minority and remote regions of China. Through coordinated efforts on multiple front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able to declare the elimination of venereal diseases in 1964.

Keywords:

George Hatem; Ma Haide; ethnic minorities; syphilis; penicillin; self-reporting and mutual reporting

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George Hatem, 1910-1988），祖籍黎巴嫩，1910 年生於紐約布法羅市，1933 年獲瑞士日內瓦大學 (University of Geneva) 醫學博士後到上海行醫。1936 年，馬海德與斯諾 (Edgar Parks Snow, 1905-1972) 一起來到陝北革命根據地，為邊區中央領導和群眾治病。1949 年 9 月底，馬海德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1950 年，馬海德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顧問。

梅毒於 16 世紀由葡萄牙商人帶到印度，然後再傳入中國。在舊中國，由於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室礙了經濟發展，再加上當時教育和衛生水平普遍不高，導致人民貧困，疾病流行，性病在一些城市和少數民族地區廣為蔓延。新中國建立初期，北京和其他城市先後封閉妓院和取締暗娼，剷除了性病的主要傳染源。1951 年 8 月 23 日至 30 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民族衛生會議作出決定，須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強對性病的防治工作。¹

1953 年，馬海德向有關部門提出成立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的建議，獲得了中央批准。1954 年，在馬海德的協助下，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1957 年易名為「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正式成立。當時馬海德經與所長戴正啟共同研究，制定了在全國範圍內消滅性病的計劃。隨後，馬海德長年帶領醫療隊參與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的抗梅運動。幾十年來，學者們並未對此進行系統研究。本文擬利用各種檔案彙編、期刊文獻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馬海德相關文獻，對馬海德防治梅毒的具體情況加以探討，總結其在防治梅毒工作中的方法和經驗，弘揚他無私奉獻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

1. 〈衛生部關於全民族衛生會議的報告〉，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彙編（1951）》（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頁 103。

二．深入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推廣青黴素治療梅毒方案，總結梅毒診斷方法、治癒標準和療後管理經驗

1954 年 5 月，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成立，馬海德擔任顧問，參與制定消滅性病計劃，指導全國性病防治與研究。當時，擔任皮膚病研究所顧問的外國專家都主張採用「914」和鉍聯合使用的長期治療方案。馬海德和國內專家均認為該方案投入人力、物力太大，不符合中國百廢待興的國情，建議使用方法簡便、節省人力物力的青黴素十日療法。這種辦法，國外曾經使用，但缺少遠期療效的觀察資料。

從 1954 年起，馬海德率領醫療隊前往內蒙古、青海、甘肅、新疆、雲南、海南等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向當地農牧民傳授性病防治知識，培訓基層醫務人員，推廣快速梅毒血清試驗的方法和單純青黴素治療方案，為患者檢驗、治療，具體情況見表一²。1958 年，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成立了「性病麻風防治研究組」，在衛生部的統一部署下，負責全國性病、麻風防治工作，由馬海德任組長。

2. 表一的資料採自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編，《中國醫學科學院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皮膚病研究所皮膚病醫院所（院）志》（1954-1993）（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4），頁 138-140；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性病研究所、江西省皮膚病研究所，〈單純青黴素療法治療梅毒 163 例一年療效觀察的初步報告〉，《中華皮膚科雜誌》，1960 年第 1 號，頁 8。

表一 20 世紀 50 年代馬海德在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防治梅毒情況

時間	地點	天數	普查人數	培訓幹部人數	查出患者人數	治療患者人數
1954 年	內蒙古東部					
1955 年	青海、甘肅民族地區		3,666	22	300	
1955 年	內蒙古哲里木盟扎魯特旗	35	2,862	25	447	
1956 年	新疆自治區	35	6,246	35		
1957 年	雲南省彌勒縣西山一區	56	4,883		260	
1958 年	海南島黎、苗族自治州樂東縣和保亭縣			23		
1958 年	江西省寧都縣	40				
1959 年	江西省興國縣					163

在對少數民族地區各地開展梅毒防治工作的同時，馬海德還同時開展青黴素防治梅毒工作的復查工作。內蒙古烏拉特前旗第一區是一個牧區，解放初期梅毒的發病率很高。1952 年北京醫學院曾組織抗梅隊到該地普查梅毒患者，並用油劑青黴素（PAM）進行治療。1954 年 9 月，馬海德帶領醫療隊赴烏拉特前旗檢查青黴素治療性病療效，共檢查了 1,044 人。1957 年 8 月，馬海德再次率醫療隊來此復查性病防治工作，歷時 20 天，復查了 641 人。³1959 年，馬海德等人執筆撰寫〈單純青黴素療法治療梅毒五年療效觀察的初步報告〉，對該地區患者五年觀察結果進行了總結。他指出：「在性病流行地區作為多快好省的普治方法，單純青黴素 300 萬單位的五針療法是可以使用的方法之一，它可以消滅傳染性，並且阻止大部分的晚期梅毒，所出現的一少部分可以由復查復治解決之。」⁴烏特拉前期的十年觀察結果證明，單純青黴素（PAM）300 萬單位（每日或隔日注射一次，十日注射完畢）的近期和遠期療效是優良的，這個治療方案值得推廣應用。通過十年前後梅毒流行情況的對比分析，證明採用普查和用青黴素普治方法，這一地區梅毒已被控制，而加上補查補治之後，可以認為這一地區的梅毒基本上是消滅了。⁵

1960 年，馬海德和工作組成員前往江西省興國縣單純青黴素療法治療梅毒患者進行復查，有兩例發生臨床復發，復發率為 1.23%，顯示出單純青黴素療法在預防梅毒的臨床復發上有良好效果。⁶

1965 年，馬海德率領醫療隊來到內蒙古哲里木盟扎魯特旗草原開展性病防治和復查工作。在日後回憶這段難忘的時光時，他講到：「我們還將在中心位置設立兩間實驗室，每天騎行運送標本，並用橡膠輪馬車運送移動設備、藥品和醫療團隊人員。我們有大量的藥品庫存，當地盟級醫療衛生機構也提供了足夠數量的設備。」⁷馬海德又指出：「我們對幾千人以及 1955 年接受治療的幾百名病人進行了檢查。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復發病例，沒有新的傳染性梅毒病例，也沒有一例先天性梅毒病例，而所有這些病症在以前都很常見。自 1955 年以來，僅發現 11 例梅毒潛

伏病例，其中大部分發生於 40 歲以上的人群。我們檢查了至少 97% 的人口，因此，我們認為這些結果非常可靠。」⁸單純青黴素治療「既容易為患者接受、堅持完成療程，而且更為簡便、經濟和安全，可以作為消滅一個地區梅毒的有力武器」。⁹隨着衛生工作的開展和驅梅的影響，民主公社十年來人口有顯著增長，1955 年 2,548 人，到 1965 年增至 3,343 人（遷入人口除外）。¹⁰

加強對梅毒患者的診斷工作，是防治梅毒的重要工作。為了避免對潛伏性梅毒患者的誤診，1955 年，馬海德曾在若干邊遠地區及農村進行了沉降反應與補體結合反應同時對照的試驗，獲得了比較滿意的結果。1956 年，《中級醫刊》發表了馬海德等人撰寫的〈在鄉村地區進行血清補體結合試驗的經驗介紹〉一文，對這一試驗的設備要求及各種材料準備、技術操作和試驗結果等問題進行了介紹，總結了成功經驗。馬海德指出：在冷藏設備方面，應採用挖地窖，保證最高溫不超過 8℃，採用洋鐵製成的水溫箱用木炭或牛糞（如有條件地區最好能用煤油爐）加溫的辦法；關於補體問題，要攜帶事先製備好的乾燥補體來代替新鮮補體；關於血清問題，將中心化驗室固定在一個比較適中的地方，距離各村均較近（以不超過一百華里為原則），這樣在各村取的血可放入空的乾蒸過的青黴素小瓶內，蓋好橡膠塞，由專人在當日送到中心化驗室（送前最好能斜放兩小時，使能多出些血清，並避免溶血）。¹¹

制定梅毒治癒標準和療後管理是梅毒防治最後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在總結過去防治工作經驗的基礎上，1965 年 5 月，馬海德強調：關於梅毒治癒的判斷及評價一個地區控制梅毒的指標，要以具體分析病人的身體狀況為主，而不是單憑血清化驗的結果。治癒標準包括：（1）正規充足的治療；（2）必要的觀察期限；（3）臨床檢查結果；（4）梅毒婦女療後生育情況；及（5）參考血清及其他化驗結果。對於考核一個地區防治後梅毒是否已被控制，要從五個方面考慮：（1）充分估計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所出現的一系列巨大變化（包括政治、經濟、文教衛生、精神面貌等）和社會主義教育（包括道德品質的教育）的作用；

3.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編，《中國醫學科學院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皮膚病研究所皮膚病醫院所 (院) 志》(1954-1993)，頁 139。

4.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北京醫學院皮膚性病教研組、內蒙古自治區地方病防治所，〈單純青黴素療法治療梅毒五年療效觀察的初步報告〉，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性病研究所編《性病麻風防研工作》，1958 年第 1 期，頁 18。

5.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性病研究所、內蒙古自治區流行病研究所和包頭市衛生局、北京醫學院皮膚性病教研組，〈青黴素治療梅毒經過十年後的療效觀察〉，《中華醫學雜誌》，1963 年第 3 期，頁 185。

6.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性病研究所、江西省皮膚病研究所，〈單純青黴素療法治療梅毒 163 例一年療效觀察的初步報告〉，《中華皮膚科雜誌》，1960 年第 1 號，頁 8。

7. Ma Hai-Teh, "A Century in a Decade: Inner Mongolia Revisited,"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p.5. 該文的中文版〈十年後重訪內蒙古〉，發表於《今日中國》1965 年第 9 期。

8. Ma, "A Century in a Decade," p.8.

9.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性病研究所、內蒙古自治區流行病研究所和包頭市衛生局、北京醫學院皮膚性病教研組，〈青黴素治療梅毒經過十年後的療效觀察〉。

10. 馬海德，〈內蒙哲盟扎旗牧區梅毒防治後十年復查彙報及關於我國梅毒療後管理的若干問題與建議〉，1965 年 5 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1. 馬海德、葉幹運、馬兆祥、閻盛發，〈在鄉村地區進行血清補體結合試驗的經驗介紹〉，《中級醫刊》，1956 年第 8 號，頁 42-43。

三．加強對群眾的宣傳教育，提高群眾對梅毒的認識，發動群眾「自報互報」

在梅毒的治療過程中，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發現梅毒病人，很多患者在道德上存在着羞愧心理，考慮到自己的名譽、家庭和職業等因素，不願意說出自己的病情。以往各地的做法是依靠性病防治專業隊伍採取普查的辦法。但是，這種方法存在着在人口比較密集、發病率比較低的地區見效慢的缺點。通過借鑒河北省黨委以宣傳教育發動群眾自報互報的做法，馬海德提出根據當地思想情況、風俗習慣，因地制宜開展宣傳，大力宣傳進行防治性病的偉大意義，傳達黨對人民的親切關懷，用各種方法解除人們的種種顧慮。¹³「對群眾的宣傳工作強調需要人們的積極參與，自助和掌握知識會使他們免受疾病的困擾。健康知識的宣傳和普及的主旨被調整為滿足大眾的興趣。」¹⁴馬海德因此主張在對群眾進行充分的宣傳動員以後，群眾依據尋找病人的綫索進行自報和互報，同時組織當地老農、社幹、醫生、積極分子等熟悉當地情況者進行補報。

早在馬海德在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地區開展梅毒防治工作之初，就十分注重對群眾的宣傳工作。1956年，馬海德率領醫療隊來到新疆昭蘇縣貝洛克蘇的草原診所為牧民進行體檢，對一般性疾病和性病開展綜合調查。「每天例行公事是這樣開始的。首先，一人（我們的廚師）拍着手鼓，另兩人（卡車司機）彈着曼陀林哼起宣傳健康的小曲子。然後，我們的隊長向大夥普及保健、婦幼健康、抗疾等知識，分發健康宣傳手冊，並展示蠟像模型。我們向牧民詳細解釋了健康檢查的目的和相關程式，包括抽血、提取糞便樣本、全身檢查和繪製病歷圖。牧民以家庭為單位接受體檢」，「接受完診療後，牧民騎上駿馬啟程離開，一旦化驗室化驗結果顯示有其他病症，工作人員便會進一步通知他們」，「那些經檢查患有性病的人將會在三天後收到通知，要求其返回診所接受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¹⁵

江西省寧都縣是馬海德依靠發動群眾消滅性病的典型地區。20世紀50年代後期，隨着江西省人民公社的發展，以前分散居住和工作的人們，大量集中在田間、工廠和大型灌溉工程的建設

（2）防治措施本身的品質。例如，發現病人這項工作的品質如何，對於普查後遺漏的物件採取了怎樣的補查追查，治療是否正規、有無中斷，復查復治的情況等；（3）傳染源已被消滅，無新感染發生；（4）早期顯發梅毒、晚期良性梅毒及各期潛伏梅毒要求達到治癒，神經和內臟梅毒應具體分析；（5）防治了先天梅毒，梅毒婦女的生育情況有所改善。在防治前梅毒流行嚴重、人口下降的地區經過防治後人口出現增長。對於梅毒治療後管理的規模、工作部署應當結合一個地區疾病的主次，因時且因地制宜來考慮和安排衛生工作的中心任務，不要因強調梅毒而影響了其他疾病的防治。馬海德對梅毒的療後管理提出的具體意見為：（1）提高警惕，徹底消滅傳染源，鞏固已經取得的成果。梅毒的療後管理工作必須與階級鬥爭緊密結合起來，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決依靠黨的領導，結合各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階級觀點、階級教育出發，切實做好防治梅毒的宣傳教育。在具體工作中必須提高警惕，及時發現和撲滅新的感染，積極追查其傳染來源並予以治療；（2）進行必要的復查和補查，根據需要進行復治和補治。療後復查不一定要普遍進行，可以選擇幾個重點地區，分批分期地進行。通過解剖麻雀的方式來考核防治效果，總結經驗。對那些遺漏的物件和個別復發的患者應予以補查、復查和必要的治療。從地區性梅毒防治角度出發，對於外地遷入的人口應予以檢查；（3）依靠基層，技術下放，採取「站崗放哨」的方式進行療後管理。所謂「站崗放哨」就是提高警惕，帶着消滅梅毒的觀點，發現可疑傳染源及復發物件。遇有疑難問題時，可以上報，通過上一級的醫療機構（如一般的縣醫院或旗醫院）來協助解決，把這為數甚少的個別病例當作一般疾病進行診治，具體問題，具體處理。¹²

從1954年到1965年，經過長期在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防治性病的實踐，馬海德不僅驗證了青黴素治療梅毒方案的有效性，而且還對梅毒的治癒標準、評價一個地區控制梅毒的指標和梅毒療後管理等重要問題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對於推動全國少數民族地區的抗梅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2. 馬海德，〈內蒙哲盟扎旗牧區梅毒防治後十年復查彙報及關於我國梅毒療後管理的若干問題與建議〉。

13. Ma Hai-Teh, "With Mao Tse-Tung's Thought as the Compass for Action in the Control of Venereal Diseases in China," *China's Medicine* (October 1966), p.61.

14. Ma, "With Mao Tse-Tung's Thought as the Compass for Action in the Control of Venereal Diseases in China," p.63.

15. Ma Hai-Teh, "Clinic for the Kazakhs," *China Reconstructs* (March 1957), p.12.

工地上，這些人在公共食堂吃飯，孩子和老人也在新的公社環境下生活，這樣就容易造成各種寄生蟲病和其他疾病的廣泛傳播。1958 年 11 月，在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戴正啟副所長帶領下，馬海德和工作組成員前往江西省寧都縣進行性病防治研究工作。

根據馬海德的記載，寧都縣的縣委書記、公社領導、衛生局長、紅十字志願者、學生、婦女組織代表、農民積極分子、衛生員、接生婆、中醫等近千人在參加完防治性病、麻風、頭癬動員大會後，被分成兩組——「政治組」和「醫務組」。「政治組」接受了為期兩天關於宣傳工作的集中培訓，學習有關疾病的感染方式和主要症狀。為了幫助尋找病例，分別編制了每種疾病的問卷，總結了各種症狀。然後將調查問卷發放給小組成員，由小組成員在各鄉鎮和全市各居民委員會進行講解。醫務組裏的「醫務人員」主要由非醫療人員組成，但要求他們年滿 18 周歲，具有相當於小學的學歷，能認識 2,000 個字。他們接受了為期七天的課程，學習如何診斷、檢查和治療病例。每個人都學習了如何做簡單的體檢，發現皮膚病變，並做梅毒的鮮血玻片檢查。「政治組」學員在受訓後，先回到公社，為醫科學員的工作做準備。他們通過講解此次活動的目的、防治疾病的性質和問卷調查制度，對群眾進行了動員。截至第二個月末，寧都共檢查治療了 49,000 個病例。¹⁶

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採取綫索調查，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將 89.1% 的性病患者查出，這種方法是當時條件下適合我國農村地區一種多快好省的發現病人的方法。¹⁷ 研究組蹲點調研三個月，事實證明，在衛生工作中推行這樣的群眾路綫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得到了當地群眾的積極反應」，「他們把消除疾病的工作當成自己的事情去處理」。¹⁸「醫學科學研究工作只有在黨的領導下，走群眾路綫，堅持研究工作與防治工作相結合，為防治工作服務的正確方向，才有可能做出成績和貢獻。」¹⁹

在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梅毒防治復查工作中，馬海德繼續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宣傳教育。1955 年，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與內

蒙古性病防治所、哲盟防疫站共同組織工作隊前往內蒙哲盟扎旗進行梅毒普查。隨後，由自治區和盟組織驅梅隊，深入現場設立治療點，對所有患者進行了治療並連續觀察。1965 年 3 月，為了鞏固消滅性病的成果，中央皮膚病研究所工作組和內蒙古性病皮膚病研究所、哲盟防疫站等單位工作人員，對民主公社進行普查和復查，對另外三個木業公社進行復查和重點抽查。這次除復查原有患者外，還對當地居民進行了全民普查。普查開始之前，首先由公社進行動員和佈置，各生產隊通過召開不同類型的會議（如幹部會、群眾會）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宣傳。²⁰ 由於事先廣泛的宣傳教育，廣大群眾明白到事情的重要性，因此積極主動配合工作，推動了復查的順利完成。

通過加強對群眾的宣傳教育，廣大群眾逐漸參與到抗梅運動當中，大大推動了這項工作的開展。1956 年，馬海德在內蒙古和新疆防治性病結束後，返回北京。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在北京廣播電台採訪了馬海德到少數民族地區醫療活動情況。馬海德指出：「在我們去過的大多數地方或者說幾乎每個地方，我們都受到了熱烈歡迎。所有少數民族對他們的朋友都很熱情友好。通常，當我們到達某個地方時，我們就被視為中央政府的代表，他們對人民政府充滿信心，人民政府也在其他方面為他們做了很多事情。」²¹ 早在 1952 年，馬海德在內蒙古烏特拉旗為一位患有性病的女性患者注射了青黴素。1954 年，馬海德第二次來的時候，再次遇到了這位婦女。據他後來回憶：「她稱讚我們注射藥物的效果，說她回家以後生了一個健康的孩子，並希望我們再給她注射一些藥物。1957 年，她沒有過來復查，但 1962 年，她帶着八個孩子來到我們的診所。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醫生，這次說什麼我都不再打針了。我生了九個健康的孩子，夠得很了！』」²² 1965 年，馬海德在內蒙古哲里木盟扎魯特旗草原上進行復查診治期間，巴雅爾圖胡碩鎮黨委書記巴同志還介紹說，幾對結婚 15 年以上的夫妻在治療後才育有孩子。²³ 隨後，馬海德在巴彥琥碩草原開展工作，當地一位生產隊黨委書記還說，自從馬海德 1955 年來到這裏，自己有了四個孩子，其他人也有了更多的孩子。²⁴

16. Ma Hai-Teh, "Wiping out Disease by Mass Action," *China Reconstructs* (August 1959), p.10.

17.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江西省皮膚性病研究所聯合研究組，〈我們是怎樣把研究工作與防治工作結合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醫療預防司，《全國防治性病麻風頭癬寧都現場會議資料彙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49），頁 86。

18. Ma, "With Mao Tse-Tung's Thought as the Compass for Action in the Control of Venereal Diseases in China," p.61.

19.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江西省皮膚性病研究所聯合研究組，〈我們是怎樣把研究工作與防治工作結合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醫療預防司，《全國防治性病麻風頭癬寧都現場會議資料彙編》，頁 93。

20. 馬海德，〈復查內蒙哲盟扎旗牧區梅毒防治後十年復查彙報及關於我國梅毒療後管理的若干問題與建議〉。

21.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在北京廣播電台採訪馬海德的關於到少數民族地區醫療考察情況的談話記錄〉，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22. Ma Hai-Teh, "U.S. Negroes and China's Minorities," *China Reconstructs* (October 1963), p.8.

23. Ma, "A Century in a Decade," p.5.

24. Ma, "A Century in a Decade," p.9.

四．加強民族團結，為群眾檢查治病，帶動群眾積極參與防治梅毒工作

為了開展梅毒防治工作，馬海德率領的醫療隊還在少數民族地區治病，團結當地群眾，調動他們參與到這項防治工作中來。前文曾提到，1957 年 5 月，馬海德率隊在雲南省彌勒縣查治皮膚病和性病。馬海德後來曾回憶道，為了方便農民就診，「我們把工作時間改為傍晚六點到晚上十一點。這樣，農民就可以在田間勞作和晚飯結束後前來就診。實際執行時，工作時間又逐漸變成了晚上八點到凌晨兩點」。²⁵ 馬海德還在工作之餘，在返回的路上與阿細族同事一起摘草莓，學唱民歌，了解一些有趣的阿細習俗。²⁶1958 年 4 月，馬海德帶領中央皮膚病防治隊，來到海南島黎、苗族自治州樂東縣和保亭縣，開展性病普查防治工作。「馬海德大夫態度非常和藹，對學員學習、工作等方面，卻要求很嚴格，常教導學員遵守紀律，認真執行民族政策，搞好團結。」²⁷

在各地防治梅毒期間，最基本的工作是對當地人民進行體檢。1956 年，馬海德率醫療隊在新疆貝洛克蘇草原為牧民體檢，他日後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該地區除了良種牛群令人稱道外，還以多雨和冰雹天氣聞名。偶爾下起冰雹來，劈里啪啦地砸上半個小時」，「橡子般大小的冰雹會砸到馬頭或人頭，引起一片不受控的混亂」。²⁸1957 年 5 月，馬海德率隊在雲南省彌勒縣查治皮膚病、性病期間還給當地中小學生進行體檢。除了常見的病例外，醫療隊也處理了一些麻風病的早期病例，其中一些麻風病人被轉移到雲南省醫療機構建立的「麻風病村」。²⁹1961 年，馬海德隨醫療隊來到位於海南島的海安縣，檢查當地公社群眾衛生狀況，進行大型實地調查，研究農村條件下疾病控制的方法及其在實踐中的有效性。他發現，「當地人口迅速增長，人們營養充足，年輕人有些肥胖，女人們曬成了古銅色，體態豐腴，老人們也愈發年輕。該地在消除瘧疾和治療血吸蟲病等疾病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醫療服務水準大幅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狀況一片向好」。³⁰

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缺醫少藥，當地群眾經常發生一些緊急情況需要處理。馬海德在各地防治梅毒期間也處理了群眾的很多疑難雜症、疫情和緊急病症。

1955 年 4 月，馬海德帶領醫療隊在青海、甘肅兩省調查性病流行和防治情況期間，治療了幾百例裕固族人的老毛病，得到裕固族群眾的信任。隨後，馬海德隨醫療隊深入西北內地。青海西寧的喇嘛教宗教領袖班禪因出麻疹發高燒不退，當地的土醫生也沒有辦法。馬海德對他進行了診治。後來，馬海德對好友路易·艾黎 (Rewi Alley, 1897-1987) 提及此事時說：「發現他嘴裏有小點點，這才查明病因」，「料到第二天會出現皮疹」，「預言應驗時，他們向我們熱烈歡呼，簡直把我當成神仙。後來事情就好辦了，不久他能起床活動了。」³¹

馬海德 1956 年率醫療隊在新疆自治區貝洛克蘇草原為牧民治療了很多急症。他日後回憶說：「有時候我們正在工作着，會迎來個哈薩克牧民，他牽着另一匹備好鞍的馬，請求我們的醫生上馬一同前往他家給他家人看病」，「接着就要再騎上三四個小時，但這種情況下我們遇上的問題一般是難產、手臂骨折、肺炎發作、被蛇咬、肩膀脫臼或意外癱瘓。」³²三星期之後，馬海德又率醫療隊前往賽克森貝爾牧場，恰遇炭疽疫情，醫療隊每天接待約 150 名患者。「一群醫生和醫務人員駐紮在草原上，營地裏有手術室、化驗室、藥房和診所，但沒有病房。病人帶着自己的蒙古包、一頭牛和幾隻羊來，安頓在營地裏，並逐漸發展成了『醫院』」，「一旦某地報告病例，我們的醫療隊員便趕往此處，將確診病例及有關人員進行隔離治療，並耐心解釋情況，這一番工作使得狀況有所好轉。經過十多天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們成功救治了所有患者，也未因為疫情損失過多的牛。」³³

1957 年 5 月，馬海德率隊在雲南省彌勒縣查治皮膚病、性病。一次，工作隊同志在給群眾檢查治病的時候，遇到一農民患重感冒，當時隊員未帶有適用的藥品給其治療，晚上回到駐地談及此事，馬海德立即派該組同志連夜打着火把，為病人送藥。馬海德對人民極其負責的精神，至今仍在幹部和群眾中傳頌着。³⁴

1965 年，馬海德率領醫療隊在內蒙古哲盟民主公社和另外

25. Ma Hai-Teh, "Health for the Ahsi People," China Reconstructs (December 1957), p.24.

26. Ma, "Health for the Ahsi People," p.25.

27. 〈馬海德博士海南行〉，林海泉編著，《海南醫學史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頁 126。

28. Ma, "Clinic for the Kazakhs," p.13.

29. Ma, "Health for the Ahsi People," p.25.

30. Ma Hai-Teh, "Health, Communes and Cotton In Hai-an," China Reconstructs (March 1965), p.38.

31. 路易·艾黎 (Rewi Alley) 著、徐存免譯，《在中國的六個美國人》（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頁 29。

32. Ma, "Clinic for the Kazakhs," p.13.

33. Ma, "Clinic for the Kazakhs," p.15.

34. 雲南省昆明醫學院附屬一院皮膚科孫穆雍〈馬海德大夫在雲南診治性病〉，中國科學技術學會、中國麻風防治協會、馬海德基金會編，《馬海德博士誕辰一百周年紀年文集》，（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頁 128。

35. Ma,"A Century in a Decade," p.5.

36. Ma,"A Century in a Decade," p.7.

37. Ma Hai-The, "On the Sinkiang Road," China Reconstructs (February 1957), p.25.

38. Ma,"Clinic for the Kazakhs," p.13.

三個木業公社進行性病防治復查。牧民在當地自行加造了以蒙古包為原型、泥磚砌牆外覆一層石膏的房屋，有些房屋供醫療隊使用。當地牧民一般會養幾隻非常兇猛的狗作守衛之用，但正因如此，這些狗常會咬傷人類。馬海德率領的醫療隊在開展工作過程中，還治療了當地的多例為狗所傷的病例。³⁵ 在巴彥琥碩草原開展工作期間，醫療隊還在夜晚處理了產婦分娩後出血、大出血難產、孩子發燒、腿部骨折、猝死等緊急情況。³⁶

馬海德在少數民族地區為群眾檢查治病，贏得了廣大群眾的信任。在新疆防治性病期間，醫療隊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我們沿途經過的每個村莊，村民們都捧着優酪乳和酸馬奶酒等待著我們。」³⁷1957 年，馬海德率領醫療隊在新疆昭蘇縣貝洛克蘇草原防治梅毒，「牧民來看病時經常帶着一個裝滿酸馬奶酒（一種發酵後的馬奶，酒精含量和啤酒相當）的大皮瓶，邀請醫生共飲。這是當地的習俗，甚至五個月大的孩子也能喝。當走進牧民的蒙古包時，按照習俗，你必須一次喝下四碗馬奶酒，也就是你得一次拿兩碗，一滴不灑一口氣地把酒乾了。一開始出於禮貌，我們有些醫生沒有拒絕病人們的酒。但一碗酒下肚，他們頭暈目眩，得休息 15 分鐘。所以我們定了條規矩，上班時不准喝馬奶酒。堅持了兩星期後，這個規定也沒有人遵守了。但那時我們已經適應了，能和大家一樣把馬奶酒當水喝。」³⁸ 當時，牧民們還按照哈薩克族和維吾爾族習俗，操辦盛宴，宰頭羊，款待醫療隊。據馬海德記載：「首先在草地上鋪設兩張大地毯。待貴賓在上方落座後，主人端出酸馬奶酒以示歡迎，賓客必須先喝下四碗馬奶酒，之後隨意飲用。地毯的一塊布上放滿了鹹麵包卷、黃油、優酪乳、茶、糖和糖果，過了一會兒，按照習俗，主人拽着小羊羔的蹄子拉到客人面前，客人這時會雙手掌心向上，嘴裏說着『阿曼』回饋敬意。接着就宰殺這頭小羊羔。令人驚訝的是，沒過多久，主人就把烤羊肉串端了上來，接着是用羊尾巴上的脂肪製成的『三明治』，用切成片的羊肝代替通常的麵包。大家邊喝着酸馬奶酒邊談天說地，接着主人會端上一個大銅盤，裏面盛着煮熟的剩下的整隻羊。此時貴賓拿起羊頭，用刀子割下耳朵和部分下巴，再

把剩下的遞給主人。在這一儀式後，大家都開始大快朵頤。主人會將剩餘的羊肉切片放入一個盆中，然後加入麵條，倒入羊肉湯開始熬煮。這是第二道菜。接着大家將手握成杯狀，放入麵條和羊肉，然後輕輕轉動手腕，猛得一嘖，是順利入口還是沾滿全臉，得看個人的功夫了。然後，主人會端上一杯杯熱氣騰騰的羊肉湯和濃醇的紅茶。這場盛宴也就到了尾聲。這時客人要將手掌向上舉起說『Rahmat！』（謝謝），並抹一下鬍子，就算沒有鬍子也得照做。」³⁹

經過長期醫療實踐，馬海德提出了「滅病學」的概念，主張要動員群眾，移風易俗，提高人們對防治性病的認識，把防治工作與社會工作相結合，開展全方位的防治，形成「社會免疫力」。他說：「通過現場防治研究，把梅毒防治工作和群眾運動結合起來，認真貫徹了領導、專業人員與群眾的三結合，從而找到了切合我國實際情況、符合多快好省的防治梅毒的有效措施。」⁴⁰ 這一觀點對中國性病防治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1956 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第 26 條提出，要在 7 至 12 年內消滅性病。1 月 5 日，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召開「全國皮膚性病防治規劃專家座談會」，對全國皮膚性病防治研究工作進行規劃。衛生部副部長崔義田 (1906-1989) 參加了會議，馬海德作為專家也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採納既經濟、治療週期又短（三星期）的「單純青黴素抗梅治療方案」。會議還決議編輯《性病、麻風、雅司病防治手冊》。該書由胡傳揆 (1901-1986) 等人編著，馬海德也參與了編寫工作，1957 年 6 月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該書在對國家消滅性病的保健政策進行介紹的同時，提出「在 1963 年 -1967 年期間要把全國傳染型性病消滅」的目標和「建立全國性皮膚病防治網」的任務。該書還對性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主要症狀及其分期等問題進行了闡述」。⁴¹ 這項科學的治療方案隨後在全國推廣，使廣大患者受益。

1959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3 日，衛生部和內務部聯合在江西

39. Ma,"Clinic for the Kazakhs," p.14.

40. 馬海德，〈內蒙哲盟扎旗牧區梅毒防治後十年復查彙報及關於我國梅毒療後管理的若干問題與建議〉。

41. 胡傳揆等編著，《性病、麻風、雅司病防治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頁 5。

省寧都縣召開了全國性病麻風頭癬的防治經驗現場交流會，胡傳揆等人在會上做了〈關於性病、麻風、頭癬防研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發言，他指出，從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與內蒙古性病防治所的研究成績來看，600 萬單位青黴素的療效還是可以肯定的。治療後五年的觀察，說明血清轉陰率為 49.3%。而復發或病情發展的只是個別例子。⁴² 會議決定將梅毒防治工作與社會工作結合的經驗向全國推廣。⁴³

五．結語

1964 年，胡傳揆在北京科學討論會上宣讀〈我國對梅毒的控制和消滅〉一文時指出，「經過研究對比之後，我們推薦用青黴素治療方案，因為它療效好，可以消滅一個地區的梅毒，用起來經濟簡便，安全，療程短，患者易於完成治療，此藥的國產量也足」，通過不懈的努力，「全國梅毒的流行已基本被控制住了」，「內蒙等五個省（區）少數民族地區的梅毒患病率和早期梅毒總人數的比例，在 1951-1960 年十年間均顯著下降。某些地區早期顯發梅毒已經絕跡」。內蒙古自治區的人口已由防治前的下降轉為明顯的上升。呼倫貝爾盟烏索木 390 戶牧民家庭從 1952 年至 1956 年人口年增長率在 14.7-26.1% 之間，昭烏達盟查幹木淪蘇木 1951 年至 1956 年 280 戶梅毒家庭增長率為 12.8-25.3%，在 387 戶非梅毒家庭中增長率為 8.4-24.7%⁴⁴。1965 年，馬海德在結束對內蒙古地區的復查工作時也自豪地說：「過去幾百年來在草原上一直遊牧的牧民現在能過建立永久性固定居所和村莊，從而結束了過去的苦難和人民（尤其是老幼人群）的不穩定生活，使得牧民有機會獲得更富足的生活條件、更全面的衛生、教育和

42.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醫療預防司編，《全國防治性病麻風頭癬寧都現場會議資料彙編》，頁 272。

43.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醫療預防司編，《全國防治性病麻風頭癬寧都現場會議資料彙編》，頁 2-3。

44. 胡傳揆、葉幹運、陳錫唐，〈我國對梅毒的控制和消滅〉，《科學通報》，1964 年第 5 期，頁 506。

文化服務以及更優越的經濟條件。這些革命性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人口的增加，並扭轉了人口減少的趨勢。」⁴⁵

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馬海德等人參與的「基本消滅性病的防治研究」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86 年，阿爾伯特和瑪麗·拉斯克基金會 (Lasker Foundation) 將阿爾伯特·拉斯克公共服務獎授予馬海德，基金會在致辭中指出：在控制性病方面，馬海德是「絕無僅有的公共衛生典範」。⁴⁶ 1988 年 9 月，衛生部授予馬海德「新中國衛生事業的先驅」的榮譽稱號。2019 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馬海德被中共中央宣傳部等機構聯合授予「最美奮鬥者」稱號；2021 年建黨百年之際，馬海德入選「100 位重要英雄模範名單」。

45. Ma, "A Century in a Decade," p.11.

46. 〈美國拉斯克基金會授予馬海德的拉斯克公共衛生服務獎狀 (1986 年 11 月 21 日)〉，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 本文為 2021 年度中國國家博物館科研專案「馬海德當代文獻整理和研究」(編號：GBKX2021Y28) 成果。

高翠，現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獲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史碩士及中國史博士學位。她曾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研究室任職，負責編輯《黨史研究資料》。自 2005 年起，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及館刊編輯部工作，負責編輯《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及《博物館管理》。其研究與編輯工作主要聚焦於中國近現代史，並於核心期刊及省部級學術刊物發表多篇論文。

未名口述史： 新技術與新舊交織的 校園 BBS 社群

The Weiming Oral History Project: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Interweaving of Old and New
in a Campus BBS Community

張 璟
Zhang Jing

摘要：

本文以 2000 年初的北大未名 BBS 為研究對象，試圖探討互聯網早期的 BBS 技術在高校環境下塑造了怎樣的網路社群形態。以歷史當事人對未名 BBS 的使用和體驗記憶為一手材料，論文揭示了從資訊獲取到日常社交的技術使用變化，在此基礎之上探討了早期 BBS 社群現實與虛擬相嵌的屬性，兩者皆反映出新舊媒介交替的過渡期特點。論文認為，BBS 社群既不是簡單的虛擬社群，亦非綫下社群的複製。綫下校園的社會連接提供社群歸屬感的基礎，虛擬空間中所培育的自主文化又顛覆了綫下的等級關係，塑造了可與校園權威協商的社會力量。綫上綫下的相互作用以及技術與文化的互動，塑造了早期高校 BBS 的社群特質。

關鍵詞：

虛擬社群，互聯網歷史，技術使用，中國高校文化，BBS 記憶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early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culture shaped online communities by focusing on the Weiming BBS at Peking University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Relying on participants' memories of using and experiencing Weiming BBS,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hanging ways in which students used the technology and how it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virtual community. Both facts historically reflected the transi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early university BBS communities were neither simply virtual communities nor replicas of offline communities. Social connections in the campus brought about a sense of community, while a culture of autonomy that subverted power relations thrived in virtual spac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realm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culture have forged this early BBS community.

Keywords:

Virtual communities, Internet history, Social use of technology, Chinese university culture, BBS memories

一．導言

BBS 是中國互聯網早期誕生於大學校園的新生事物。BBS 全稱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是基於 telnet 登錄伺服器之純文字論壇。用戶可以在上面發帖，流覽帖子，回復帖子參與討論。1995 年，清華大學啟動了第一個基於互聯網的電子公告牌，當時全國僅有數千人使用互聯網。在隨後的兩年內，國內知名學府紛紛建設了自己的 BBS 站點。因為技術支持和互聯網知識迅速普及，高校成為國內較早日常使用網路的區域。在更商業化大眾化圖文並茂的論壇出現之前，校園 BBS 曾經是中國最主流的論壇形式。本文以 2000 年初的北大未名 BBS 為考察焦點，試圖探討 BBS 技術在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最早期塑造了怎樣的高校網路社群，大學 BBS 社群呈現出怎樣的綫下綫上關係。

互聯網歷史在近年獲得了多國學者的關注，並且從不同國家不同社會層面的視角出發，打破了原有的以英美為中心的互聯網科技政治史敘事。1990 年代的互聯網歷史往往受到冷戰敘事的影響，以美國的阿帕網（APPANET）為起點，圍繞著科技發展、組織文化和政治經濟勢力組織敘事。¹ 新一代學者通過梳理 1990 年代前各種網路模型，嘗試揭開被主流歷史敘事所遮蔽的更複雜的互聯網史。² 自此，全球互聯網歷史研究呈現出兩個新的趨勢。一是超越了傳統科技史和政經視角，從不同社會文化視角挖掘出如平臺用戶史，垃圾郵件史，與性別史交叉的互聯網史等。³ 二是去西方中心視角的研究蓬勃發展，論證了不同國家的差異化歷史演變。不僅湧現了法國、波蘭等西方國家為中心的敘事，還出現了亞洲和拉美國家視角的研究。⁴ 中國互聯網史的研究依舊以科技精英、商業精英的英雄中心敘事和長時段的宏大敘事居多。⁵ 近兩年的研究從媒介敘事和社會記憶路徑書寫互聯網史，以網民自傳或新媒體事件的集體記憶為切口，將關注點放置於用戶之上。⁶

由於 BBS 的出現標誌了因特網從科技意義向社交意義的轉變，在各國早期互聯網歷史研究中都是極為重要的議題。Driscoll 考察了 1990 年代美國撥號上網時代的 BBS 實踐，探討互聯網如何一步步地走向社交化。⁷ 研究中國早期論壇的學者們

主要在國家、公眾、知識精英的框架下考察網路公共空間，從而討論國家社會之間的權力關係。比如，Zhou 認為強國論壇、軍事網站等早期政論型 BBS 是中外資訊彙聚和公共表達的重要網路空間，並顯示由中產主導的強烈愛國主義情緒。⁸ Jin 指出了綜合性論壇多對多的傳播機制和中國用戶在虛擬的公共領域中討論的熱情。⁹ Yang 從早期論壇的各類顛覆性觀點和抗爭行動，看網路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網民在參與 BBS 表達的過程中獲得了個體感和社群的歸屬感。¹⁰ Lei 進一步探討了 2000 年前後在論壇萌發的公眾意識是如何被互相聯繫的媒介和法律機構所培育。¹¹

本文將 BBS 研究放置於數字媒介走向大眾化之前的特殊過渡時期，在 20 年前的中國互聯網的技術與文化語境之下探討網路社群的形成與發展脈絡。圍繞 BBS 的社群研究目前仍不多見。Hao-Nan Yang 等人用多種計算方法分析了北大未名在內的四個大學 BBS 用戶的興趣板塊、流行話題趨勢和社群結構，以數據結論證實了不同高校大學生社群的多樣性。¹² 研究團隊選擇的 2006 至 2012 年時間段對應了教育部實名制管理大學 BBS 的新政策時期，排除了更早的 BBS 社群形成期。同時，該量化研究的結論較為倉促和表面化，並沒有與早期互聯網社群的文獻展開對話。而本文對於千禧年前後的校園 BBS 用戶的考察可以提供不同歷史階段下的網路社群案例。許多研究網路社群的著作都變通性地使用了「想像的共同體」作為理論框架分析建構過程。¹³ 另一部分研究熱衷於探討都市化工業化的背景下早期綫上社群對小鎮社群的懷舊。¹⁴ 處於新舊媒介過渡期的中國早期校園 BBS 社群建構方式顯示它並不是想像而成，也不是對現實的逃避。這一案例研究，利於探討新技術條件下綫上綫下交互的不同模式，進一步打破對網路社群的固有觀念。

北大在早期最有影響力的兩大 BBS 站點是未名（bbs.pku.edu.cn）和一塌糊塗。在官方敘事中，未名 BBS 始建於 2000 年 5 月，是北大規模學生自主運營最大、最久的校內資訊交流平臺。¹⁵

6. 吳世文、楊國斌，〈「我是網民」：網絡自傳、生命故事與互聯網歷史〉，《國際新聞界》，卷 41 期 9（2019），頁 35-59。吳世文等，《網事綿延：社會記憶視角下的中國互聯網歷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7. Kevin Driscoll, *The Modem World: A Prehistory of Social Me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8. Yongming Zhou,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Liwen Jin, "Chinese Online BBS Sphere: What BBS has Brought to China," (M.A. Thesis, Program in Comparative Media Studi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8).

10. Guobin Yang,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 Ya-Wen Lei, *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 Hao-Nan Yang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d popularity of BBS in four Chinese universities," *PLoS ONE*, 15:6 (2020).

1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Amit ed., *Realizing Community: Concept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enti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20. Aris Mousoutzanis and Daniel Riha ed., *New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Online Communities* (Oxford: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010).

14. Steve Jones ed.,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ty and Technolog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15. 青年研究中心，〈校領導接見未名 BBS 管理團隊〉，北京大學新聞網，2013 年 1 月 25 日。網址：<https://news.pku.edu.cn/xwzh/129-264109.htm>

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與一塌糊塗迅速走向公眾不同，未名更偏向校園社群。2005 年，因為教育部加強對高校網路內容的控制，未名 BBS 被官方收編。站長從民選學生改為校長，全站實名制並接受學校主管部門的審查。在自由生長的最初幾年間，未名 BBS 與同時段的知名高校 BBS 如水木清華等互相交流技術，共創和共用了以校園生活為中心的版聚版聊十大話題等等 BBS 文化。未名 BBS 可以為早期高校 BBS 研究和網路社群研究提供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視角。

論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探討新的網路技術和基建如何塑造高校學生的媒介使用習慣，追溯北大的 BBS 用戶從 1990 年代到 2000 年後逐漸社交化的轉變。第二節介紹未名 BBS 早期社群的形成和樣貌。第三節圍繞該社群線上線下緊密相連的重要特徵，探討類熟人社交與新媒介形式孕育出怎樣的新舊交織的網路社群。

本文使用了現代口述史的訪談方法，以歷史當事人和技術體驗者的回憶為基礎，分析新的網路技術和媒介形態對個體和社群文化的影響。不同於處理客觀數據的量化研究，口述史的方法更偏向以個體為中心的記憶挖掘和講述呈現。它適合於探索量化和文本類史料分析中，難以捕捉到的技術使用體驗和社群的情感連接等面向。訪談覆蓋的時間段為 1994 年北大 BBS 草創至 2005 年高校 BBS 被教育部收編，但研究重點落在從 1999 年寢室通網到 2003 年用戶感知到外部管控的四年之間。¹⁶ 受訪人選擇在 1992 到 2005 年間入學的北大校內 BBS 使用者和觀察者，以滾雪球的方式搜集用戶樣本，並盡可能覆蓋到多樣的使用習慣、網路身份和學科背景。

基於吉登斯等人對現代社會反身性的思考和現代口述史的轉向，訪談不再嚴格區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界限。在訪談中，採訪者的身份會影響到回憶話題的展開和資訊的提取，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被採訪者對社群生活和校園生活的追憶。因此，作為北大中文系 2000 級校友的訪談人深度參與口述史的編織，受訪者對採訪者身份的認同也避免了受訪者的意義闡釋發生走樣的霍桑效應。因為提取 20 多年前的回憶有較大的困難，訪談採用鬆散的半結構訪談。採訪人詢問用戶體驗和觀察到的 BBS 使用行為，看到或者參與的討論，BBS 相關的社交經驗，BBS 對他們的意義和更廣泛的校園文化等等。訪談時間從 30 分鐘到一小時不等。按受訪人的隱私保護需求和現實社交場景，使用一對一單獨訪談或三四人一組群訪的方式。

受訪人	性別	院系和級別	使用頻率	使用時間	訪談場景	備註
Y	男	2000 數學	高	2000-2004	綫下	
F	男	1998 數學	從不	無	綫下	室友是管理者
Z	男	1998 數學	普通	1998-2005	綫下	
S	男	1999 數學	低	1999-2003	綫下	
W	女	2001 信息管理	高	2001-2004	綫下	系版版主
X	女	2000 天體物理	高	2000-2003	綫下	研究生
D	男	1992 物理	高	1994-1996	綫下	
J	男	1998 政管	低	1999-2003	綫下	青年研究中心
G	男	1998 國關	高	1999- ?	綫上	
Q	女	2000 中文	高	2000-2004	綫下	

注：使用頻率僅能反映受訪人的自我判斷。

三．新技術的日常化

最早的 BBS 用戶都是互聯網技術的探索者。北大 BBS 也經歷過一個山頭林立的草創階段。由於互聯網世界聯通便利，從香港、臺灣高校傳來的低成本 BBS 搭建技術和使用方式對當時的內陸大學生有很強的吸引力。1990 年代末，私人電腦進入宿舍。少數對數碼技術感興趣並擁有很強動手能力的大學生，學習海外經驗，用簡陋的設備自主探索搭建遠程登陸系統。校園內出現了各類實驗性的小型 BBS。最前沿的科技知識都是最先在 BBS 上傳播。

F：我們有個同學，大一還是大二的時候，在我們寢室建局域網的 BBS。當時我們周邊幾個宿舍，大概四五個宿舍，他搞了幾根綫，就物理的綫直接連到了一起，他自己搭建了一個 BBS。小 BBS 存在了可能不到一個月，我估計他就是練練手把這個系統架起來。

BBS 技術給管理員很大的設計自由度。用戶和管理員一步步把想像中的賽博空間具象化成一個個不同的版，在版內又設立各自的規則和內容體系。

F：同寢室的同學叫 Cliff。Cliff 當時是一塌糊塗的副站長，是有這麼個職位是吧？他有權力審批版。他自己偷偷搞了個小號，申請了一個版，自己批了。他用那個小號用了一天，那一天版就巨爆。

全站的管理團隊有權創建和批准新的板塊。F 提到室友突發奇想建立的就是當年相當先鋒的人之初（sex）版。BBS 板塊的設立多少受到美國新聞組的影響，也同時受制於早期高校 BBS 核心用戶們自身的興趣喜好，反映他們對於社群話題邊界的探索和對網路世界的最初想像。

以獲取資訊為目的的流覽，是 1990 年代用戶使用 BBS 的主要方式。1999 年前，北大學生上網需要去未名湖北面的電腦中心機房，機房每小時收費一塊五，普通學生無法負擔長時間上網

的經濟成本。由於機房容量有限，上網還需要經歷漫長的排隊等待。因此當時學生的上網習慣是提前統籌，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必要任務，搜集盡可能多的資訊。兩位 1990 年代的校園 BBS 使用者在陳述 1994 至 1998 年經驗時，只提及獲取的站內資訊。1992 級的用戶 A 自述從 1994 年開始流覽陽光創意 BBS，主要動機是學習。¹⁷ 他經常訪問科學版獲取物理、化學的研究資料，去技術版學習互聯網知識，還在小說版下載武俠小說後列印閱讀。1998 級用戶 Z 剛接觸 BBS 時受到好奇心的驅使，習慣快速地觀光水木清華，科大的瀚海星雲，臺灣的批踢踢。「也不是太投入，主要就逛逛。」流覽多，互動少，歸屬感弱等等因素都可以證實早期 BBS 的資訊工具屬性，用戶延續了印刷媒介時代的個人閱讀習慣。

技術設備的可獲得性影響了 BBS 的使用方式，成為從資訊獲取轉向日常社交的決定性條件。北大在 2000 年前後發生了兩件改變設施的重要事件。一是 1999 年昌平校區的文科生回燕園，文科生開始瞭解並使用 BBS。二是 2000 年宿舍通網改變了多年來的機房排隊上網模式，宿舍內的電腦共用和對新技術知識的口口相傳，使得 BBS 長時間使用者急劇增加。受訪者開始頻繁地用「灌水」，「掛著」等顯示社交性和歸屬感的辭彙來描述 BBS 經歷。不少受訪者指出使用 BBS 成為校園生活的一部分，沒有明確目的性了。

💬 X：什麼版都上。空餘時間就在 BBS 上掛著。刷一刷，聊一兩句。我一般都在實驗室的電腦上做課題，Telnet 都開在背景，上 BBS 的時間與工作時長等長。

Q：一般上 BBS 是晚上，上課回來。每天都會上去看一眼。

J：我都是晚上登錄。晚自習後，睡覺之前，密集灌水。

灌水是伴隨著 BBS 日常化而出現的網路名詞，它指代一種沒有資訊價值的發帖行為，但具有強烈的社交屬性，提供陪伴和支持等等的情感價值。不停重申自己不常用 BBS 的 J 也承認經

常「密集灌水」。灌水的使用習慣就表明站內用戶之間建立了情感聯結。

BBS 技術塑造了新的社交模式，從而塑造新的群體社會關係。灌水特指群體可見、群體參與的多對多發帖交流行為。BBS 用戶都表示在站內極少用私信，如果私聊，會轉移到其他點對點通信軟體。BBS 技術讓交互不受綫下時空限制。任意用戶可以隨時隨地加入，就增加了參與者的數量，增加了不同觀點和表達方式的可見性。在宿舍休閒聊天的上網環境會增加輸入內容的隨意感，交流並不需要謹慎思考。非面對面的延時溝通，讓用戶更為自在地展現出個體的其他面向。在晚間時分，登錄用戶量大的時間段，資訊會被不斷流入的新發言與回覆沖淡，「灌水」的「灌」即出自於此。灌水不在於放大自己的聲音被聽到，而是在於共同參與這種流動的共在過程。

當然，新技術必然會挑戰用戶在印刷媒介環境下培養的使用習慣。BBS 並不是一面世就受到廣泛歡迎。與後來通行的視覺化流覽器不同，早期 BBS 依賴 telnet 的遠程登陸方式。校內用戶需要從校園網 ftp 下載 fterm 或 cterm 軟體安裝在電腦端，運行程式後在命令欄輸入指令。一般需要輸入遠程伺服器的 ip 地址，用戶名和密碼才能登錄到伺服器，看到在黑色背景上用文字和符號組成的簡單進站畫面。部分學生認為 telnet 操作介面不友好，因而抗拒使用校園 BBS。

💬 S：操作太複雜了，所以不太用。後來有了網頁版的未名 bbs，才更多地去看。我會上大眾的遊戲和文學論壇。校園 BBS 又不是唯一的選擇，外面的論壇做得更簡單方便。另外，一塌糊塗的字太大了，一個頁面就顯示幾行，不方便。

16. 這一時間段正好對應未名 BBS 從 1999 測試建站到規模擴大的歷史時間段。

17. 據用戶回憶，陽光創意是北大最早的 BBS，因為組織保釣運動被封。

四．塑造一個 BBS 社群

Rheingold 最早將線上社群定義為一種網路上的社會聚集，由於人們長時間進行公共討論而產生了情感，從而發展出人際關係網來。¹⁸ 30 年來社群的學術定義都圍繞著社會關係和情感價值認同展開。以鮑曼為代表的學者在社群的定義中強調友誼、信任和歸屬感等情感維度，¹⁹ 另一些學者從社會連接和社交性著手去理清社群的邊界。²⁰ 近年來的粉絲社群研究更傾向於將社群視作一種文化，認同和參與性行動模式。²¹ 本研究結合之前的網路社群研究和社會學中用於比較研究的社群定義，簡化出幾個互相關聯的重要因素作為評估未名 BBS 是否形成社群的標準：共同場所、共用的儀式或者資訊，社會性連接，成員的認同感和歸屬感。²²

未名 BBS 的專業版、社團版和興趣版滙聚起一群較為固定的用戶頻繁交流，也分化出多個社交小圈子，但各版互相滲透沒有任何排他性。W 在未名 BBS 擔任過信管系系版的版主。她認為系版就是她北大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她認識系內外同學，與同系同學維持感情的重要管道。版聚版聊等活動也是以系版核心成員為主體。

💬 W: 當時我們大概有 10 多個人是最活躍的，是跨年級的，然後有的時候還會一起吃個燒烤什麼的，所以關係很好。系版對我們來說很重要，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日程，是學習跟生活的一個交流的地方，什麼八卦包括老師的八卦，什麼課程考試各種東西都在上面交流。

但不能因此就簡單地把 BBS 視作一個容納不同類型社群的開放性社會場域，它依然承托起一個整體性的社群。中文系的 Q 常去文學版，也參加夜跑版的活動。數學系的 S 除了系版也訪問詩詞版。因為學習、娛樂和交友的原因在不同版之間自由來去的用戶不在少數，邊界模糊的各版也共用版聊、版聚、搬運十大、衝十大等充滿儀式感的活動。



圖一：早期未名 BBS 的進站畫面截圖，截圖時間不可考。
圖像來自於百度百科公開的「北大未名 BBS」詞條。

用戶進站後的操作方式是回車再回車，跳過進站畫面，按鍵盤上下左右鍵進入版面閱讀帖子，回帖和開新帖的快捷鍵指令分別是 ctrl+r 和 ctrl+p。純文字界面的命令行和各類鍵盤指令都增加了操作繁瑣度。而讓用戶體驗不佳的另一個問題在於 telnet 的螢幕文字容量小。習慣了高速流覽印刷物的用戶，若要在 BBS 內攝入等量資訊就不得不頻繁按鍵翻頁。S 代表的保守派用戶認為，與機器交互的身體操作比起翻書的動作更耗費體力和精力，而流覽體驗遠大於交互和表達的需求。而即使是熱衷於灌水的受訪用戶也普遍表示，灌水雖然很愉快，但卻是浪費時間、精力的不恰當行為。Y 提到自己曾經因為想戒掉灌水的習慣而自殺過原 ID。對灌水的自省展示出處於世紀之交剛開始密集使用 BBS 的用戶們對於非資訊動機的矛盾和猶豫，隱含著對於新媒介帶來的新行為常態的道德擔憂。

從林林總總的小型 BBS 實驗到學生用戶聚集的線上空間，從資訊獲取到日常社交，這一未名 BBS 發展過程反映出新技術探索和新舊媒介交替的過渡期特點。技術條件和媒介使用習慣塑造出網路行為，新的日常化網路棲居逐漸滋養出群體認同和獨特的社群文化。

18.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ss. : Addison-Wesley Pub, 1993).

19. Zygmunt Bauman,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20. Vered Amit, "Reconceptualizing community," in Vered Amit ed., *Realizing Community: Concept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enti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20.

21. 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nathan Gray, Cornel Sandvoss and C. Lee Harrington ed.,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22. C. J. Calhoun, "Community: Toward a variable conceptualization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Social History*, 5(1980), pp. 105-129. Malcolm R. Parks, "Social Network Sites as Virtual Communities," in Zizi Papacharissi ed., *A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105-123.

五．非想像的共同體建構

「十大」可以被看作是 BBS 的表達可供性和校園文化所塑造的共同社群儀式。十大是指在某個時間點全站域回帖數點擊數評分數最高的十個帖子排名，在全站具有最高的可見性。不論綫上行為模式有多大差異，每位受訪人都提到了「十大」：「只記得十大相關了」、「最常看的還是十大」。比起現在社交媒體的熱搜榜，BBS 的十大更加民主和開放，每個版的熱門帖都有機會登上排名。由於寢室熄燈管理制度極大影響登站人數和站內活躍人數，在熄燈前後刷新的十大榜單，帖子以較少的數據就可登榜。用戶們會看準時機齊心協力把自己喜歡的內容頂上十大以獲得巨大的合作成就感，俗稱「衝十大」。不論是優秀長文還是搞笑整蠱，上過十大的帖子一定會成為版內或同圈子好友內部洋洋得意的事蹟，它承載著集體認同，也成為 BBS 回憶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校園文化與網路技術相結合而生產的不只是新的社群儀式，還有凝結社群價值的共同話語。F 回憶到 2000 年後一個熱度極高的鮮橙多帖。原帖描述圖書館裏的一個男生幫女生擰鮮橙多瓶蓋的小事。這一稀鬆平常的校園小事在當時引發了熱鬧的二次創作接龍。用戶從不同視角出發，創作了包括鮮橙多瓶子的視角，圖書館外大樹的視角等不同版本的敘事。「鮮橙多」一時間成為 BBS 站內指稱多視角或另一個視角的代名詞。「求鮮橙多」意指希望出現另一個視角的講述，補全事實真相。「禁止鮮橙多」表示不希望後續有多視角創作來借題發揮。圍繞鮮橙多的集體創作行為不只表現了 BBS 用戶極高參與度，鮮橙多被經典化後傳達出一個站內廣泛認同的價值：鼓勵多角度多元化的觀點表達。從更深一層看，崇尚表達和討論的校園文化是塑造未名 BBS 社群的條件之一。綫上公共空間三角地被拆除的 2000 年之後，受訪者認為 BBS 就是他們這一代的三角地，填補甚至擴展三角地的聚集、展示、討論的功能。

以上圍繞 BBS 的群體實踐表明，未名 BBS 社群文化是同時由外部電腦設備，BBS 的系統基建，崇尚表達的校園文化和集體生活的特點等各種因素互動而塑造的。在其他的高校 BBS 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社群文化。²³ 這些校園因素塑造了一個具有強大的在地基礎的早期共同體類型。

許多對於綫上社群的定義都會強調超越具體地理空間的虛擬性，但早期校園 BBS 並不是完全建立於虛擬空間的社群。之前學者對早期新聞組的研究也指出綫下的關係會成為綫上交往的語境，從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綫上社交的方式。²⁴ 綜合用戶個體經驗看，未名 BBS 的各種社群發展往往經歷了從綫下熟人-半熟人-熟人社交模式的轉變，其在地屬性和校園現實的人際關係成為連接用戶非常重要的因素。但 BBS 社群也不是對現實關係的簡單複製和虛擬化。本節探討未名 BBS 呈現出的綫上綫下緊密聯繫以及背後的原因。

受訪用戶均表明熟人帶領或者熟人社交，是開始使用 BBS 的重要原因。

Y：我常去 TV 版。因為我比較愛看 TVB 的劇。再一個就是因為我們的版主正好也是我們級的一個同學。

W：可能就是大一迎新，哪個師兄師姐當時好像是系版的版主，反正很活躍的一個人，就說你快來加入 BBS 到我們系版來聊天灌水。當時我不太懂，但是因為認識不少師兄師姐，他們都在系版上混，就註冊了 BBS 上系版。

師兄師姐或者寢室同學的介紹和影響就讓綫下的社交關係自然連接到了綫上。綫下向綫上遷徙的現象在早期論壇比較普遍。曾任天涯版主的羅新也提及，1999 年建關天版時版面比較沉寂，他除了動員綫上好友，還發展了很多生活中的朋友到網上。²⁵ 與天涯 BBS 這類從建立就對社會開放的論壇相比，校園熟人帶領讓未名 BBS 社群帶有原初的在地歸屬感，用戶得以快速建立認同感。L 回憶道：「與其他論壇相比，對未名 BBS 的認同感當然還是最高的。」W 也強調在未名 BBS 特有的心理安全感：「因為跟你交流的人你是見過。」BBS 在設置上是一個匿名社區，每個用戶發言顯示的是中英文 ID，有些用戶還有自己的小號。然而，基於熟人社交的未名 BBS，用戶身份在社群內呈現半透明的狀態。同學們能很快知道同寢室樓層、同系、同級同學的 ID 名。

23. 王喆，〈如果網路社會有鏡像宇宙〉，《澎湃新聞》，2019 年 8 月 9 日。網頁：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22754。

24. Nancy K. Baym,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community," in Steve Jones ed.,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ty and Technolog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p. 35-68.

25. 陳璐，〈西祠與天涯：BBS 論壇的版主往事〉，《三聯生活週刊》，期 21 (2022 年 5 月)，頁 66-71。

未名 BBS 強化了校園四通八達的熟人網，ID 與現實身份在不停地建立關聯。從熟人帶領進入網路論壇，在論壇上結識陌生人，通過熟人社交圈或不定期版聚瞭解新朋友的綫下身份，是很多用戶描述的 BBS 交友過程。在 BBS 的社交大都不會滿足於以 ID 身份的社交。

Y：比如說你跟某個人聊多了之後，你可能會打聽，慢慢去問別人就知道他是誰了，畢竟這個圈子還是很小的。後來版主還組織了版聚。版聚完了以後我問他，我說你是怎麼想到當版主，他說我就是為了能夠多認識一些美眉。

熱衷於綫下社交的用戶們最生動的回憶片段往往來自綫下版聚。版聚大多在學校附近吃飯唱歌，互相稱呼版內 ID，男生、女生、在校生、畢業生都會加入。很多人也提到在 BBS 上發帖尋找有過一面之緣的同學的成功經歷。另一個例子來自於用戶對 BBS 紅人芙蓉姐姐的回憶。在水木清華和北大未名上發照片而迅速走紅的芙蓉姐姐，經常在互聯網歷史敘事中被追憶為初代網紅。W 覺得芙蓉姐姐是當年觸手可及的生活的一部分：「03 年我不是見過她？我是清華見過的好像。反正這個人離我好像挺近。」L 也回憶道：「真人似乎來過我們附近的寢室，印象中和我們班同學還有點發展的苗頭。」似是而非的記憶傳達出綫上與現實模糊的邊界。圍繞著 BBS 的綫上綫下形成一個互相融合的真實世界。

如何理解 BBS 用戶在社群交往中對綫下身份的執著？Rheingold 推測早期互聯網用戶之所以熱衷於綫上社群是因為傳統型社群的瓦解，讓人們對社群生活更為渴求。²⁶ 而未名 BBS 社群對現實校園的依賴，來自於原有的校園交流模式發展到綫上的一種延申。早期綫上社群研究指出，如果構成網路社群的用戶都來自於同一個機構的成員或者同一個學校的學生，那麼原有的亞文化會極大影響到綫上傳播的樣態。綫下身份的聯結和共同的校園生活也能成為進一步交流的資源。²⁷ W 認為：「灌水也是尋找自己認識的人。」從這一角度分析，綫下社會關係為綫上社群的

發展和綫上社交的深入提供了語境。

另一方面，對綫下身份的執著也與新的媒介習慣形成中的掙扎有關。在新舊媒體的過渡期中，在外部社會對於網路世界不真實的指責下，新用戶在習得新習慣的過程中，會用舊有的經驗加強舒適感。即使是陌生 ID，在地歸屬感給予用戶非常強烈的同類人暗示。

Q：在 BBS 上認識一些師兄和網友。有時候會從帖子內容去分辨發帖人是否是在校學生，是北大的信任度就更高。BBS 夜跑版上叫一聲就可以跟不認識的網友一起去未名湖邊跑步。

不同於現在的網路用戶習慣了與不同種族、愛好、文化背景等人的交流，這是典型的傳統在地小社群的社交方式。可以與綫下現實互相比對的真實性依然是網路社交安全感獲得的主要來源，也能顯露出早期互聯網用戶對新媒介持有的保留態度。

但 BBS 社群的特殊性在於這並不是對綫下熟人社交的簡單搬運。匿名化的 BBS 並不能帶來百分之百的身份確認，只能提供一個模糊的包含在社群內的界定，用戶在意識中會傾向於認為其他用戶是從學校這一現實場域拓展延伸出去的一個雖然不確定但較為安全的類別。Appadurai 對在地的定義指向一種經驗上的社會生活，提供語境上的分類上的意義。²⁸ 未名 BBS 的在地屬性並不是完全貼合校園的物理場所，而是用戶依據經驗對群體的分類，在聊天的語境中達到某種共通。在這個意義上，BBS 社群已經走向了非現實存在的社會關係，即使沒有達到完全虛擬的狀態。

BBS 與現實生活的密切交融也不意味著對綫下權力關係的複製。站內部分板塊是校內組織的綫上投射，比如文學版的版主往往由當時的文學社社長擔任，社長更替會伴隨著版主權力的交接。但其他版，比如系版，其內部權力結構與綫下學生內部結構完全

26.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p. 62.

27. Baym, in Steve Jones ed., *Cybersociety 2.0: Revisi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ty and Technology*, pp. 35-68.

28.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s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178-200.

不同。據 W 回憶，BBS 系版內活躍的往往都不是在學校擔任要職的學生領袖。

💬 W：學生會的人也會偶爾來參與，就表示一下跟大家還挺熟的，也願意這樣。但是他不像我們真的就是水聊，他不怎麼參與這種純聊天，他會有一些正事，比如說他會發一些公告，比如系裏面的很官方的公告。回復一些官方的文章會比較多。

公告要求措辭的正式，資訊的準確，和發帖帳號的權威性。這是一種拒絕流動，拒絕參與的資訊發佈方式。綫下官方組織或者領導學生的帳號會小心翼翼地保護帳號的權威感，若是參與 BBS 站內群聊會被認作不正式行爲，從而損害官方的權威性。而站內群聊是建立情感連接和維繫社群關係的重要途徑，由此維繫的社會關係代表的是隨意、感性、不正式、排斥權威。一定程度上，BBS 社群文化將學校內的等級關係扁平化了。學生會「偶爾來參與」透露出願意融入社群的姿態，BBS 社群在學校裏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可與官方文化協商的力量。

與其他高校 BBS 類似，未名 BBS 最初是學生自我管理的產物。BBS 的站長和副站長可以審批版塊，各版主有刪帖和處理個人帳號的權力，而站長和版主通常由民選產生。據回憶，用戶擁有較大的內容留存權。即使站長刪帖，原帖內容依舊會保留在其他人的引用裏。2000 年後政府制定了針對大眾型論壇的管理規則，管控的基本理念是促進互聯網發展前提下避免負面影響。²⁹ 與此相比，未名 BBS 的內容審查更為寬鬆和柔化。負責監測的是學校團委下轄的青年研究中心，中心僱傭勤工儉學的研究生流覽和記錄重要的站內新聞，並上報團委。由於沒有直接的內容管理權限，上報內容又與學校生活相關，監測崗的學生們認為這是幫助學校搜集學生對於課程、食堂、道路交通等意見的工作。至少在 2003 年前，BBS 的自主管理和保持言論盡可能的開放自由，是從學校到學生默認的共同準則。

簡而言之，綫下校園的社會關係連接，和 BBS 作為學生用戶自主的空間生成的屬於自己的文化價值，這兩者之間互相作用，塑造了未名 BBS 的社群吸引力。這兩點從多數用戶離開的原因中可以獲得佐證。一部分用戶認為畢業脫離了綫下校園社會關係，也失去了使用 BBS 的理由。另一部分用戶是因為自主性被剝奪的幻滅感。發生在 2003 年的一塌糊塗伺服器事件和之後一塌糊塗被關站，讓用戶們意識到校園 BBS 並不是完全自由自主的空間。W 落寞地回憶道：「一塌糊塗被關了之後，大家覺得這事突然就不對了，就一瞬間大家就不想上了，因為意識到了某種破滅感。本來你覺得是個伊甸園或者樂園的地方。真的是有那種一個殿堂坍塌的感覺，泡沫被戳破了，然後你也不想再回去。」監測崗的同學也在同一時刻覺察到變化：「一塌糊塗伺服器失蹤事件發生後，團委老師說要往市或者教育部上報，我才意識到這個 BBS 監測的工作不那麼簡單。在慢慢收緊的氛圍中，本身 BBS 的活躍度和參與度也在下降。自身的隔閡和分裂也慢慢有了。」回憶是一個主觀的資訊提取和組織過程，校內用戶強調的社群體驗很大程度上是以情感和共同價值維繫的社會關係，是他們回憶中最閃亮的部分。這群人所緬懷的，是自由鮮活挑戰規則的青春歲月和相容並包言論自由的大學精神，反抗的是現在功利主義等級分明的現實世界。

²⁹ Zhou,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pp. 141-152.

六．總結

以北大未名 BBS 為代表的早期校園 BBS 社群的形成是新的技術、基建和校園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綫上綫下的鑲嵌，BBS 社群具有更強大的凝集力，在新舊媒體過渡的特殊時期，新媒介的用戶在傳統熟人社交的語境下，發展出對一個綫上社群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與此同時，綫上社群又以它的匿名性和社交性顛覆了綫下的等級結構，保證參與者獲得一個相對平等、自由自主的活動空間。這一現象體現了新的媒介形式正在舊結構的基礎上塑造新的傳播結構。

早期 BBS 並不是建立了一個區分於現實的異空間，而是提供了一個連接現實和虛擬的工具。它可以延續傳統在地小社群的歸屬感，又發展出新價值的新社會關係形態，從而延展出被一些用戶形容為伊甸園的新的可能性。BBS 技術讓網路空間中的用戶行為從資訊獲取走向了社交，在新舊媒體過渡期形成的網路社群大致符合經典的社會學社群定義。用戶在使用新媒介技術時點點滴滴表現出的抗拒、自我懷疑、熟人依賴，也正是早期互聯網技術擴散、新的媒介習慣養成中的衝突體現。

* 本文感謝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號：21YJC860025）的資助。

張璟，浙江傳媒學院，文化創意管理學院網絡與新媒體專業講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曾任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所（EHESS）中國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紐約城市大學經典與現代語言文學系兼職講師。獲評浙江省「錢江人才」。研究興趣涉及現代媒介與傳播史、現當代東亞文化、社群研究。

時空變形、斷裂和阻隔： 中國當代科幻中的 城市化與性別

Spatial and Temporal Transformation,
Rupture, and Separation:
Urbanization and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周旦雪
Zhou Danxue

摘要：

本文以中國當代三部科幻作品為例，探討科幻文本如何再現中國城市化進程，思考城市化議題的文學再現與性別書寫的關係。本研究試圖回答：當代中國科幻描繪城市化和性別形象有何特點？有哪些城市化的問題被再現和怎樣再現？不同性別形象的命運與城市化有何關聯？性別話語在再現城市化議題中起了什麼作用？本研究認為與階層、地域等不平等問題相交織的性別問題是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重要表徵，性別形象的塑造推助了城市化故事的講述，但對性別刻板書寫的質疑也非常必要。

關鍵詞：

中國科幻、城市化、性別

Abstract:

Taking three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ork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works of science fiction represen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gender narrativ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s portrayal of urbanization and of women? What issues of urbanization are addressed and how are they represented? How are the different images of gender related to urbanization? What is the role of gender discours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gender issues, which are intertwined with issues of inequality such as class and geography, are an important symptom of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ortrayal of gendered images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storytelling of urbanization, b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question gender stereotypes in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Urbanization, Gender

一．科幻中的空間和城市

科幻小說與城市密切相關，在美國城市史研究專家卡爾·阿博特（Carl Abbott）於 2016 年出版的《未來之城：科幻小說中的城市》（Imagining Urban Futures: Cities in Science Fiction and What We Might Learn From Them）中就推演了科幻作品中的城市社會關係。科幻小說並不僅僅是用各種手段毀滅城市，城市並未在科幻作品中消失，而是「以複雜和迷人的方式生長、壯大和衰落」¹。城市不僅僅是故事的背景和環境，且它們本身就是角色。卡爾在此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三段論：「科幻小說是關於未來的，人類未來是屬於城市的，因此，科幻小說應當是關於城市未來的。」² 瑪律克姆·S·佈雷德里（Malcolm Bradbury）曾指出，「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為文學提供了深刻的主題和觀點：在文學中，城市與其說是一個地點，不如說是一種隱喻」。³「文學書寫」是「梳理經驗、構想城市的重要方式」，與列斐伏爾提出的「作為社會性事實而存在的、由人們的想法孕育組建並因此具有想像維度的城市」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且對於中國來說，這一關係「尤為纏繞」。⁴ 不僅僅是西方科幻小說作家在其作品中探究城市，中國也湧現出了許多以城市為主題的科幻作品，正如劉維佳在小說集《大地的年輪：中國都市科幻小說佳作選》的序言中寫道：「在科幻人看來，未來人類的文學作品基本都是都市文學。」⁵ 出版於 2023 年的《解鎖未來：當代中國科幻小說中的城市想象》作為首部聚焦當代中國城市和想象力之間關係的專著，填補了研究的空白。作者羅小茗將「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圍繞城市展開的想象性書寫」視為「凸顯中國當代想象力的標本」，⁶ 並由這一判斷為基礎展開討論和分析。

提及科幻，人們往往聯想到宏大敘事的太空歌劇，或者涉及嚴肅科學推理和技術想像的「硬科幻」，而涉及社會現實思考 and 人性關懷的「軟科幻」很容易被忽略。一些讀者認為科幻小說應該討論未來、未知、可能性，而非那些熟悉、已知。著名科幻學者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指出，科幻利用陌生化的手法，製造間離效果，運用「認知陌生化」⁷ 去探討現實問題，使得現代人真實的生存狀況在科幻文本中被展現。在美籍韓裔學者朱瑞

瑛（Seo-Young Chu）看來，科幻小說是一種高密度的現實主義，而「現實主義文學」只是一種低密度的科幻小說。⁸ 中國科幻與現實對話的傳統可以追溯至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1902），這部「作品既非單純地敘述『未來』，亦非僅僅評論『現在』，而是在兩者之間往復運動」。⁹《科幻世界》雜誌主編姚海軍曾說：「面對現實，因為有太多禁忌問題，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反而在逃避，這是現實主義的遺憾。科幻應該關心現實。」¹⁰ 中國科幻作家陳楸帆也認為，科幻也許是當今最重要的文類。作為重要概念被提出並發展的「科幻現實主義」是本文一係列討論的基礎。與主流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相比，「科幻現實主義」所建構和展現的似乎是一種「超現實」，¹¹ 但其實用虛擬空間的形式探索現實世界。¹² 科幻現實主義被置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之中，可以「體現出中國科幻的獨特性」，因為其「紮根於迅猛發展的中國現實土壤之中，通常以現實或近未來為背景，探討在科技的影響下現實社會的諸多變化，或是中國未來的可能性及人的變化」。¹³「空間」的豐富性是科幻探索的重要內容，借助「科幻現實主義」的視角，我們看到其實科幻小說可以成為反觀城市變遷和現代性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自二十世紀末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發生「空間轉向」以來，空間思想被廣泛地運用於文學地理學研究中。空間是一個複雜的、多元話語建構的社會活動發生場所。¹⁴ 在文藝作品中，空間被認為絕不僅僅只是一種空洞容器，而是體現出政治性和矛盾性，與社會的生產關係連在一起，是一種充斥著意識形態的表現。¹⁵「空間既擁有了獨立的文化形象，又成為諸多意識形態交鋒的載體和鏡像，是科幻小說值得深耕的沃土。」¹⁶ 因此，展示在不同視角差異中空間的不同面貌成為科幻小說的獨特效力，科幻中對現實以及對城市時空的重構和變形，給分析城市書寫或敘事提供了一種新的路徑。一方面，現代城市生活可以成為科幻小說的重要語境；另一方面，科幻以獨特的方式審視、思考和想像人與城市、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充滿中國元素的城市空間可以成為中國科幻敘事的物質場所，而作品中不同空間的切割、對峙和融合也可

1. 卡爾·阿博特 (Carl Abbott) 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全球城市發展戰略研究創新團隊譯《未來之城：科幻小說中的城市》（*Imagining Urban Futures: Cities in Science Fiction and What We Might Learn From The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頁 2。

2. 卡爾·阿博特，《未來之城：科幻小說中的城市》，頁 3。

3. 瑪律克姆·S·佈雷德里 (Malcolm Bradbury) 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譯，《現代主義》（Modernis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頁 77。

4. 羅小茗，〈被切割的城市：當代中國科幻的城市想像〉，《探索與爭鳴》，期 3（2019），頁 127。

5. 劉維佳《大地的年輪：中國都市科幻小說佳作選》（北京：新星出版社，2023），頁 1。

6. 羅小茗，〈解鎖未來：當代中國科幻小說中的城市想象〉（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3），頁 26。

7. 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4.

8. Seo-Young Chu, *Do Metaphors Dream of Literal Sleep? A Science-Fiction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7.

9. 賈立元，〈向著“未來”前進——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新解〉，《文藝理論研究》，卷 36 期 4（2016），頁 69。

10. 陳楸帆，〈對「科幻現實主義」的再思考〉，《名作欣賞》，卷 28（2018），頁 39。

11. 陳楸帆，〈「超真實」時代的科幻文學創作〉，《中國比較文學》，期 2（2020），頁 36。

12. 任冬梅，〈從科幻現實主義角度解讀《北京摺疊》〉，《南方文壇》，期 6（2016），頁 47。

13. 彭超，〈論科幻現實主義創作特徵〉，《中國文學批評》，期 3（2022），頁 78。

14. 陳家熙、翁時秀、彭華，〈打工文學中的城市空間書寫——基於索亞「第三空間」的分析〉，《熱帶地理》，卷 38 期 5（2018），頁 630。

15. 陳舒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空間想像〉，《社會科學》，期 3（2021），頁 185。

16. 陳舒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空間想像〉，頁 185。

17. 宋明燁,《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頁 97。

18. 楊慶祥,〈作為歷史、現實和方法的科幻文學－序「青·科幻」叢書〉,收入《后人類時代》(北京:作家出版,2018),頁 7。

19. 宋明燁,《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字》,頁 97。

20. 羅小茗,〈被切割的城市: 當代中國科幻的城市想像〉,頁 131。

以變作反射現實的多元稜鏡。這種獨特的文本功能說明了科幻與「可見的」或「主流的秩序」之間的潛在衝突,有學者曾指出這種與「中心」對抗或相爭的姿態暗示了科幻小說絕不是一個邊緣化的文類。¹⁷ 正如楊慶祥指出,「21 世紀的中國科幻文學提供了一種方法論」,它不能被簡單的歸類為一種類型文學,而更應該被視為一種肩負了各種問題的「普遍的體裁」。¹⁸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代中國科幻作品中涉及到的社會問題是現代化、城市化背景下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而科幻文學「反傳統」、「先鋒性」和「顛覆性」的文類性質又可以帶來文本活力,¹⁹是對城市書寫的中國式創新,也是對主流文學作品中同質化、模式化的城市書寫的挑戰。在虛幻的時空架構中,科幻作品所提供的從科技維度對現實的思考、以宇宙的視野來審視人類社會發展的走向,是對主流文學的補充,也是試圖打破科幻與主流文學界限的努力。在科幻小說中,各種技術的融合進一步打破了物質－精神的二維向度空間。有學者認為,中國科幻用一種具體而特殊的方式完成對城市的書寫和想像,「這一方式既包含了人們對被高度分割的城市空間及其隱含的社會不公的不滿,也反映出城市中人因無力打破當前困境而產生的順從與自我辯解」。²⁰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直對城鄉問題保持高度敏感,對城市化過程有著清晰的表達。有學者指出城市化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進程之快,已然超乎想像,但高速發展帶來的多重問題往往被忽視。很多中國當代科幻作家的作品都涉及了城市化及其帶來的問題、矛盾、衝突。劉洋的《單孔衍射》講述一個中國城市對發展速度的重視以及空間上的嚴格區劃,通過對「公平」的強調,反映出資源分配的不公平;楊平的《山民紀事》中對空間的顛倒和重置:高樓大廈象徵落後,自然風光標誌繁華,這種改寫並未消除貧富、城鄉差異,而是將不平等在新空間中進一步落實和強化。與地域、階層差異相交織的性別不平等問題,也被很多作品所涉及。吳楚的《幸福的尤剛》以城市化為背景,探討科技與城鄉差異的關係,前沿的基因編輯技術「入侵」中國西北農村,打破鄉村原有的生活秩序,但又強化了性別不平等;郝景芳的《北京摺疊》里,婚

戀情節和男性氣質受挫,是城市化加劇的階層不平等的鮮明表現;韓松《地鐵》系列裏,未來城市烏托邦的形象以迷失的男性主體和恐怖的女性他者的形象表達出來等等。這些作品都為科幻提供了現實意蘊。

在城市化和性別主題的書寫中,當代中國科幻中有三個已經得到外譯的作品十分有討論的價值,它們是郝景芳的《北京摺疊》(2014),陳楸帆的《沙嘴之花》(2012),以及萬象峰年的《霧中襲來的遠方》(2019)。三部作品都發表於 2012 年之後,發表時間跨度長達七年,與「新型城鎮化」政策的出臺和深入推進時間相吻合,作品中展現出逐漸強化的人文關懷耐人尋味。2011 年中國城鎮化進程放緩,2012 年十八大提出城鎮化由數量型向高品質型轉變。²¹ 三個故事都發生在近未來,與展現「中國崛起」的宏大敘事不同,這三部作品反映了快速城市化、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作品中的主要女性角色代表了不同的女性社會群體:來自中上層階層的「依言」、城中村中的性工作者「雪蓮」、返鄉打工妹「顧慧蘭」。三部作品中也刻畫了不同背景、身份地位的男性形象,但女性角色在作品中對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透過她們的故事可以反映出城市化進程中更深層次的社會、生命問題。女性的故事為表達對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和經濟變革的矛盾反應提供了載體,「在 2000 年代後的中國科幻小說中,在技術進步和社會政治變革中,可以以獨特的方式聽到來自邊緣階層的下層女性的聲音」。²² 耶魯大學的石靜遠教授在小說集《春天來臨的方式》的〈代後記:性別構建與中國科幻的未來〉中寫道:「當代中國科幻小說催生了諸多關於性別議題的討論,其棘手程度不亞於其他任何一個文學類別。」²³ 正如宋明燁指出的:「女性在科幻中的地位並不能視而不見,很可能蘊藏著一種顛覆性的力量」。²⁴ 英國地理學家朵琳·瑪西(Doreen Massey)指出,空間和地點是性別化的,是通過城市空間與居住在其中的主體之間動態的、文化上和歷史上特定的相互關係來維持的,「空間和地點的性別化既反映了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中性別的構建和理解方式,也對其產生了影響」。²⁵ 布萊

21. 高志剛、任嚴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鎮化建設的歷程和經驗〉,《理論視野》,期 7(2022) 頁 13。

22. Zhou Danxue and Liu Xi, "Counter-Discourses to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Urban Modernity: Subaltern Women in Post-2000s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30:2 (2024), p.68.

23. 石靜遠〈代後記:性別構建與中國科幻的未來〉,收入《春天來臨的方式》(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頁 368。

24. 宋明燁,〈科幻的性別問題——超越二項性的詩學想象力〉,《上海文學》期 5 (2022),頁 127。

25. Doreen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187.

二．三部當代科幻的城市化書寫

恩·阿特貝里（Brain Attbery）认为科幻小說是研究性別觀念的有用工具，同時，性別也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讓我們了解滲透在科幻小說中的一些信息。²⁶ 現代性和城市化帶來的社會階層分化，對城鄉不同社會群體的影響在對不同人物的生存狀態描摹中表現出來。

本文將以這三部科幻作品為例，討論其中對城市化及性別形象的書寫，思考當前城市發展模式中城市與人的關係。研究回答以下問題：小說中所呈現的城鄉居民與城市化的關係是什麼？城市化帶來的新的生活方式、個體選擇、家庭關係是怎樣的？性別書寫作為一種特別的文化話語在文本中的功能是什麼？科幻小說是探討「可能性」的文體，設定在陌生的時空，探討社會現實的發展方向，科幻這個獨特文體在城市化議題上的貢獻有哪些？本文將在文本分析中聚焦「人」本身、關注城市化語境下的個體命運、特別是城市化帶來的普通人生活狀態的變化。

城市化不僅是空間領域的改變，也意味著意識形態領域的變化。城鄉衝突不僅是物質上的，更是觀念上的。在這個意義上，被城市化了的不僅僅是物質空間或是地理空間，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行為、社會關係模式被改變，最終影響人的自我意識。戴錦華曾在題為「空間與階級的魔方」的講座中指出，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土地的流轉，以及「城鄉一體化」的推動，中國的無地農民在城市的底層中成為一種「多餘」。²⁷ 這些喪失了土地、故鄉，無家可歸的民眾如果不被城市的發展所消化和吸納，將會成為「整個社會結構、生產結構的棄民」，真正成為「一種外部、一種底層、一種異己、一種非人」。²⁸ 本文分析探討的三部科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現實的鏡像，對現實進行了再現和批判，並都以非傳統的形式和大膽的想像深入再現了中國的城市化問題。

郝景芳的《北京摺疊》是繼《三體》后引發世界關注，並再次獲得科幻文學界的最高獎「雨果獎」的作品。在獲得巨大的關注的同時，這部關乎城市、現代化、發展的作品也遭受了諸多質疑，曾被認為「太現實、不科幻」，是以「科幻之名」披著未來外衣的「現實北京」，但這部科幻其實是對現實生活的精確提取和誇張展示。有學者認為，《北京摺疊》中體現了三種城市焦慮——技術焦慮、階層焦慮、價值焦慮。²⁹ 在城市化進程中，「異質性的階層被以時空的模式區隔開，獨立生活，互不干涉。通過虛擬的空間想像，充滿科技感的摺疊景觀被呈現，城市化進程中的矛盾衝突被銳化。城市一步步擠壓農村的生活空間，並對資源進行一輪又一輪的再分配，其結果便是社會底層的日益邊緣化，成為城市中看不見的陰影」。³⁰ 小說中最大的隱喻就是「北京摺疊」，六環內的城市被分為三層空間，「時間經過了精心規劃和最優分配，小心翼翼隔離，五百萬人享用二十四小時，七千五百萬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時」。³¹ 技術的發展使得城市得以擴張，也能夠將不同階級進行分類。除了「摺疊」——城市的翻轉重組之外，小說中其他的場景充滿著日常性、煙火氣，細緻的日常生活與冷峻的空間想像融合，使得故事更具真實感。

27. 戴錦華，《空間與階級的魔方》，豆瓣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2463171/>.[2016-10-29]。

28. 戴錦華，《空間與階級的魔方》。

29. 謝欣然，〈從《北京摺疊》看當下的城市焦慮〉，《漢字文化》，期 15 (2019)，頁 169。

30. 林萌，〈科幻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從《北京摺疊》談起〉，《關東學刊》，期 12 (2016)，頁 41。

31. 郝景芳，《孤獨深處》（江蘇：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9。

26. Brain Attbery, *Decoding Gender in Science Fiction* (Routledge, 2014), p.1.

空間隱喻在這部作品中發揮很重要的建構作用，小說中「人與城」的複雜關係通過「北京摺疊」的這一過程得以具象而清晰地呈現。在這一「摺疊」過程中，城市規劃者和設計者的意圖有所體現，空間生產的意識形態性被揭示出來。通過空間的隔離和劃分、時間分配的差異，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嚴重的階層固化和差異得以體現。通過壓縮第三空間的生活時間和空間，第一和第二空間的居民可以體驗到更高的生活質量。第三空間的人口密度最高，建築物很擁擠、到處都是廉價的商店和快餐店、人們的生活環境充滿著垃圾，所有這些都旨在以最低的成本滿足第三空間居民的基本生理需求。第二空間的街道是第三空間的兩倍寬，「樓並不高，比第三空間矮很多」。³² 第一空間呈現出獨特的城市環境，其特點是沒有高聳、密集的摩天大樓，以低密度的花園別墅和公園為特色，營造出鬱鬱蔥蔥、充滿活力的氛圍。第三空間的居民被迫在睡眠中經歷衰老的過程。在四十八小時的周期中，第三空間的居民只有八個小時處於清醒狀態，其中有五到六個小時用於工作，幾乎沒有時間從事其他活動。第三空間的垃圾工人們被異化，被當作物品而不是社會創造的積極參與者。在第三空間發生的事件與其他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完全不同，第三空間中的居民被視為影響市容市貌的存在，他們只能被與他們共享同一空間的人看到。在「折疊城五十年」慶典中，老刀發現廢品回收行業可以由機器高效地運作。第三空間與其他兩個空間之間缺乏交易關係，無法對北京的 GDP 做出任何經濟貢獻，因而被邊緣化並被排除在整個社會市場之外，第三空間的居民都是在通貨膨脹的經濟體之外的棄民。³³ 第三空間是隱藏的、被遺忘的，被遺棄的，其中的居民是那些「多餘」的人。³⁴ 從表面來看，作品中的三個彼此隔絕、等級森嚴的空間被用來對應三個階層——底層社會（底層勞動者），白領階層（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社會精英和當權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三個空間其實也與城市化進程的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相對應，類似烏托邦的摺疊城市通過斷裂時間，達到時空並置的效果，是城市發展歷史進程的空間隱喻。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性別關係也更具複雜性和流動性，小說的敘事綫索正是一個愛情故事。對這部作品的分析近年來大量湧現，但多集中於對社會分層和區隔的分析，關注城

市發展過程中的不均衡、不平等，而其中的性別話語特別是對秦天、依言、吳聞之間的愛情悲劇的再現被忽視了。

陳楸帆的科幻作品常常聚焦經濟和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以「揭示了現實社會的某些真相」和「現代人的真實生存處境」著稱。³⁵ 他的短篇科幻小說《沙嘴之花》曾入圍「第三屆科幻奇幻翻譯獎最佳短篇獎」，以獨特的視角向讀者展示了在城市化背景下近未來的深圳特區一位性工作者的生活。其代表作《荒潮》(2013) 的主題建構與背景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沙嘴之花》。《荒潮》中的敘事主體——陳開宗相比，《沙嘴之花》中的「我」與周遭的城市環境更像是統一體。陳開宗從小離開故土，作為芝加哥歷史學博士返鄉，在小說中他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對矽嶼進行審視。而「我」，在某種意義上是屬於城中村的，能用更適合的方式去再現城中村。深圳的城鎮化率接近 100%，是外來人口比例超過 90% 的全球最大移民城市，³⁶ 城市化的尺度和速度是衡量城市化發展的標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深圳是快速發展的城市的樣本。但「一座城市的本質，即城市的基本生活，並不在於構成城市的有形建築，而在於城市裏面容納的人」。³⁷ 生活在深圳的小人物被關注，他們的辛酸與挫敗和城市繁榮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沙嘴之花》中，城市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被從微觀以及個體的角度進行書寫，將現實糅合進科幻敘事中。城市化的本質是擴張城市空間，將空間用來做經濟生產從而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正如 1979 年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宣傳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所追求和推崇的發展理念，在陳楸帆的書寫中這種一味追求高速度的發展也被再現：「三天就能蓋一層。她說，真正的特區速度。」³⁸ 這座城市彷彿一隻行走的巨獸，城市裏的一切都是巨獸的器官，陳楸帆把以深圳速度建成的房屋比喻成「癌細胞」擴散，表達了對城市化的負面看法：「癌細胞般快速增殖的房屋如何形成今天的格局，在房間內永遠暗無天日，因為樓與樓之間只有『握手』的距離，道路如毛細血管般狹窄，走向毫無章法，一股腐敗的臭味瀰漫其中，滲透進每個人的毛孔。

32.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15。

33.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31。

34. Lyu Guangzhao, "Divide in Time and Spac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Wei Ma's 'Formerly Slow' and Hao Jingfang's 'Folding Beijing'," *Vector*, 294 (2021), p.38.

35. 高亞斌、王衛英，〈開拓科幻小說的現實主義新城——論陳楸帆及其科幻小說創作〉，《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4 (2015)，頁 60。

36. 王吉勇，〈共同城市：深圳移民城市的空間轉型與城市治理探索〉，《規劃師》，期 11 (2016)，頁 33。

37. 卡爾阿博特，〈未來之城：科幻小說中的城市〉，頁 37。

38. 陳楸帆，〈未來病史〉（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頁 25。

由於租金便宜，吸引了三教九流的外來人員棲身於此，艱難追求著他們的深圳夢，那個高科技、高薪水、高解析度、高級生活的高——深圳」。³⁹深圳特區成立之初曾經真實存在的區隔劃分——「二綫關」，隨著近年來對邊檢關口的拆除，已經被許多人遺忘。通過書寫關內和關外的邊界，人為界綫所帶來的一係列持續創傷及社會分層被再現：「被二綫關鐵絲網和九大檢查站隔開的，不僅僅是人流和車流，還有法律、福利、稅收優惠、基礎建設和身份認同」。⁴⁰「說起關外，深圳人的第一反應，便如同好萊塢西部片裏的荒漠，貧窮、落後、道路永遠在施工、闖紅燈不用罰款、罪案頻發且警力不足」。⁴¹「二綫關」並非城市化的遺物，地理上的阻隔導致了居民身份認同的缺乏及心理層面的隔閡，且這些影響仍在持續。城市化發展所加劇的不均衡和其他負面影響被披露，深圳的發展神話在小人物的苦難和妥協之上被堆砌。

這部賽博朋克風格的作品著力展現「三天蓋一層樓」高速發展的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另一面：城中村。沙嘴村雖然位於「關內」、深圳的中心城區中，但又與真正的城市生活相斷裂。只有跳脫出城鄉二元框架，城中村的價值才會被呈現，城中村並非快速城市化中的畸變。在深圳的城市空間中，有許多典型的城中村——這一城市和鄉村、過去和現在的複合體，有著高度的使用流動性，其獨立於現代大都市的「標準化、規範化空間」，擁有特定的時空價值。⁴²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城中村的價值，肯定了城中村為流動人口提供了就業門檻，解決了臨時工作問題，同時也最大程度的包容了這些特定人群。同時，作品再現了城中村這一城市化的產物帶來一係列問題，特別是低收入者的艱難生活以及日益普遍的貧富差距。在這一由外來貧窮移民（農村出身的「新市民」）組成的空間中，居住環境惡劣，暴力等社會問題泛濫。城中村中私人違章建造的居民樓安全隱患嚴重，建築密度高。陰影下不見天日的城中村成了城市高度發展、擴張的犧牲品。

《霧中襲來的遠方》的作者是本名為黎屹的「後新生代」科幻作家——「萬象峰年」，被收錄在《未來人不存在》⁴³這部囊括國際獲獎作品的科幻小說集中。萬象峰年的創作氣質十分獨特，

作品中常常體現出一種荒誕性，模糊現實和想像的界限，其作品中的世界與現實世界總保持一種恰到好處的距離。從萬象峰年的處女作——《城市，城市》開始，「城市」作為人類生存困境的一個空間意象存在，通過這個形式現代人的生存處境也在其中得以表徵。在對萬象峰年作品的分析中，高亞斌、王衛英認為幾乎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城市」都是被文明高度異化的「文化空間」。⁴⁴如果說前兩部作品都以大都市為背景，《霧中襲來的遠方》的背景和關注的是被城市化「拋棄」的鄉村，書寫的是被鄉村和城市同時「拋棄」的打工妹的故事，也描繪了城鄉兩種不同文化以及話語體系的衝撞。萬象峰年曾在「倫敦中國科幻協會」舉辦的研討會中指出，《霧中襲來的遠方》故事背景和目前的現實生活十分相似。「處於城鄉交融的過程之中」，在這一過程還未完成的過渡期「城市和鄉村的張力仍會存在，二者之間也會因此維持『互為遠方』的關係」。⁴⁵城市和鄉村互為他者，互相定義，互相映射。

萬象峰年的《霧中襲來的遠方中》體現出一種獨特的「鄉村（賽博）朋克」風格、包含許多超自然的科幻玄幻元素，有虛擬和現實的融合，村民被外星生物控制，開始被淘汰的荒蕪村莊。技術和傳統、本土和異域的對抗和融合都有所再現。某種程度上，這部作品與劉慈欣的《鄉村教師》十分相似，萬象峰年也站在宇宙文明的高度去俯瞰鄉村。故事中，如巨大竹節蟲般的外星未知生物光顧並改造了一個鄉村，但整個過程並非強制進行的，村民可以自願加入新的空間網路，不加入的村民仍在原有的空間生活，不同空間之間平行或重疊。渺小的個體與宏大的宇宙的雙重敘事在故事中相遇。故事表面看是村民生活空間的變化，實際上是價值取向和群體文化認同的差異。在外星生物的「說明」下，村民們在思維和精神層面實現了進化，他們塑造自己的文化，其他人不可以理解的文化。而「遠方」形容的也不僅僅是指地理空間的距離，它指的是話語或者語言的差異，即使處於一個空間，也無法理解交流，這成為對城市化過程中不同的價值認同和文化實踐的隱喻。空間和話語，或者說話語實踐與社會分層實踐之間的聯繫被重新審視。話語不僅僅是交流資訊或感情的手段，同時也

39. 陳楸帆，《未來病史》，頁 25。

40. 陳楸帆，《未來病史》，頁 29。

41. 陳楸帆，《未來病史》，頁 29。

42. 張宇星，〈城中村是來自未來的世界遺產〉，《城市環境設計》，期 1（2020），頁 277。

43.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收入《未來人不存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44. 高亞斌、王衛英，〈開拓科幻小說的現實主義新城——論陳楸帆及其科幻小說創作〉，頁 63。

45. 呂廣劍，〈〈霧中襲來的遠方〉：互為遠方的異托邦〉，科幻巴別塔，<https://mp.weixin.qq.com/s/UVQR0-2gcTen6dlilRjv2g>，[2020-09-04]。

是被社會性地建構和生產的符號系統。對於個體而言，「通過話語實踐成為權力關係的生產者」，通過話語操縱策略來構建自己的世界，標識自己類別化的社會位置。⁴⁶「話語」是一種權力的寄生物，是與社會實踐相重疊的語言系統，是一種社會關係。而在中國，長期封閉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形成了「市民與農民、大城市的人與小地方的人」在話語權力甚至技能上的不平等狀態。⁴⁷

這部作品中只有三個被賦予姓名的人物：母親顧慧蘭，女兒丹丹，和兒子慶天，除此之外還有村民、，以及只出現在通話中的顧慧蘭的丈夫。打工妹顧慧蘭從城市回到農村的故事被敘寫。故事的場景設置在農村，城市場景僅出現在主人公的回憶中。打工妹顧慧蘭的經歷反映了雖然表面上城市化使得大批人口集中到城市，但並未從根本上促使人們產生對城市的認同。在無法逆轉的城市化趨勢下，人們只是看似自覺地走向城市，但在城市生活中不斷地被邊緣化、疏離和漠視，這是許多外來務工人員所共同面對的身份認同焦慮，集中暴露了時代的「病」和「痛」。同時城市文化快速向鄉村延伸，鄉土文化被侵蝕。顧慧蘭融不進城市，也回不去鄉村。在城市流動中，農村女性的身份認同、與他人的關係都值得思考。顧慧蘭最終成為沒有趕上「進化」的落伍者、一個孤獨的異類、被遺忘的人，村子裏的其他人都變成了「淡藍色的影子」，不會對顧慧蘭有所回應。小說中的暗綫似乎是顧慧蘭和村民身份關係的對調：顧慧蘭丟下村子中的一切去城市打工、村民們跟隨外星生物去往太空。起初她堅定的離開村子，拋棄了村裏的一切，而最終她被村民們和兒女們所拋棄，乞求道：「別丟下我。你偶爾，偶爾回來一次吧。」⁴⁸她離開了村莊太久，無法被接納，她與其他村民不再一樣，似乎變成了兩個物種，「你不能加入我們。融合已經進行了太久，你失去了同步性。」⁴⁹城市對顧慧蘭來說是「另一個世界」，⁵⁰宇宙對於村民以及她的一雙兒女來說何嘗不是另一個世界？這似乎將城鄉差異並置於地球與外星文明的差異。通過這種敘述暗示了這種被拋棄無法通過個體的力量去改變，一種無力感充斥在字裏行間，「那個世界的入口在哪裏？她要找到它」。⁵¹顧慧蘭既無法擺脫原有的身份烙印，

又無法追趕發展的步伐。高速推進的城市化產生了情感和經濟的斷層，顧慧蘭所代表的正是被困在斷層里的人。作者用獨特的話語衝突的方式去表現打工妹被農村和城市雙重隔絕和異化：城市化帶來的不僅僅是地理空間、位置上的間隔，帶來的更嚴重的是思想觀念、思維邏輯的差異，導致人們無法再進行交流、溝通、產生共情。在這場社會流動過程中，隱藏在話語等文化資本表徵背後的是城市與鄉村兩個世界的分隔與對峙。借由科幻這種文類，《霧中襲來的遠方》得以將城鄉隔絕、權力關係具象化，又將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進一步抽象化。空間的差異引發了一係列變化，並會持續產生影響、推動新的權力架構形成。這個鄉村既是落後的孤島，又有更高維度的多種可能。

哈威曾提出一種「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辯證法」。他強調，資本企圖通過加速周轉時間來提高運轉的效率，而資本正是通過對地理景觀和城市空間的改造，來適應其高效運轉。⁵²無論是《北京摺疊》中的北京的城市規劃，《沙嘴之花》中深圳的區域間隔設計，還是《霧中襲來的遠方》中的城鄉隔絕，都體現了這一觀點。科幻這個文體獨特的優勢，使其可以用科技手段大膽地想像城市化中產生的諸如階級固化、貧富差距，以及鄉村發展停滯等問題。不論是《北京折疊》中的第三空間，《沙嘴之花》中的沙嘴村，亦或是《霧中襲來的遠方》中的無名鄉村，都是被高速城市化拋棄的空間，它們可以被視為城中村的變體，也代表了所有無法追趕城市化進程的社會空間。通過對空間的誇張變形，城市化的問題得以在科幻文本中形象化、具體化。同時，科幻體裁本身有助於討論技術發展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這一優點對相關社會議題的闡釋也起到了促進作用。在技術普遍服務於現代性和發展主義的語境中，人們開始質疑科技的性質和未來。科技既被懷疑為可以成為實施壓迫的工具，又被想像為實現解放的工具。《北京摺疊》中技術服務體現出權力和不平等；《沙嘴之花》中技術被想像成實現不同階級直接共情和團結的工具；在《霧中襲來的遠方》中，人類在蟲形外星生物的技術支援下，得到「進化」，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情感」。

46. 朱虹，〈打工妹的話語策略與城市適應〉，《南京大學學報》，期 4 (2008)，頁 133。

47. 朱虹，〈打工妹的話語策略與城市適應〉，頁 134。

48.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頁 84。

49.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頁 83。

50.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頁 78。

51.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頁 79。

52. David Harwa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books, 2006), p.25.

三．性別話語與城市化書寫

芮塔·菲爾斯基（Rita Felski）認為，「如果性別政治在塑造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那麼這些進程反過來又有助於啟動正在進行的對性別的重構和重新想像」，⁵³ 因此，她提醒我們去探討性別和現代性之間不同的表現形式。「正如性別是想像『現代性』的一個關鍵修辭一樣，它也是當代中國科幻小說中刻畫人性和『後人類』的一個重要的修辭手法。」⁵⁴ 科幻書寫中性別話語的特點和作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在科幻中，被忽略的邊緣社會群體包括底層女性形象，可以以獨特的方式被「看見」，如陳楸帆的代表作品《荒潮》。在以上這三部科幻作品中，我們發現性別形象的塑造對於城市化議題的再現非常重要，因為性別的平等和公正是我們考量城市化後果的視角之一。由於中國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中地區、階級和性別不平等交織在一起，因此女性的故事是「中國經濟全球化」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⁵⁵ 性別書寫往往被作為一種工具來說明引出關於城市化的討論，通過描寫男性氣質以及女性氣質的變化，來反映城市化對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產生不同的影響，特別是身份認同的差異。

（一）《北京摺疊》：被固化的階層和性別不平等

這部具有鮮明「科幻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呈現的是城市化背景下社會的橫斷面，根據城市居民不同階層，被製造出的不同的三層空間，實質上是施行權力的工具。小說里的北京是一座充滿隔絕的枷鎖城市，鎖住社會流動，也鎖住人們的思想觀念、固化性別觀念。通過人與城市的對峙衝突，小說再現和批判了城市化所帶來的空間生產不平等和階層分化等問題。階層固化在這部作品里被空間隔離的情節所隱喻，同時也被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和傳統的性別想像所表達出來，可以說，階級身份與性別身份在這部作品里彼此指涉和象徵。

「依言」這個女性形象成為對這個流動的摺疊城市的特殊表述方法，她像是一種敘事策略，是被慾望化和符號化的存在。對

於第二空間的追求者來說，來自第一空間的她是撲朔迷離的、不再是固定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得的。依言的上層女性形象及氣質被各個階層所嚮往，與中產階層的年輕實習生——秦天的男性氣質受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秦天追依言不成，無法打破階級的壁壘，但看似擁有地位、金錢、美貌的依言也無法按照自己的心意實現愛情婚姻的自由，仍然是能動性受到限制的女性。正如她的名字「依言」所暗示的，她別無選擇的只能順從。依言這個上層女性成為被凝視和物化的物件，秦天對依言的印象是「特溫柔，說話細聲細氣的」。⁵⁶ 他最喜歡的也是依言的嘴，「那麼小小的、瑩潤的，下嘴唇飽滿，帶著天然的粉紅色，讓人看著就忍不住想咬一口」；⁵⁷ 「她的唇很軟，他用手反復感受她腰和臀部的曲綫」。⁵⁸ 蘿拉·莫爾維（Laura Mulvey）曾經指出，「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女性作為形象，男性作為看的承擔者，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男性）、被動（女性）。起決定作用的是男人的目光，它塑造女性的形體。她們的外貌被編碼成強烈的視覺和色情的感染力，從而能夠把她們說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內涵」。⁵⁹ 依言完整的身體在秦天的凝視中被分解成碎片式的器官，這些碎片式的身體符號承載了男性的慾望。依言在同一階層的人眼中也沒有被看作是與男性平等的人，她被局限在婚戀中，是「半職太太」：「像她這樣的太太很多，半職工作也很多。中午她下了班，下午就會有另一個太太去做助理。」⁶⁰ 職場女性的家庭身份和責任始終被強調。對於同為上層階級的吳聞來說，門當戶對的依言是可以用來裝點門面，在外人面前塑造美滿家庭的符號。依言與吳聞之間並沒有愛情，但她又無力反抗：「其實我心裏是喜歡他（秦天）的，我也很矛盾」，「也許我有一天真的會有勇氣和他在一起呢」。⁶¹ 「男人（吳聞）摟住依言的腰，吻了她嘴唇一下。依言想躲，但沒躲開，顫抖了一下，手擋在身前顯得非常勉強。」⁶² 這個「躲」體現了依言在與吳聞的感情中的被動地位，她的感受被忽視。在與秦天的相處過程中，「躲」也出現過。「他（秦天）第一次輕吻她一下，她躲開，他又吻。最後她退無可退，就把眼睛閉上了，像任人宰割的囚犯。」⁶³ 由此可見，並非依言有意戲弄秦天，在與秦天的相處中，她也是一個被追逐的物件。對

53. Rita Felski. *The gender of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2.

54. 劉希，〈當代中國科幻中的科技、性別和「賽柏格」——以《荒潮》為例〉，《文學評論》，期 3 (2019)，頁 221。

55. Amy Dooling, "Representing dagongmei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11:1(2017), p.133.

56.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13。

57.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13。

58.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14。

59. 蘿拉·莫爾維 (Lura Mulvey) 著，〈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頁 21。

60.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21。

61.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21。

62.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18。

63.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14。

於秦天來說，追求第一空間的依言在某種層面上是對階級固化的反抗，也是證明自己能力的手段。這場跨越階層的感情最終失敗了。當依言道出自己的故事之後，老刀覺得幫她送信給秦天，就是「接受賄賂，將秦天出賣。雖然他和秦天並沒有任何結盟關係，但他覺得自己在背叛他」。⁶⁴ 性別規約、階層壁壘跟摺疊的三層空間一樣，最終無法被打破。

在這個作品中，通過性別想像和關係的塑造，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不平等，特別是階層固化的問題被鮮明地表達出來。來自底層的老刀希望養女糖糖「學會唱歌跳舞，成為一個淑女」，⁶⁵ 他認為：「女孩子應該安安靜靜坐著，讓裙子蓋住膝蓋，微微一笑露出好看的牙齒，輕聲說話，那樣才有人愛。」⁶⁶ 而不要像第三空間中的女孩蘭蘭和阿貝為了一點取暖費和收租的老太太爭吵。通過老刀對女性的看法和想像，無法跨越他所處的階級，他無法想像女性大膽勇敢，而是繼續尊崇傳統的性別觀念。在空間被區隔的社會中，同一個空間的人們只能共用著片面、同質化的資訊，不同的空間的群體之間的信息鴻溝也被擴大。有學者指出，男女二元對立關係依然是這部小說男女形象塑造的邏輯起點，「女性只是作為男性參照物的非主體性存在」，⁶⁷ 從這個角度來看，女性沒有逃脫掉傳統價值體系的控制，這部作品沒有為刻畫女性主體性起到推動作用。這種對女性角色的塑造，強化了一種「社會常識」，強調了性別差異在社會權力關係中重要地位。⁶⁸

（二）《沙嘴之花》：城中村裏的「殺夫」故事

在《沙嘴之花》聚焦於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特別空間——城中村「沙嘴」。「這座城市裏，人人都需要一點安慰劑。」⁶⁹ 受到廣泛宣傳的發展標語「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作為安慰劑，無法掩蓋殘酷的社會現實，特別是貧富差距和日益商業化導致的道德危機。如同大多數在沙嘴居住的居民一樣，房東沈姐依靠做多份工作來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不知名的第一人稱的男性敘述者是

一位有案底的出售技術的前工程師，沒有身份的他也棲身在沙嘴村，在某種程度上，他與「雪蓮」是技術輔助下的雙性同體。作品中所謂的「沙嘴之花」指代的正是底層弱勢女性「雪蓮」。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出生在湖南農村的她來到深圳，成為眾多打工妹中的一員，又因性別身份和職業身份她受到雙重歧視。小說以這種在嚴酷的環境下綻放的花朵的名字命名女主人公，她雖然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卻如雪蓮般孤芳高潔，她的美麗不僅在於外表，更在於內心。在書寫這一底層角色（社會邊緣人）的過程中，小說除了對沙嘴村狹小逼仄的生存空間，也有對雪蓮精神上的苦痛的描繪，以觀照底層女性命運。雪蓮的身體是深港兩地中低階層男性的安慰劑，她的遭遇也是底層女性遭遇的多重不平等：城鄉、階層、性別和職業的歧視和壓迫。「東」的身份是雪蓮的丈夫和她的老闆，他壓榨她的身體，靠逼迫雪蓮出賣自己的身體賺錢。如果雪蓮選擇生下孩子，對於「東」來說就是喪失了賺錢的工具。職業的、生活的、身體的包括生育自由她都無法得到，而她的這種無助的困境其實也是城市中淪為資本的奴隸、出賣勞動力的年輕人所面對的問題。

小說最後以科幻的形式書寫了雪蓮的反抗——殺夫，並給予了技術以正面的想像，技術正在重塑人們的性別觀念。通過增強現實技術，同處於底層的男性敘述者和雪蓮被聯繫起來，借助最新的增強現實技術，雪蓮的身體被男性敘述者所控制，敘述者通過操縱雪蓮的身體得到一種滿足：「操縱雪蓮的身體讓我上癮，像是某種潛意識層面的補償。」⁷⁰ 在殺死「東」的過程中，一開始雪蓮是受男性敘述者的控制把刀扭轉向「東」，之後在敘述者停止對她的操縱之後，她擺脫了控制，主動繼續將刀插入了「東」的胸口：

刀子逼到她的鼻尖，薄薄的刃口閃著冷光，我無法再坐視不理。我舉起雪蓮雙手，控住東的手腕和刀柄，將刀刃扭轉，朝向他自己的胸口。他顯然被雪蓮的速度和力量驚呆了，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64.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22。

65.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40。

66. 郝景芳，《孤獨深處》，頁 40。

67. 唐嘉，〈女性主義視域下的《北京摺疊》〉，《昭通學院學報》，卷 40 期 3 (2018)，頁 47。

68. Chris Weedon,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7), p.75.

69. 陳楸帆，《未來病史》，頁 28。

70. 陳楸帆，《未來病史》，頁 34。

雪蓮整個身體向前傾倒，將刀尖向東的胸前推進。

「停！」沈姐大叫。可我什麼也沒幹。是雪蓮，我甚至來不及拘束她。

刀身帶著雪蓮全身的重量沒入東的皮膚，穿透肌肉和肋骨，刺破心臟，暗紅色的液體從傷口爬出，緩緩擴大，像野蠻生長的花朵。東向上看著，目光掠過雪蓮，似乎看見了某種更為黑暗而遙遠的存在，直到最後一點光亮從他瞳孔裏消失。⁷¹

雪蓮用全部的力量完成了「刺死」東的過程，短暫且有力，反抗的是她身上累積的重重剝削和束縛。雪蓮穿上「傀儡服」之前的被動和之後的主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機器融合之後，雪蓮變成了一個「賽伯格」：「一個機器與生物體的雜合體，一個社會現實的創造物，同時也是一個虛構的創造物」。⁷² 這個控制論有機體模糊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界限，超越了傳統性別界限。也正是這個「賽伯格」讓雪蓮消除了原本對「東」的恐懼和焦慮，打破原本對女性身份的限制，通過男性敘述者提供的設備「無綫耳機」、「增強現實隱形眼鏡」、「遙控傀儡服」武裝自己實現了反抗。「雪蓮」通過對科學技術的利用，超越了她原有的局限，她的主體被解放出來。通過技術的手段，被壓抑的聲音表達出來。後人類的超越性也藉此體現出來。技術手段增強了女性的身體能力，使女性獲得男性同等的力量去操縱技術，也進一步削弱了男權的生理基礎。通過賽柏格的轉化似乎可以實現女性的解放，讓社會底層的女性對自我身份產生了新的覺悟，但作者並沒有對技術抱有完全樂觀的想像，並放棄質問社會環境總體性的問題。殺夫之後的雪蓮認為「死亡是最好的安慰劑」，⁷³ 這反映了在面對無法改變的現狀下，雪蓮內心深處的無助，高速城市化對個人精神狀態的負面影響。通過對雪蓮這個底層女性形象的刻畫，城市化所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和矛盾得以具象化，而女性的困境和反抗都成為社會批判的有力工具。

71. 陳楸帆，《未來病史》，頁 35。

72.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ybercultur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p.291

73. 陳楸帆，《未來病史》，頁 35。

（三）《霧中襲來的遠方》：互為遠方的城鄉和作為過客的打工妹

萬象峰年的這部作品沒有提及具體城市或農村的名字，是城市化下中國城鄉的縮影。在城市化背景下從鄉村到城市的流動是常態，從城市到鄉村的流動是鮮見的，這個作品就書寫了這種反向的流動。故事圍繞著兩個女性形象——打工妹顧惠蘭和喝百草枯自殺的留守兒童（女兒）丹丹展開。男性形象兒子慶天和丈夫都只是為了鋪陳母女二人及其之間的關係。顧慧蘭最終沒有成為鄉村生活的認同者、歸屬者，同時她也是城市中的他者、過客、異鄉人。

作者用生動的語言展現出城市對打工妹的吸引，以及她留下年幼的孩子所做的心理鬥爭：「她就是這樣把自己的心挖空，向那個叫做城市的磁石奔去。」⁷⁴ 如果說離開鄉村對於顧慧蘭來說並不容易，那麼融入城市更是難上加難。融入城市這一過程對於顧慧蘭或者「打工妹」這一群體來說，意味著要經受市場以及父權制等多重勢力的撕裂，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悲劇性的顧慧蘭形象和王安憶《富萍》中的「奶奶」有一定的相似：雖然在上海生活了 30 年，奶奶並沒有成為一個城裏的女人，也不再是一個鄉下女人，而是一半對一半，這一半對一半加起來，就成了一種特殊的人。顧慧蘭同樣也無法適應城市生活，在城市中表現得手足無措，和城市之間存在隔閡。當她因為女兒自殺而重新回到村子之後，她發現村裏的其他人都變成了影子，如同福柯意義上的「異托邦」：「鏡子像異托邦一樣發揮作用，因為當我照鏡子時，鏡子使我佔據的地方既絕對真實，同圍繞該地方的整個空間接觸，同時又絕對不真實。」⁷⁵ 顧慧蘭所看到的村子就像鏡像中的村子，可以看到村民，但他們卻不在同一空間，無法對話和交流：

顧惠蘭退出門，看到石板路上走滿了淡藍色的人影，無聲地穿梭往來。有些她認識，有些眼熟但是想不起。快要落山的太陽燒得屋子和路微微發紅，讓這些影子看起來散發著淡藍色的蒸汽。沒有人回答顧惠蘭的呼喊。他們就像隔離在另一個世界的鬼魂。

74.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頁 76。

75. Michel 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 *Empan*, 2 (2004), pp.12-19.

有的人影忽而消失，有的人影忽而出現。⁷⁶

霧氣中的村民幻化成影子，如同在海市蜃樓之中出現的景象，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無法觸碰。這是一種對現實的誇張、變形，從而達到直擊深層的社會現實。「淡藍色人影」展現出在城市化的發展中，鄉村也同樣受到外部城市價值體系，以及城市邏輯的影響，失去了原本的「自然」，也被「陌生化」。顧慧蘭無法融入打工的城市，而返回農村后的她又無法適應家鄉發生改變了的生活和思維方式。正如兒子慶天對她說的：「我們都在這裏，過著新的生活，只是你看不見。」⁷⁷ 母親顧慧蘭無法理解孩子們所形成的新的價值觀，她所熟悉的曾經鄉村的社會關係價值體系都已發生變化，所以當她憑印象沿襲舊有的溝通方式，卻發現無法與村子裏的其他人進行溝通。

在整部作品中與城市描寫一樣缺失的，是男性或者說是父親的角色。在這部作品中，男性的失語與其他作品中男權文化下的女性失語不一樣，體現出一種男性對家庭責任的逃避。丈夫或者說父親的形象僅出現過一次，而且是在電話的自動應答中：

她拿起手機試著撥丈夫的電話。電話竟然打通了，那邊響著更強烈的沙沙聲。「你什麼時候回來」？

是自動應答的聲音，像夏末的蟬鳴，斷斷續續。「我……不回去了」。⁷⁸

父親在孩子成長和家庭生活中的缺位，是現實生活里留守家庭普遍的狀況。外出打工使得顧慧蘭與女兒之間產生了隔閡，使得家庭產生裂痕。顧慧蘭內疚地認為是因為自己執意外出打工導致了女兒的悲劇，她試圖去融入女兒的世界，從而進行自我救贖。母親的形象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作用被強調，而女兒喝藥自殺，父親似乎完全不需負責。

隨著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村莊所出現的空心化、留守兒童、鄉下人在城市的無所適從和家庭撕裂等問題在小說中都有所體現。與其他作品中絕對的空間隔絕不同，《遠方》中新的鄉村空間和原有的鄉村空間有交疊重合，這種交疊生動地展現了對城鄉二元對立的挑戰。鄉村與城市並非互不相干，鄉村也並不代表與城市相對立的落後，小說中的村民們得到了進化，看到的是更高維度的世界：「我能清晰看到宇宙吐出的每一根絲綫，我可以編織它們。就在剛剛，我們的網路延伸到了第六顆行星。」⁷⁹ 小說中這種城市向農村的反向流動與城市化大背景下農村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相悖，體現出一種逆城市化，是對城市化的改寫和顛覆。對於顧慧蘭來說，鄉村是「本真」的象徵，是可以使心靈得到安寧的「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可返鄉之後，鄉村已經不再是記憶中的樣子。通過這一係列描寫，城市化過程中殘酷現實被揭示，相關的美好夢境和勵志故事也開始被質疑。與《沙嘴之花》相似，作品通過對顧慧蘭這個呈現夾縫中的打工妹以及一個無力的母親形象的描寫，把「互為遠方」的城鄉之間巨大的隔閡表現出來，並通過她的視角和科幻的想像，設計了一種另類的鄉村和女性的未來。

76.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頁 76。

77.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頁 77。

78.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頁 79。

79. 萬象峰年，《霧中襲來的遠方》，頁 83。

四．結論

城市一直與現代性、自由等價值緊密聯繫起來，在城市中可以推動發展、實現自我，創造價值。然而中國高速的城市化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包括社會空間的分裂、階層固化，同時性別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並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在城市化進程中，雖然社會流動性在一定範圍內增強，但城鄉、階層、性別、職業等各種差異和區隔不斷被強化，如性別不平等沒有被徹底打破，傳統的和新生的父權思想共存。在這一過程中，商品化和消費主義給人們帶來壓抑和異化。城市化這個宏觀的社會經濟結構最終會在日常生活尺度上被展演，日常生活領域中的變化是對社會結構變遷的映射。《北京摺疊》中的三個空間，《沙嘴之花》中的關外與關內、城中村與城市，《霧中襲來的遠方》中迷霧創造的平行或重疊的世界，三部作品中都體現了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分裂、區隔或者說發展不同步加劇的種種社會問題。

當代中國很多科幻作品通過對現實中「不可見」的描摹，超越已知的、可見的空間，鼓勵讀者用超越傳統的方法思考現實、挑戰所謂的「常規」。「主流現實主義中缺失的有關現實的真相，只有在科幻小說話語中才能得到再現。」⁸⁰ 以上三部科幻現實主義的作品都採用了認知陌生化的手法，激起對城市化議題的重新思考，同時製造間離效果，鼓勵讀者想像與現實不同的社會。「科幻寓言投射現實荒誕的藝術手法，其直抵本質真實的能力和形成的張力效果，往往比主流文學的現實主義小說更準確，也更深刻。」⁸¹ 通過獨特的文學再現形式，打破了逼仄的時空界限，將日常生活重新編碼，展示了現實中的「不可見」，更好地照進了現實。

因為性別問題是城市化議題的一個重要的表徵，性別不平等的問題與城市化進程中社會不平等的問題緊密勾連在一起，因此性別書寫對於城市化議題的再現有特別的價值。性別和空間在科幻中成為可以相互表徵、彼此支撐的範疇。科幻現實主義作品可以藉助不同性別形象鮮明揭露城市化過程中的問題，在陌生化的書寫中追求詩性正義。當然我們也要釐清一些作品中沿襲的性別

刻板印象的書寫，呼籲作家貢獻更多豐富的性別主體形象。當代中國文學需要紮根於中國的現實經驗，把握正在生成的中國社會發展的特徵，而科幻這種文體在城市化議題的再現上，做出了的獨特的貢獻。

周旦雪，現為蘇州城市學院講師，利物浦大學博士。中國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學者」，「中國科幻巴比塔」聯合負責人，曾任《世界科幻動態》編輯。研究方向為文學地理學、女性主義、社會學、科幻文學，研究成果發表於《亞洲研究評論》（Asian Studies Review）、《亞洲婦女研究》（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等學術期刊。

80. 宋明輝，〈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字〉，頁 110。

81. 詹玲，〈啟蒙視野下的中國科幻小說發展流變〉，《學術月刊》期 4（2019），頁 134。



閱讀與批評 REVIEWS

評 Dorner, Zachary. *Merchants of Medicines: The Commerce and Coercion of Health in Britain'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280 pp.

瓶中的帝國： 醫藥商人與現代醫療的殖民根源

張繆斯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助理教授

當我們從藥房的貨架上拿起一瓶標準化生產的藥品時，很少會去思考這枚小小的藥片背後所承載的沉重歷史。除了治療疾病之外，還凝結了一整套全球化、工業化和權力結構。Zachary Dorner 的《醫藥商人：18 世紀大英帝國的貿易與健康脅迫》（*Merchants of Medicines: The Commerce and Coercion of Health in Britain'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一書，正是要揭開這層看似中立的包裝，將我們帶回 18 世紀大英帝國的「中心」——倫敦的藥房、加勒比的種植園和印度的軍營——揭示了現代醫藥如何從一個地方性的手工業，演變為一個與帝國、資本主義和奴役制度深度糾纏的全球性商品。這本書不僅是一部精湛的經濟史，更是一部深刻的社會與文化史，它從根本上挑戰了我們對「進步」、「科學」和「醫療」的固有認知，揭示了現代醫療體系鮮為人知的、充滿暴力與剝削的殖民根源。書中揭示了一個核心論點：現代醫學並非一個超越歷史的普世科學，而是與歐洲殖民擴張緊密交織的產物。

歐洲帝國的擴張，始於 16 世紀以航海探索為標誌的「貿易時代」，其核心是通過建立跨洋貿易網路，將全球資源、人口與市場納入一個日益緊密的商業體系。到 18 世紀，以英、法、荷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展開了激烈的殖民競爭，其權力與財富日益依賴於跨洋貿易、資源掠奪和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種植園經濟。正是在這一「重商主義帝國」（mercantile empire）向「領土帝國」（territorial empire）過渡的關鍵時期，現代醫學的諸多核心特徵開始成形。我們看到是，現代醫學的知識、制度與實踐，被帝國的權力結構、資源流動和文化遭遇所共同塑造。

以此為背景，本書的作者 Zachary Dorner 並未將他的研究對象局限於醫生、科學家或國家衛生政策，而是聚焦於在帝國醫療體系裏被長期邊緣化的一個群體——「非自由移民」（unfree migrants），並以此為核心，重構了我們對 18 世紀醫藥貿易的理解。通過這一視角，Dorner 論證，18 世紀的「醫藥革命」，其核心並非實驗室裏的科學發現，而是一場由帝國對非自由勞動力的系統性剝削所驅動的商業模式革命。

一．「非自由移民」：帝國醫療的基石

本書的論點建立在對「非自由移民」這一概念的精確把握之上。Dorner 指出，這一群體並非泛指所有移民，而是特指那些在非自願、非自主的狀態下，被迫離開家園、跨越大洋，並在一種人身依附和強制勞動的關係中被剝削的龐大人群。¹ 他們構成了 18 世紀大英帝國勞動力系統的主體，是帝國經濟體制得以運轉的「燃料」，也是帝國醫藥貿易最主要的「市場」和「實驗對象」。

具體而言，「非自由移民」主要包括四類人群：非洲奴隸（通過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被擄掠販賣的種植園勞工）、契約勞工（為支付旅費而簽訂多年勞動契約的歐洲人）、被強征的水手（被皇家海軍強行抓上船服役的平民），以及士兵（特別是為東印度公司服役、受軍事紀律嚴格管制的殖民地士兵）。Dorner 並沒有將這些群體割裂看待，而是將他們統一到「非自由」這一核心特徵下，揭示了他們共同的命運：他們的身體和生命，都不再屬於自己，而是成為帝國和資本可以計算、管理和消耗的「動產」（chattel property）。

正是這一群體的存在，為醫藥貿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² 在加勒比的甘蔗種植園裏，奴隸主投資藥品，並非出於人道關懷，而是為了保護其「動產」價值，確保勞動力的再生產，正如書中所引述的種植園主所言，這是「值得的花費，可以避免（奴隸）生病並提高生產力」³。在橫跨大洋的軍艦上，海軍需要的不是複雜的診斷，而是能快速、簡便地應對瘧疾和痢疾的「特效藥」（specifics），以維持艦隊的戰鬥力。在東印度公司 (EIC) 的軍營中，外科醫生需要為成千上萬的士兵和「土著」（native）士兵提供醫療，效率和可預測性遠比個體化治療重要。因此，醫藥貿易的真正驅動力，是帝國對非自由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而非對「健康」的普遍追求。

1. Zachary Dorner, *Merchants of Medicines: The Commerce and Coercion of Health in Britain'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89.

2. 此處的「規模經濟」對應 Dorner 書中反復強調的「bulk manufacturing」（批量生產）和「bulk application」（批量應用）。指通過為大規模非自由移民群體提供標準化、批量化的藥品，通過大規模生產，降低單位產品成本並提高利潤，這一策略是 18 世紀醫藥貿易擴張的核心驅動力之一。

3. Dorner, *Merchants of Medicines*, p. 102.

二．從「治療個體」到「管理人群」：商業邏輯的勝利

Dorner 的論點表明，18 世紀醫藥貿易的「現代化」進程，其本質是一場從「治療個體」到「管理人群」的範式轉變。⁴ 這一轉變的推手，正是那些被稱為「醫藥商人」（merchants of medicines）的倫敦藥劑師和藥材商，如托馬斯·科林斯（Thomas Corbyn）和約瑟夫·高爾尼·比文（Joseph Gurney Bevan）。

這些「醫藥商人」是複合型的資本家。他們不僅是藥品的製造者，更是批發商、銀行家和帝國代理人。他們將倫敦的藥房（如著名的普盧格巷藥房）變成了早期工業化的「實驗室」。⁵ 此處的「實驗室」並非指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機構，而是一個系統性、大規模的生產與實驗中心。他們利用新興的信貸體系和長距離貿易網路，將藥品作為標準化的商品進行批量生產和全球分銷。

這一商業邏輯徹底重塑了 18 世紀的醫療實踐。為了服務於「管理人群」的需要，醫藥貿易催生了兩種關鍵的「抽象化」：

身體的抽象化：將自由與非自由的個體（士兵、奴隸、水手）視為可以互換的「通用身體」（universal body），從而可以使用標準化的「特效藥」進行批量治療。⁶

商品的抽象化：通過模糊價格、成分和產地資訊，使不同來源的藥品變得「可通約」（commensurable），便於在資訊不對稱的長距離貿易中流通。⁷

Dorner 通過詳盡的海關記錄、商業賬簿和私人信件，生動地展示了這一過程。例如，他分析了賓夕法尼亞醫院如何因財政困難而拖欠倫敦藥商的貨款，以及東印度公司如何因運輸損耗而抱怨進口藥品的品質。⁸ 這些細節向我們揭示了，支撐整個貿易體系的是複雜的信貸、債務和匯票網路，而非單純的科學進步。

4. Dorner, *Merchants of Medicines*, p. 139.

5. 例如，書中描述普盧格巷藥房「prepared remedies for Governor William Shirley's daughters and the merchant Thomas Paine, for example. Gardiner displayed patent medicines, compound medicines, and botanical drugs received from abroad alongside his own medicinal preparations that incorporated a range of specifics at his shop」。這表明藥房兼具零售、批發和生產功能。參見 Dorner, *Merchants of Medicines*, p. 110.

6. Dorner, *Merchants of Medicines*, p. 72.

7. Dorner 在第二章中指出，為了適應長距離貿易的需要，倫敦的醫藥商人通過模糊藥品的價格、成分和產地資訊，將其從具體的、有差異的「物品」轉化為可計算、可流通的「商品」。這種「抽象化」使得不同來源的藥品在帳本上和金融網路中變得「可通約」（commensurable），從而便於在資訊不對稱的全球貿易網路中流通。

8. Dorner, *Merchants of Medicines*, p. 143, p. 148-149.

三．全球網路的編織與「健康脅迫」的實施

《醫藥商人》的卓越之處，還在於其構建的全球視野。Dorner 通過比較東印度公司（EIC）在印度的醫療體系與北美殖民地的醫療實踐，展現了帝國醫藥貿易的統一性。無論是馬德拉斯的 Fort St. George，還是費城的賓夕法尼亞醫院，其醫療實踐的核心，都是為了維持帝國的軍事和經濟機器的運轉。

這一全球網路的樞紐是倫敦，但其觸角卻深入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Dorner 用西爾維斯特·加德納（Silvester Gardiner）的案例證明，一個波士頓商人如何將藥品、木材、補給品和土地投機整合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區域經濟迴圈。⁹ 這不僅揭示了帝國權力如何通過商業活動滲透地方社會，也說明了醫藥貿易如何成為連接不同經濟部門的「粘合劑」。

在這一網路中，「健康脅迫」（coercion of health）無處不在。Dorner 指出，「貿易」與「脅迫」是同構的。帝國通過「脅迫」將人變為非自由勞動力，再通過「貿易」將藥品施加於這些身體之上。這種「脅迫」不僅體現在制度性的安排中——如種植園的監禁、軍隊的紀律，以及信貸體系所施加的經濟壓力——也體現在對非自由人口身體的系統性管理上。正如書中所分析的，到 18 世紀末，當「普遍身體」的觀念威脅到以白人至上主義為基礎的帝國秩序時，它便被迅速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強調「生理差異」的種族醫學。¹⁰ 藥品，從一種承諾平等的「特效藥」，最終變成了維護不平等的「分類學」工具。

9. Dorner, *Merchants of Medicines*, p. 107.

10. Dorner, *Merchants of Medicines*, p. 102.

四．本書的貢獻與局限

《醫藥商人》成功地將經濟史、商業史、醫療史和帝國史進行了融合，創造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敘事。其最大的貢獻在於，通過「非自由移民」這一核心概念，徹底顛覆了「科學進步」這一傳統敘事，揭示了現代醫療體系那鮮為人知的、充滿暴力與剝削的殖民根源。

然而，本書依然有它的局限性，其分析的重心幾乎完全集中在生產、分銷和資本積累這一端。儘管作者反復強調「非自由移民」的存在，並承認他們也是醫療實踐的參與者，但書中對這些群體自身的醫療知識、實踐和抵抗的描寫相對薄弱。Dorner 的論述主要聚焦於帝國體系如何將非自由人口納入其藥品流通與管理網路，而較少探討這些群體如何在實踐中主動運用、改造或挑戰這一體系。例如，書中並未深入分析非洲裔治療師可能存在的「秘密療法」，或其對主流醫療的潛在抵制，這使得本書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在「帝國的視角」下講述帝國的故事。

五．結語

通過聚焦「非自由移民」，本書重構了我們對 18 世紀「醫藥革命」的理解。這場革命的核心驅動力，並非實驗室裏的科學發現，而是一場由帝國對非自由勞動力的係統性剝削所驅動的商業模式革命。倫敦的「醫藥商人」——那些集製造商、批發商、銀行家與帝國代理人於一身的復合型資本家——通過將藥品生產工業化、標準化，並利用新興的信貸體系與長距離貿易網路，將藥品作為商品進行全球分銷。

這一過程，其本質是將「治療個體」的傳統醫療模式，轉變為「管理人群」的現代商業實踐。其終極目標並非個體健康，而是帝國勞動力的「再生產」與資本的「增值」。由此可見，現代醫療體系的根基，並非純粹的科學理性，而是深植於一個以暴力、強制與商品化為特徵的全球帝國體系之中。

而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健康不平等、制藥資本與公共利益的張力時，本書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視角。它告訴我們，要真正實現一個更加公正的醫療體系，我們不僅需要新的科學突破，更需要深刻地反思和解構那個由「醫藥商人」們在幾個世紀前所奠定的、將生命商品化的權力結構。認識我們的過去，方能理解我們的現在，並最終塑造一個不同的未來。《醫藥商人》不僅是一部關於過去的書，更是關於我們未來的警示。

評 Brown, Tristan G. *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356 pp.

風水與清代地方行政中的法律實踐

李甜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先生在回憶錄中，曾經說過一句話：「中國的法律是不可靠的，私人關係才是必要的。」¹，意指私人關係凌駕於嚴肅的法律之上。現在，他的觀點終於有機會得到修正了。榮膺 2024 年度「費正清獎」的張仲思（Tristan G. Brown）博士，在專著《山川之律：風水與清代行政》（以下簡稱《山川之律》）中，生動揭示了中國法律與風水的互動，指出中國法律不僅有自身的運行邏輯，還能與風水這種看似捉摸不定的知識體系相互關聯。²

「費正清獎」在東亞研究領域的影響可謂深遠，此前，張仲思博士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導師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曾以四川自貢鹽業研究獲得 2006 年度費獎。與曾小萍教授一樣，張仲思博士的成名作也是通過對四川地方文獻的考察，來回應中國史研究的若干重要議題。

Laws of the land 這一書名頗具匠心，land 一詞有多重的意蘊，既可指具體的土地、產業等，也包含地理、區域、國家等更宏大的物理空間、文化實體，將其譯為「山川」，或可映襯出人們的風水想像；而本書所討論的 laws，又與當代法律存在著不小的差異，或可譯為「律」，既能呼應書中反複援引的《大清律例》等法律文獻，也暗含著作者對風水觀念與環境保護、自然規律之間關係的獨到見解。

與 Guanxi（關係）一樣，Fengshui（風水）一詞，也是少有的進入西方學術體系的中文辭彙。當然，由於顯而易見的文化差異，西方人對風水的誤解長期存在，在鴉片戰爭後帶著無比的優越感抵達天朝的外國人看來，風水只不過是一種與科學相悖的「迷信」罷了。即使放在今天，他們也傾向於將這一東方神秘知識與室內設計、裝飾聯繫起來。有趣的是，西方史學界在高度重視自身法律與宗教關係的同時，關於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中，卻往往忽視了其中的宗教因素，「法律世俗主義」（legal secularism）即為一種典型的視角。但是，不同於此，張仲思致力於溝

通清代法律與宗教的關係，並且通過風水視角使這一設想的邏輯變得清晰可見。《山川之律》揭示，官員們利用風水知識作為斷案依據，隱惡揚善，在批判沉溺風水之俗的同時，又讚揚了那些照顧好祖先遺跡的孝道之舉。³

《山川之律》綜合運用了大約 500 個案例，其中近 310 個出自四川省南部縣的司法檔案，本書主要的討論時段設定為 19 世紀初至 20 世紀初。值得一提的是，隨著人們風水觀念的變化，清末以來的四川官員、士紳們，不再視鐵路、電報為破壞風水的洪水猛獸，這在川漢鐵路的修建過程中即有所體現。而清廷與民爭利引發的四川保路運動，意外地將中國歷史推進一個關鍵時刻——辛亥革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清末以降四川人風水觀念的轉變，不僅事關四川一省之社會變遷，更是關係到帝制中國的革命走向，因此，清代四川風水這一研究主題的價值還可往高處估計。

接下來，筆者將基於《山川之律》的主要觀點，結合個人學習的心得，加以分析，就教於方家。第一部分按照章節概括本書的內容，第二部分揭示本書的重要貢獻，第三部分略微解析這部作品可能存在的不足之處，最後總結全書的貢獻及其研究前景。

1. 費正清著，閻亞婷、熊文霞譯，《費正清中國回憶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頁 365。

2. Tristan G. Brown, *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226-229.

3.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p.1-2.

一．假汝之名：風水如何進入法律？

在現代與傳統之間，橫亙著科學與宗教的對立。風水作為探索人類與自然關係的知識體系，不僅表現為宗教般的抽象形式，還是界定產權的具體策略。借助風水在溝通二者之間的橋樑作用，張仲思在《山川之律》中，重新思考了清代法律在基層社會的實踐過程。那麼，風水究竟是如何進入法律領域呢？他選擇了從清代四川南部縣檔案的故事說起。

《山川之律》的第一、二章，主要關注涉及風水的訴訟案件以及由訴訟所牽扯的風水製圖問題。在四川東部的低山丘陵，風水是墳產糾紛中較常見的緣由。在這裏，由於祠堂、家譜的缺乏，祖先墓地、墳木等都能成為凝聚人心的物理標識，墳墓本身可以作為產權的證據。由於《大清律例》對「發塚」有著嚴格限制，官員很少下令搬移墳墓。於是，在法律、產權、習俗等多重刺激下，加上人口增長造成的土地資源緊張，推動人們以盜葬、冒認、偽造等手段尋求風水和佔有資源。面對紛至沓來的墳產糾紛案件，地方官員們意識到訴訟雙方都缺乏證據的普遍性。在正式審理案件之前，官員通常會要求專業人員繪製地圖作為證據，以便在審理時根據地圖指引和風水知識，駁回訴訟雙方的不合理要求，做出適當的裁決。⁴ 需要指出，像南部縣司法審理中的繪圖技術，未必是當地的地方性知識，譬如在已披露的清末安徽南陵縣司法檔案中，同樣就有貼著紅紙條的產權繪圖。⁵ 鑒於南陵縣地處宗族勢力強大、民間文獻較豐富的皖南地區，我們推測地圖繪製應該是一種具有普及性的司法審理技術。

《山川之律》的第三章，暫時游離於法律之外，聚焦於風水與科舉的關係。這一章內容看似有些脫離書名，但承上啟下，對揭示風水之於中國社會深層次運作與建構的重要性頗有助益。就社會精英而言，風水有著更深層次的作用。張仲思認為，風水推動了地區、社區和家庭不平等的合法化，同時以一種將人們吸納參與到帝國文化並渴望其制度權力的象徵方式，將風水嵌入社會脈絡之中。甚至，外來宗教也能在風水浸潤之下變得中國化，比如，隨著盤龍山回子寺演化為保寧府文風的構成部分，伊斯蘭聖

地與地方科舉風水關聯起來了。⁶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宗教轉化現象顯然並非孤例，例如，福建泉州的清淨寺（又稱艾蘇哈卜大清真寺），也在科舉制度和風水因素的共同推動下，被當地士紳賦予新的文化表徵。⁷

除了墳塋、風水塔等地表風水，隱於地下的龍脈，同樣是不同勢力開展風水角力的重要戰場。在《山川之律》的第四章，張仲思仔細梳理了官員和社會精英對四川礦業的爭論，天災人禍被歸咎於地下風水受損，一些人對礦藏的不合理開採成為眾矢之的，於是風水以一種有效的方式保護了自然環境。而當時間來到了清末，工業化與風水之間的矛盾愈發突出，《山川之律》的第五章，揭示了礦業時開時禁的反複過程，這就出現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謎題：究竟是禁止開礦阻礙了工業化，導致國家與地方的積貧積弱？還是應當反過來理解，過度開採、破壞風水才是造成積貧積弱的罪魁禍首呢？總之，人們急需情緒宣洩的窗口，都想從中找到符合自身立場的證據。

在《山川之律》的結論中，張仲思詳細回顧了自宋至清風水進入法律的歷史，簡而言之，就是存在一個觀念層累的過程。⁸ 清末以降，風水雖然被法律拋棄，但是直到今天，風水觀念仍然對東亞社會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風水與法律這一貫穿全書的主題背後，還藏著風水與社稷的隱喻。本書封面取自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永陵神樹圖》，可謂別具匠心。這棵位於努爾哈赤祖輩陵園的榆樹，被乾隆皇帝封為護國神樹，同治年間在一場風雨中倒下，不僅直接破壞了陵墓風水，還有著事關國運的深層隱喻。⁹

4.Brown, *Laws of the Land*, pp.20-107.

5. 安徽省檔案局編，《清代南陵司法檔案選編》（合肥：黃山書社，2022）。

6.Brown, *Laws of the Land*, pp.114-119.

7. 陳進國，《於胥斯原：鄉族、風水與地方記憶》（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4），頁 323-339。

8.Brown, *Laws of the Land*, pp.226-229.

9. 蔡丹妮：〈專訪「費正清獎」得主張仲思：一位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風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4 年 10 月 24 日。網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119449，訪問日期，2024 年 11 月 18 日。

二．官府斷案：正式制度的非正式運作

《大明律》有言：「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¹⁰ 如何在審判中揆情度理，掌握好情、理、法的平衡，是明清官員在斷案時普遍需要面對的挑戰。與刑事案件不同，地方官員在審理民事案件之類的「細故」時，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當然，他們並非任意行使這種權力，其背後還有著一定的道德判斷和技術手段作為邏輯支撐，其中就包括墓圖繪製、堪輿術等在內的技術手段。風水看似並非理性，但與之相關的墳墓繪圖、堪輿術等技術手段，又與法律層面的理性發生了關聯。

然而，若就此推論風水的「法律化」或者「法典化」，可能會有些言過其實，低估了官僚體系的控馭能力。在我看來，儘管官員將一些技術手段引入墳產糾紛的司法審理，使整個司法程式看似科學化，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對情、理的追求。地方官員通常不會直接援引國法的具體條文作為斷案準則，風水在其中承當「息訟」的工具，以平衡法與情、理之間的緊張。換而言之，扮演裁決者角色的官員們，他們的風水言論更像是一種富有人情味的審判策略，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對法律條文提供了補充。

在具體的審理環節，地方官員的自由裁量權，主要體現為對中央法律法規的「變通」。在《大清律例》（此處依據的是乾隆五年版之點校本，法律出版社，1998 年）中，涉及民事糾紛的條文並不多見，且沒有將風水作為直接依據的法律條文，僅在禁止停棺不葬時提及兩處，一為「若惑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¹¹ 二為「凡愚民惑於風水，擅稱洗筋、檢筋名色」。¹² 平心而論，在此等語境中，風水顯然是處在被批判的位置。這也從側面說明，風水雖然作為一種非正式運作的手段滲透到正式制度，但它本身並非法律的組成部分。

明清司法審理中普遍存在的非正式運作，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更好地推行正式制度。而且，風水觀念及理論體系的多元性，也使得官員、地師、富人、窮人都能建立各自的風水解釋觀念。在司法實踐中，官員們總是試圖掌握超出常人的解釋權。連帶

著，聰明的有錢人也知道，風水話術「有時管用」（sometimes did）。¹³ 如果試著歸納風水的的不平等現象，那麼可能體現為以下的現象：官員們擁有高人一等的解釋權，以及富人們通過高薪聘請地師獲得一定的資訊優勢。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參與各方對風水解釋權的爭奪戰中，形成了一條資訊不平等的「鄙視鏈」：官員＞地師＞富人＞窮人。官員對風水的解釋權當然高於地師，譬如張仲思在本書中，就通過講述一個南部縣官員痛斥某兼職地師的故事，揭示了官員的風水知識優越感，以及兩者之間的身份、權力不對等關係。¹⁴ 而在地師群體內部，同樣也存在激烈的競爭關係，以筆者較為熟悉的徽州地區為例，一些富家大族的墓碑上也刻有地師的名字。如在休寧縣祖源村的一塊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殘損墓碑上，刻有「江右程廷桂先生扞」的字樣，這既是為特定地師打廣告，同時也是一種信譽擔保方式，間接反映出激烈的市場競爭現象。



圖 1 徽州休寧縣祖源村刻有風水先生姓名的墓碑。筆者攝於 2023 年 11 月 13 日。

10. 懷效鋒點校，《大明律·御制大明律序》（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頁 7。

11. 田濤、鄭秦點校，《大清律例》卷 17〈禮律·儀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 296。

12. 田濤、鄭秦點校《大清律例》卷 25〈刑律賊盜下〉，頁 410。

13.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223.

14.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p.24-25.

三．空間差異：風水觀念的地域多樣性

從總體上說，《山川之律》為中文學界帶來的重要啟發之一，就是貢獻了中國西部地區風水的案例分析。基於英文著作的命名風格，本書沒有刻意強調 the state 的地域性，張仲思對科舉制度、司法體系的梳理，展現出對 local government 的超越。關於風水與清代地方行政的討論，不僅糾正西方人對風水的誤解，還將歷史研究與現實關照結合了起來。本書帶來的另一啟發在於，通過分析風水對傳統中國法律體系的浸潤，揭示非正式運作對正式制度的滲透過程。官員在法律實踐中對風水觀念的援引，利用非正式的運作來克服正式制度的執行難題，以實現法律治理與社會教化的雙重目標。

然而，正如阿風先生所言，使用訴訟檔案史料時，需要注意這些史料所反映的人群之代表性。¹⁵ 對於南部縣這樣的缺乏家譜等民間文獻的地方來說，遺存至今的官方訴訟案卷，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容易從司法檔案看到了被放大的一面，亦即作者也在書中承認的那樣，司法檔案中普遍存在著對官員形象的美化。¹⁶ 在南部的風水審判中，官員們看似牢牢掌控風水解釋權，主導每一起案件的審理環節。然而問題在於，官員的風水策略會一直奏效嗎？並且，書中還存在著南部地方文獻與其他地域文獻的混用，也許不能用「文本上的共鳴」(textual resonances)，¹⁷ 就一筆帶過了不同地域之間的顯著差異。

古代語境中的「地理」兼有雙重含義，不僅指代了風水，還可指行政空間。與南部縣檔案的故事不同，來自徽州的民間文獻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解釋路徑。眾所周知，徽州是一個高度重視喪葬禮儀的地區，徽州人將墳墓稱為墳水或者風水，暗示著二者的相通性。「生在揚州，嬉在蘇州，死在杭州，葬在徽州」的民諺，¹⁸ 清楚地表明這一點。對此，鴉片戰爭後來華竊取茶種的蘇格蘭植物學家福瓊應該是深有體會的，在他乘船前往徽州訪茶，也就是長達三個星期的水上旅行中，福瓊睡覺的床板下方船艙就裝著返鄉的亡人靈柩，直到在徽州境內換船時，才被目瞪口呆的他發現。¹⁹ 同樣，生活於 19 世紀的徽州小農程允亨，他在農閒

時的興趣之一就是「看地」，當然，他自知對風水術的理解不深，所以，關鍵時刻還得邀請風水先生幫忙把把關。²⁰

關於傳統中國社會的司法實踐，究竟是「無訟」還是「健訟」？學術界的爭論長期存在，爭論各方都能從歷史文獻或官員判牘中找到支持己方的證據。《山川之律》認為，南部縣中涉及風水案件占比不大，相比之下，徽州人日常糾紛幾乎有一半與風水有關。("people in Huizhou ascribe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heories of fengshui and among routine disputes that become lawsuits, almost half concern it.")²¹ 根據該文的引文，引述的是趙吉士《寄園寄所寄》的觀點，然而翻檢趙書徵引的頁碼，並未見到相關表述。²² 筆者猜想，《山川之律》所引文字，或為這一句：「風水之說，徽人尤重之，其平時構爭結訟，強半為此。」²³ 然而，這一表述引自《稗史》，不僅本身沒有提供確鑿的依據，而且後文接續的傳說故事過於離奇，似乎不足采信。

雖然喪葬與風水在徽州人生活世界中佔據重要位置，但它們是否成為民間訴訟的首要因素，仍然還有討論之餘地。首先，人們並未像官方指責的那樣「健訟」——畢竟沒有哪個官員會坦承自己的工作量不夠飽和，奏摺、案牘、方志中的「健訟」話語，未必完全符合社會事實。其次，遺存至今的徽州風水文書，絕對數量固然非常龐大，涉及風水糾紛的案例，占比未必很高。以《明代徽州文書集萃》²⁴ 為例，其所收錄的 3988 份文書中，涉及風水交易、合作和糾紛的文書比重不到 10%，若去掉其中的交易與合作文書，那麼風水糾紛文書的比值只會更低。由於缺乏徽州司法檔案，我們也可用皖南其他相關檔案作為旁證，在《清代南陵司法檔案選編》中，涉及墳產、風水的案例也僅僅占到 5%。²⁵

張仲思分析南部、巴縣兩地墳產糾紛的司法差異時，認為在於兩地的土地商業化程度不同，這一見解無疑是準確的。²⁶ 徽州是以經商風氣聞名的商業社會，清代中期以來田土價格昂貴，與一般的農耕社會有著顯著差異，風水糾紛卻能維持在較低的水準。

15. 阿風《訴訟檔案 契約文書與明清性別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23 年第 3 期。

16.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39.

17.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137.

18. 鄭村志編委會，《鄭村志》，內部資料，2010 年，頁 313。還有其他類似的說法，如「生在揚州，死在杭州，葬在徽州」，參見卞利，《徽州民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頁 111。

19. 羅伯特·福瓊，教雪崗譯，《兩訪中國茶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頁 249-250。

20. 劉永華，《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頁 386-391。

21.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15.

22. 趙吉士撰，劉道勝整理，《寄園寄所寄》（合肥：黃山書社，2008），頁 872。

23. 趙吉士撰，劉道勝整理，《寄園寄所寄》，頁 901。

24. 陳琪、倪清華主編，《明代徽州文書集萃》（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25. 安徽省檔案局編，《清代南陵司法檔案選編》，頁 692-716。

26.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p.27-30.

四．結語

風水作為一種特殊資源，以其牽涉家庭、家族的命運而具有排他性。風水與家族命運之間的不確定，背後是地域競爭加劇造成的不安全感。人們的風水焦慮，²⁹ 轉化為一種可操控的稀缺資源，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的合法化。

風水作為焦慮的製造者，人們面對風水的焦慮，在異姓合葬之外，弱者、窮人至少還有兩種應對方式。其一是賣地留墳，³⁰ 將產權切割劃塊，以充分榨取土地資源，圍繞墳界的討論便是其中的焦點之一。其二，暫厝也是一種相對合理的應對策略。³¹ 墳與厝的性質存在差異，對應著不同的風水權重和法律權益，可惜本書也未及展開。

在任何時代，對焦慮情緒的販賣都是一種有效的社會動員策略。風水既是製造焦慮的源頭，也是釋放焦慮的出口。普通人對個人或家族的風水焦慮，官員、士紳們對地方經濟和文化的風水焦慮，然而這些中國式的風水焦慮，也許並非美國式的發財夢所能涵蓋。³² 當然，在今天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人們有太多的欲望亟待滿足，風水反倒沒那麼令人焦慮了。

究其根源，可能在於徽州人深受商業思維浸潤，已經發展出一套較為成熟的風水交易、分享機制，人們可以通過族內合葬甚或異姓合葬來共用風水，減少直接衝突。

明清以來流行於皖南地區的異姓合葬，指兩個或更多族姓之人同穴而葬，通過經濟交易共用一個完整的風水寶地。民眾在產權買賣中摸索出靈活的交易機制，以墳穴股份制的方式運作，從而保證單個墳墓風水的完整性。異姓村民基於私人關係聯合建墳的目的，克服中小家庭的產權碎化，達成分享完整風水的心理需求。圍繞風水展開的跨族合作，也強化了社區內部不同宗族的合作意識。在遺存至今的皖南鄉土文獻中，異姓合葬的現象遍佈徽州府各縣及毗鄰的皖南寧國府。民間文書揭開不一樣的歷史面貌，民眾可以在風水交易、分享中實現合作共贏。民眾對喪葬禮儀的重視，導致喪葬成本攀升，反過來又會推動合作變通行為的發生。

可以說，受制於檔案史料的類型限制，《山川之律》中的學術判斷放在四川的空間語境下自然是成立的，然而得出的結論，未必可以直接套用於中國其他區域。即使在清末以來，官方法律轉而擁抱近代化，然而徽州民間社會仍有其自身的運行邏輯，甚至在 1949 年之後仍然不絕如縷。試舉一例，1963 年的初冬時節，當暖陽照進山村裏的一棟徽式建築，洪善生正與族人洪水源、洪家富商議，他們決定仿造舊例訂定合同，將一處吉地做成墳墓，約定「擇吉期先靈進壙，並安山醮墓，一切費需，照棺均配，並無異言」。其他在場的三位親戚作為中人，也共同見證了這一起共業分股的族內合葬行為，事後他們照例聚餐以示慶祝。²⁷ 在同一時期，村落中的社員們正忙著將其他姓氏的祠堂拆掉，山村裏的「小姓」們（曾經的賤民群體）也設法基於革命的名義，破壞「大姓」村落的風水林，同時又悄悄建造自己所居村落的水口。²⁸ 諸如這些文化因素背後的利益考慮，展現出地域性商業思維頑強的延續性。即使在全新的社會格局下，人們的行為本身也為歷史傳統留下了專屬的位置。

27. 〈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洪善生、洪水源、洪家富立議合同〉，載劉伯山編著，《徽州文書》第 5 輯第 6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315。

28. 王振忠，〈「裏至源頭，外至水口」：明清以來徽州村落空間的建構〉，載周曉光主編，《徽學》第 14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頁 36-66。

29.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p. 224-225.

30.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21, p.45, p.84, p.173.

31.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22, p.27, p.157.

32. Brown, *Laws of the Land*, p.138.

學術譯介 TRANSLATIONS

全球亞洲札記： 如何書寫全球知識史

Notes from Global Asia:
How to Write a Global History of Knowledge

林郁沁
Eugenia Lean

摘要：

近來「全球亞洲」與「全球南方」領域的發展，日益關注替代性的認知方式，並對其流轉過程進行歷史化。這些研究有助於我們在書寫知識史的過程中構建批判性的地理，從而去中心化關於科學起源的歐洲中心主義敘事，並避免那些至今仍在塑造我們對現代世界理解的比較性甚至文明論框架。要書寫一部兼具廣度與深度的全球知識史，學者不僅需要考察促成思想和物質流動的遠距離全球網絡，亦須深入細緻地理解地方脈絡與區域特性。透過探究流轉中的「全球」知識和移動物件如何在地「錨定」並具體呈現，全球知識史領域得以降低將「全球」扁平化，並犧牲具體性、深度、地方知識和區域專長的風險。

來自世界各地深入且豐富的地方案例研究，對於增進我們對全球知識史的實證理解至關重要；這種更完整的實證圖景促使學界承認，在各個歷史時段和空間中，始終存在多重形態的知識。這些研究進一步幫助我們記錄知識史本身所呈現出的非綫性和高度偶然性，以及其如何在地方和全球層面以多樣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展開。然而，對多種彼此競爭的知識形態的揭示，也使人不禁要問：書寫一種具有統攝性但不抹平差異的全球知識史，可能嗎？如果可能，它應該是何種形式的？此外，這種歷史書寫是否能讓我們避免那些（依然困擾學界的）關於科學興起的目的論敘事？我們能否對科學起源於西方的這種傳統敘事中所附著的普遍主義主張，進行去中心化？我們怎樣有效地理解知識如何以及何時流轉，並在此過程中如何獲得合法性？這些流轉中的知識又如何幫助構成地緣政治等級和經濟不平等？上述問題的部分答案，在於書寫跨越地理分析單位（如民族國家、區域、帝國等）的連結性跨國史的能力。為此，學界需要培養具備多語言能力和豐富的多地區及地方知識的學者，使其能夠從多套一手史料中展開分析，並負責任地進行全球敘述。撰寫跨國敘述還應包括更多系統性的努力，使區域專家之間進行合作，以實現真正全球視野的知識史。唯有對全球現象落地並錨定的地方進行深入探究，我們所書寫的全球史才可能避免停留於表層，而更深入地理解為什麼地方條件可能會產生摩擦、不均衡、等級 / 不平等，甚至阻礙跨國知識流動。如此，學界也能更有效地超越「西方—其他」的

二元分析軸綫，進而探索那些往往雜亂、不規則且有時出人意料的地理綫索。

自 20 世紀下半葉以來，科學史學者越來越多地探討科學家及其他行動者為何以及如何對現代科學的普遍性提出真理主張。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在其 1962 年的開創性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透過識別科學中的「範式」，開始去中心化這類主張。到了 1980 和 1990 年代，以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為代表的後庫恩學者則認為，科學知識主張具有相對性和建構性。到了 21 世紀，科學史學者繼續追問科學在歷史上是如何獲得權威的，其研究路徑則是探究科學與人類社會其他方面的交織，包括市場、法律領域、政治、社會實踐以及技術性和物質性工作。¹ 這些修正主義的研究浪潮，探討了那些真理主張如何在根本上具有政治性與道德性，並具有深遠的地緣政治、文化和商業影響。然而，即便這種更具批判性的研究取向已然出現，仍有部分學者（包括一些關注現代世界興起的史學家）繼續遵循那些默認現代科學優越性的敘事，並強調現代科學的起源位於西方。² 同時，一些對科學史領域貢獻卓著的學者，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洞見與工具，用以歷史化科學的建構過程及其普遍主義主張，卻仍囿於狹隘的地域視野。³ 而那些開創了思考替代性認知方式（例如工匠的隱性身體知識）的學者，其研究關懷依然主要集中在於解釋西方科學革命的起源。⁴

研究非西方世界的科學史學者，同樣未必總能擺脫比較性、甚至文明論的分析框架，即使他們探討的是西方之外的認知方式與知識生產。在 20 世紀初，李約瑟（Joseph Needham）試圖將中國的哲學和技術傳統認定為科學史中的關鍵部分，他認為這些傳統匯入了科學知識的普遍河流，但最終還是西方數學推理構成了躍至現代科學的關鍵要素。⁵ 對此，後李約瑟學者指出，儘管李約瑟在認識非西方世界的貢獻方面是先驅性的，但他的方法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文明論分析，其核心任務是解釋現代科學作為一種普遍的認識形式的興起。作為修正，這些學者致力於揭示知

識生產是地方化的過程，其政治、社會和認識論價值應在特定背景下並依其自身標準來評估。⁶ 他們揭示了創新知識的形成如何不斷地在現代西方之外發生，無論其是否對於形塑科學發揮了作用，從而質疑了任何潛在的現代科學普遍性的目的論。⁷ 透過將認識自然世界的不同方式從科學興起的問題中解脫出來，這類研究也促使本領域從科學史轉向知識史。⁸

然而，透過揭示「中國」或「阿拉伯」知識體系的長時段歷史，此類研究往往也面臨著將自己局限於國家甚至文明框架內的風險。因此，那些堅持認為現代（西方）科學具有普遍性的人，仍然很容易將這些案例研究標記為「另類的」和特殊的。⁹ 直到「全球轉向」的出現，學者們才開始獲得更為有力的方法論工具，以避免殘存的文明論分析。例如受後殖民研究啟發的科學史學者，透過考察帝國網絡與接觸地帶中發生的交換和翻譯過程，有力地展示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知識如何在現代科學的形成中發揮了作用。¹⁰ 我們如今已認識到，翻譯者和中介者對於促成知識、物體與人員的流動至關重要，而這種種流轉則是科學革命得以發生所必需的。¹¹ 因此，科學的興起已不再能僅僅被定位於西方。當然，這種研究路徑也有其局限性。儘管後殖民研究有助於科學史研究的全球化，但它仍受到「都會一邊緣」這一分析軸綫的限制。那些曾被殖民或受帝國主義影響的非西方地區，依舊過於輕易地被簡單標記為「地方性的」或「邊緣的」，而被置於都會的西方則始終被標記為「全球的」。此外，研究問題仍主要聚焦於現代帝國主義背景下科學的興起，而對那些或許未曾參與科學興起的知識形態則關注不足。

也許並不完全令人意外的是，關於近代早期（early modern）世界的研究，已幫助我們突破後殖民研究的局限——後者往往主要關注現代形態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擴張。在中國史領域，研究非現代時期的學者，尤其能夠有效探索超出「大都會一邊緣」框架的帝國形態和知識，並能夠超越現代科學興起這一單一問題。¹² 「新清史」強調透過學習漢語之外的語言，以便

6. 例如 Roger Hart, "Beyond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A Post-Needham Critiqu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6 (1999), pp. 88–114。對於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批評，參見 Kapil Raj, *Relocating Modern Science: Circu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South Asia and Europe, 1650–190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7. 對於地方性的前現代案例研究，參見中國歷史領域中後李約瑟的例子，如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和 Dagmar Schäfer, *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對於[依其自身標準]這一短語的具體使用，詳見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關於轉向知識史之必要性的進一步討論，參見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於 2020 年出版的創刊號。

9. 對於在比較方法上未能完全擺脫文明論框架，且仍然遵循李約瑟所提出的分流敘事的比較工業化研究，參見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已有許多學術浪潮探討了如果區域研究學者固守其研究地區會有什麼影響，包括再次生產最初推動區域研究的冷戰邏輯。關於東亞研究學者在如何探討區域研究方法的各種問題，參見 Andrew Gordon, "Rethinking Area Studies, Once More," review of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edited by Masao Miyoshi and H.D. Harootuni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30:2 (2004), pp. 417–429。

10. 參見 Harold J 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和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在科學史領域中關於知識如何流轉的早期研究，參見 James A Secord, "Knowledge in Transit," *Isis* 95:4 (2004), pp. 654–672。「關於流轉與南亞翻譯者，參見 Raj, *Relocating Modern Science: Circu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South Asia and Europe, 1650–1900*；關於協助英國植物學家的中國與納西嚮導，參見 Erik Mueggler, *The 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關於在 20 世紀初為殖民背景下的人類學家與科學家提供信息的非洲本地人，參見 Helen Tilley, *Africa as a Living Laboratory: Empi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1870–195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關於中介者，參見 Simon Schaffer, Lissa Roberts, Kapil Raj, and James Delbourgo eds., *The Brokered World: Go-Betweens and Global Intelligence 1770–1820* (Sagamore Beach, MA: Watson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2009)。

1. 參見 Mario Biagioli and Jessica Riskin eds., *Nature Engaged: Science in Practic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2. 例如 Joel Mokyr,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3. 前述 2012 年出版的強調歷史務實主義必要性的論文集 *Nature Engaged*，其副標題為「從文藝復興至當代的科學實踐」，並僅在歐洲背景下追溯了科學的綫性進程。

4. 例如 Pamela Smith, *The Body of the Artisan: Art and Experience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5. Joseph Needham, "The Roles of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Evolution of 'Ecumenical Science,'" in Joseph Needham ed.,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96–418.

12. 當然，後殖民研究有效地啟發了對中國現代科學經驗在帝國背景下的研究。參見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此外，隨著後殖民「轉向」的出現，那種認為真正「中國的」科學只存在於前現代時期的觀點（這是李約瑟式的研究路徑的一個遺產）已被有效地駁斥。當前學者們探討的是，現代時期新的學科、機構和物質實踐的建立，並非簡單地採納「現代（西方）科學」，而是涉及在帝國主義背景下展開的複雜翻譯和調適過程，且這些過程本身值得歷史考察。由此，中國科學史研究在近幾十年來蓬勃發展，圍繞民國時期與1949年後的研究尤為豐富。

13.Bian He,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4. 關於此議題即將出版的研究，參見 Stacey Van Vleet, *Plagues, Precious Pills and the Politics of Tibetan Learning in Qing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該書透過考察清代內亞地區廣泛的藏醫機構網絡的興起，追溯了此類知識和藥材的流轉。

15.Gray Tuttle 目前關於安多藏區在近代早期作為拉薩與北京的「中間地帶」的研究項目，正是從一個替代性的「中心」出發，重新思考清朝的奠基性研究。

16. 關於開創性的離散群體全球史研究的例子，參見 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 Hawaii 1900–1936*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關於在全球現象（如離散流動）研究中探討網絡的重要文章，參見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2 (1999), pp. 306–337。

17. 例如 Dongxin Zou, "Socialist Medicine and Maoist Humanitarianism: Chinese Medical Missions to Algeria, 1963–1984"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9)。該文詳述毛時代的中國如何透過向北非鄉村地區派遣醫療人員，在全球範圍內推進其社會主義式的人道主義。

18. 關於探討冷戰時期中國與中東歐之間互動的研究，參見 Austin Jersil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以及 Elidor Mëhilli, *From Stalin to Mao: Albania and the Socialist Worl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關於1950年代中印之間統計知識轉移的研究，參見 Arunabh Ghosh,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更好地研究傳統上被視為「邊緣」的地方，這使得關於近代早期中國知識的歷史學研究，將清朝（1644–1911）描繪為一個多元文化帝國，它不斷形塑新的「邊疆」，無論是滿洲、蒙古、新疆還是西藏。作為一個具有多重構成群體的近代早期帝國，長距離貿易路線的出現促成了高度多元的知識和物質實踐領域，其藥學文化即為一例。¹³ 醫學知識和藥材不僅沿著貿易路線在「大清秩序」（*Pax Manjurica*）之下廣泛流轉，也經由佛教寺院的機構網絡流轉，並可回流至北京這一帝國中心。¹⁴ 因此，我們對中國近代早期帝國的理解，正日益受到替代中心的啟發，包括所謂的邊疆地帶；作為帝國交會的樞紐，這些地區是高度世界化的，並且與北京這一帝國中心或江南的傳統文化中心並存。¹⁵

近期的全球史方法，也尤其善於概念化那些構成遠距離連結與全球現象的流動性地理和網絡。¹⁶ 透過揭示思想、事物和實踐流轉的高度雜亂、曲折且往往不可預測的途徑，受離散和移民研究啟發的全球史同樣打破了熟悉的二元對立，如大都會與邊緣、東西方、南與北。這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究竟如何對界定「中國的」、「非洲的」或「西方的」科學和知識，也為我們提供了方法以避免那種頑固敘事，即科學和技術誕生於西方，隨後才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這種對全球現象更具流動性的理解，也促成了新的、批判性的地理想像的出現。例如「全球南方」正逐漸成為一個有效的批判分析範疇，使學者能夠超越對東西方傳播或南北間影響的關注，去探索亞洲與非洲或亞洲與拉丁美洲之間那些較少被理解的歷史連結。具備相應語言技能的學者，如今正在探索超越傳統區域與地域研究邊界的「南—南」或「東—東」連結。有的學者揭示了現代中國與非洲之間人員、知識和專業技術轉移的豐富歷史。¹⁷ 還有學者則展現了冷戰期間東歐和東亞在社會主義陣營內，以及儘管存在冷戰分裂的印度和中國之間，曾發生的活躍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交流。¹⁸ 另一個研究轉向是去中心化基於陸地的地理單位，轉而探討使人、物和思想能夠穿梭於印度洋、環太平洋和大西洋世界的商業交換及地緣政治條件。近年的中國—印度研究主張在理解中國和印度之間的交流時，不應從一種把兩國

視為因其規模和文明根源而代表「亞洲」的區域研究視角出發。¹⁹ 相反，在「以亞洲作為方法」等研究路徑中，亞洲不被視為本體論意義上的區域，而是一個可透過歷史分析加以辨識、具有實際歷史連結的建構性範疇；這使亞洲社會能夠成為彼此的參照（而非持續以歐洲為默認標準進行比較），並由此幫助我們對世界歷史提出一套不同的問題。²⁰

在我們關注這些新的批判性地理時，需要審慎考察並歷史化移動和動員得以發生的過程。移動從來都不是自動發生的，即使「全球流動」一詞可能包含那樣的暗示。一些學者已適時地提醒，不應過度且不加批判地使用關於流動的「水力學」隱喻，並呼籲避免將關於遠距離流轉的敘述「扁平化」，而應注意不均衡的權力關係如何生成摩擦，使相遇過程碎片化，並阻礙思想和事物的自由移動和流轉。²¹ 事實上，工作和勞動始終參與了這些移動途徑和連結條件的創造。²² 當前新的研究方向包括知識如何移動、抵達並在全球網絡中的某一地方或節點得以錨定。什麼條件促成了翻譯實踐、使用中的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 through use），以及民間化（vernacularization）與調適的努力——這些構成「錨定」移動知識的關鍵過程？²³ 對這些過程的關注，往往就意味著要考慮外來技術和知識在被調適時所處的豐富的地方認識論與物質背景。²⁴ 透過這些方法，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現代時期的知識生產從來都不是西方科學被引進後的衍生故事。而歷史學者的任務，則正是探究在世界不同地區之間，調適與翻譯新的認知方式的複雜過程得以發生的種種偶然條件。全球南方從來不是被動的邊緣或僅僅發生地方化的接收終點。相反，它是諸多節點之一，在這些節點上，知識與物質實踐不斷變形並演化，往往被深刻重塑，繼而再度上路。

史學領域的新方向，包括對氣候與環境、科學與資本主義以及採掘性基礎設施的研究，都要求一種保持靈活又不失嚴謹的全球研究路徑。²⁵ 提供全球敘述所需的工具箱得包含多種方法。微觀史和深入的地方案例研究不應被摒棄，因為它們的生產本身就

19. Tansen Sen, "China-India Studies: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0:2 (2021), pp. 363–387。

20. 更多關於「以亞洲作為方法」的討論，參見 Kuan-Hsing Chen,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關於科學史中採用這種方法的研究，參見 Fa-ti Fan, "Modernity, Region, and Technoscience: One Small Cheer for Asia as Method," *Cultural Sociology* 10:3 (2016), pp. 352–368。

21. 關於水力學隱喻及其潛在限制，參見 Warwick Anderson, "Waiting for Newton? From Hydraulic Societies to the Hydraulics of Globalization," in Ghassan Hage and Emma Kowal eds., *Force, Movement, Intensity: The Newtonian Imagin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28–135，以及 Fa-ti Fan, "The Global Tur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6:2 (2012), pp. 249–258。「關於全球化中的「摩擦」概念，參見 Anna Tsing,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 關於近期聚焦塑造「全球」過程中人類工作的研究，參見 Michael Hathaway, *Environmental Winds: Making the Global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23. 關於翻譯的理論研究，參見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關於克里奧爾化和使用，參見 David Edgerton, *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關於民間化，參見 Eugenia Lean,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 in China: Local Innovation and Trans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Making of a Cosmetics Empire, 1900–194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24. 關於主張在現代科學與技術流轉至全球南方各地時，需要將地方的歷史性認識論背景納入考量的論述，參見 Clapperton Chakanetsa Mavhunga ed., *What D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ean from Afric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7)，尤其是導論部分。

25. 關於環境史與資本主義史中採取全球視角的一個範例，參見 Bathsheba Demuth 的研究，包括 *Floating Coas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ering Strait*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9) 和 "The Walrus and the Bureaucrat: Energy, Ecology, and Making the State in the Russian and American Arctic, 1870–195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4:2 (2019), pp. 483–510。

26. 這類工作如今常以期刊特刊的形式進行，參見 Lukas Rieppel, William Deringer, and Eugenia Lean, *Science and Capitalism: Entangled Histories*, special issue *Osiris* 33:1 (2018)。另一種做法則是透過更具雄心的多卷本項目來推進，例如即將出版的 *Cambridge History of Technology*，該項目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通常由具備不同區域專長的研究者共同撰寫每一章節，以書寫一部全球技術史。

展現了全球知識史的多重性和多元性，並迫使任何普遍主義或目的論的主張被審視、反思。同時，這些地方案例需要被置於全球脈絡中予以理解，而不是僅僅透過比較。正如全球轉向所展示的那樣，隨著它的成熟，深厚的地方和語言知識——雖然不應成為學術分割化的基礎——對於書寫不膚淺的全球知識史來說是必要的，而這樣的全球知識史需要關注流轉的物體與思想如何得以「錨定」並在地化。同樣地，透過合作努力，打破我們在學術界彼此隔離的區域研究方式，也能促進這一目標，即書寫兼具廣度與深度的全球知識史。²⁶

* 原文：Lean, Eugenia. "Notes from Global Asia: How to Write a Global History of Knowledge."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5 (2024): 219–228. DOI: <https://doi.org/10.55283/jhk.18452>。

關於作者：

林郁沁（Eugenia Lean）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近年出版專著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 in China: Local Innovation and Trans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Making of a Cosmetics Empire, 1900–1940*，其中文版《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陶磊譯）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 2023 年出版。她目前的研究探討現代中國如何逐漸獲得「山寨大國」（copycat nation）的聲譽。

譯者：

蔡學鑫，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博士候選人，美國森林史協會 Walter S. Rosenberry Fellowship 獎助學者。研究方向為環境史、邊疆史及科學技術與社會（STS），主要關注中國西南及毗鄰的東南亞、南亞地區自 20 世紀以來的環境與社會變遷。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
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 編